

上海開埠初期  
對外貿易研究

黃 葦 著



## 前 言

上海是近代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它自 1843 年被辟为商埠后不久，即迅速取广州的地位而代之，发展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我国近代的对外贸易长期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帝国主义借此对我国进行了一百余年的经济侵略。研究我国近代的对外贸易，不仅可以直接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的种种罪行，而且有助于探索 and 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化的情况和原因。

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资料一般说来还是颇为完整和系统的。从 1864 年海关开始发表对外贸易报告年册以后直至 1949 年，大多数年份都有进口和出口贸易统计数字可查。但遗憾的是鸦片战争后 1843—63 年间的统计资料却不易找到，即使偶尔发现一些，也大都零星、片断甚至互有出入，无法从中完整、系统和正确地看出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情况和趋势。这就难于全面了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鸦片战争后的二十余年内对我国进行商业掠夺的具体情况，同时也不易据此去探索和研究我国近代早期社会经济变化中的一些问题。这一情况的存在经常给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

近几年来，我在探索中国民族资本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等问题时，由于遇到了这样的困难，很想弄清 1843—63 年间

我国对外贸易的情况，并把这一时期我国进口和出口贸易的统计数字较为完整和系统地整理出来。但是，全国性的进口和出口贸易统计数字却发现甚少，只有上海一港进口和出口贸易的统计数字还可以片片断断地找到一些。上海是近代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从19世纪50年代起，我国历年的对外贸易一般都有50%以上是在上海进行的。上海的数字虽不能代替全国的数字，但如较为完整和系统地整理出来，还是有较大的代表性并具有一定的参考和研究价值的。因此决定对上海开埠初期20年（1843—63年）的对外贸易统计数字进行搜集和整理。这类数字，绝大部分来自不大常见的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早期编印的对华贸易报告，也有少数取自一般旧有的书刊。本书附录中列举的各表及正文内引用的一些数字就是根据这些材料按年份分门别类地编算和整理出来的。这些统计数字，虽然还不很全，有的年份由于找不到资料而只好暂缺，但大体上还是较为完整和系统的，可以提出来作为研究的参考。

本书除着重提供上海开埠初期（1843—63年）对外贸易的各类有关资料外，还试图就这一时期对外贸易中若干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商业掠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和后果等等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分析和论述，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作者理论水平低，历史知识有限，掌握的资料也不多，书中列举的材料和进行的论述一定有不够甚至错误之处，极望得到各方面的指教。

作者

1961年11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目 录

## 前 言

<b>第一章 上海开埠前对外贸易的历史概况</b> .....	1
第一节 自两宋迄清代前期的对外贸易关系简述 .....	1
第二节 鴉片战争前夜的对外贸易 .....	5
<b>第二章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及商埠和“租界”     的开辟</b> .....	8
第一节 军事入侵和商埠的开辟 .....	8
第二节 外国侵略者强占“租界”的罪行 .....	14
第三节 外国商人“冒险家”的纷至沓来 .....	21
<b>第三章 可耻的鴉片贸易</b> .....	28
第一节 鴉片输入的情况 .....	28
第二节 鴉片输入的恶果 .....	34
<b>第四章 外国工业品的大量进口</b> .....	38
第一节 1843—1845 年間外国工业品的 汹涌输入 .....	38
第二节 1846—1856 年間进口贸易的停滞 及其原因分析 .....	42
第三节 第二次鴉片战争后进口贸易的扩大 .....	54
<b>第五章 中国农副产品的源源出口</b> .....	62



第一节	出口貿易不断增长的情况和趨勢	62
第二节	出口貿易不断增长的原因分析	66
<b>第六章</b>	<b>上海在全国对外貿易中首要地位的确立</b>	<b>71</b>
第一节	我国对外貿易重心由广州向上海的轉移	71
第二节	上海在全国对外貿易中首要地位的确立 及其原因分析	75
<b>第七章</b>	<b>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貿易的性质和特点</b>	<b>79</b>
第一节	对外貿易的性质	79
第二节	对外貿易的特点	87
<b>第八章</b>	<b>外国資本主义商业侵略的影响和后果及     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b>	<b>97</b>
第一节	自然經濟的破坏和商品經濟的发展	97
第二节	中国买办資本的形成及中国封建地主 經濟同外国資本主义的結合	104
第三节	外資企业的出現和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	112
第四节	中国資本主义的兴起	123
第五节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銳化及 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	127

\* \* \*

### 附录 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貿易統計

(1843—1863 年)

一、进口和出口貨值的統計	138—139
--------------	---------

表 1. 上海开埠初期历年进口和出口貨值

(1843—1863 年)	138—139
---------------	---------

表 2. 上海开埠初期进口貨值中各国所占比重 (1844—1849 年) .....	139
表 3. 上海开埠初期出口貨值中各国所占比重 (1844—1849 年) .....	140
表 4. 上海开埠初期进口英国貨值及其占全国进口 英国貨总值的比重(1844—1856 年) .....	141
表 5. 上海开埠初期輸往英国的貨值及其占全国輸往 英国总貨值的比重(1844—1856 年) .....	142
表 6. 上海等五口輸入英国貨值的比較 (1844—1849 年) .....	143
表 7. 上海等五口輸往英国貨值的比較 (1844—1849 年) .....	144
表 8. 上海、福州和广州等 11 个港口进口和出口 貨值的比較(1863 年) .....	145
表 9. 上海出口貨值占全国出口貨总值的比重 (1846、1851、1861 年) .....	145
<b>二、进口和出口商品数量的統計</b> .....	146
表10. 上海进口主要外国貨物的品种、数量和价值 (1845—1863 年) .....	146
表11. 上海出口主要中国貨物的品种、数量和价值 (1844—1863 年) .....	151
表12. 英国貨物輸入上海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 (1844—1863 年) .....	153
表13. 中国貨物經由上海輸往英国的主要品种、 数量和价值(1844—1863 年) .....	158
表14. 美国貨物輸入上海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 (1845—1863 年) .....	160



表15. 中国貨物經由上海輸往美国的主要品种、 数量和价值(1845—1863年) .....	164
表16. 上海进口貨物比重构成(1850、1860年).....	166
表17. 上海出口貨物比重构成(1850、1860年).....	166
表18. 上海进口英国貨物占全国进口英国貨物的 比重(1852—1856年) .....	167
表19. 上海和广州进口英国貨物数量的比較 (1844—1863年) .....	169
<b>三、进口鴉片数量和貨值的統計</b> .....	172
表20. 上海进口鴉片箱数及其占全国消費箱数的 比重(1843—1863年) .....	172
表21. 上海进口鴉片貨值(1854—1863年) .....	173
表22. 吳淞等9处运进英国鴉片数量的比較 (1849、1854年).....	173
<b>四、进口和出口各国船舶艘数和吨数的統計</b> .....	174
表23. 上海进口各国船舶的艘数和吨数 (1843—1863年) .....	174
表24. 上海出口各国船舶的艘数和吨数 (1843—1863年) .....	175
表25. 上海和广州进口外国船舶艘数和吨数的比較 (1844—1863年) .....	176
表26. 上海和广州出口外国船舶艘数和吨数的比較 (1844—1863年) .....	177

# 第一章 上海开埠前对外贸易的历史概况

## 第一节 自两宋迄清代前期的对外贸易关系简述

上海是鴉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于1843年11月17日被开辟为商埠的。它开埠后不久，即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近代百余年来，我国出产的大宗货物长期通过上海输往国外，外国货物输入我国也大部分经由上海进口。

上海地区的对外贸易，虽然在近代百余年中日益扩展，但却不是从开埠后才兴起的。早在开埠前七百余年的北宋末至南宋初，上海地区即开始同国外发生了贸易往来。

唐朝至北宋时代，上海（按：宋时设镇以前名华亭海）西面七十里的地方有一个青龙镇即同国外建立了相当频繁的商业关系。据记载：

“唐天宝五年置青龙镇，在青龙江上……。宋初，镇仍唐制。……管界水陆巡檢司在青龙镇。祥符間（引者按：即11世紀初）……以镇将理财，时海舶輻輳，島夷为市。”<sup>①</sup>（着重点是引者加的，下同。）

<sup>①</sup> 乾隆《青浦县志》，卷十二。



“今(引者按:指北宋元丰年間,即11世紀70—80年代)觀淞江正流下吳江县,过甫里,逕华亭入青龙鎮,海商之所湊集也。”①

“青龙鎮,称龙江,在四十五保,去县(引者按:指上海县)西七十里,瞰淞江上,据沪濱之口,島、夷、閩、越、交、广之途所自出。昔孙权造青龙战艦于此,故名。宋政和間改曰通惠,后复旧称,市舶提举司在焉。时海舶輻輳,风檣浪楫朝夕上下,富商巨賈、豪宗右姓之所会也。人号小杭州。”②

青龙鎮的对外貿易在北宋政和年間以前虽然经历了較長時間的繁盛,但此后不久即轉趨衰落。据記載:

青龙鎮,“宋时坊市繁盛,……俗号小杭州,及再經变乱,市舶之設又复迁徙,而鎮荒落。”③

上海地近青龙鎮。当青龙鎮对外貿易繁盛时,此处也开始同国外有了商业接触;青龙鎮荒落后,即逐漸取其商业地位而代之。所以,上海地区的对外貿易可以說兴起于青龙鎮荒落前后,即12世紀起初30年間的北宋末至南宋初。

上海在北宋末至南宋初取青龙鎮的商业地位而代之以后,在12世紀30—70年代的南宋时代,同国内外各地的商业关系即日見开展。以对外貿易而論,当时有外国商人陸續前来互市,管理对外貿易的市舶提举司及征收商稅和監督交易的權貨場也先后建立起来;同时,由于商业日盛,人口增多,并

① 朱长文:《吳郡图經續記》,卷中,水。

② 《弘治上海志》,卷之二,山川志,鎮市。

③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四,江南六,青浦旧县。

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設了鎮。后人对当时的这类情况有如下的記述：

“上海县旧名华亭海。当宋时蕃商輻輳，乃以鎮名，市舶提举司及權貨場在焉。”<sup>①</sup>

上海地区的对外貿易，到元代和明代有了进一步的扩展。据記載，在14世紀40—60年代的元至正年間，由于对外貿易的日漸发达，这里甚至出現了一批为对外貿易服务的专业船舶商梢水人員：

“至正中，戶才七万二千五百二，又海船舶商梢水五千六百七十五皆县(引者按：指上海县)人。”<sup>②</sup>

明末清初，上海地区的对外貿易一度陷于衰落。造成衰落的原因是：第一，清貴族的侵略軍在灭亡明朝的战争中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一度割断了各地的商业联系，不仅使国内市場陷于呆滯，而且严重影响了商品的进口和出口；第二，清初，統治者为了扑灭以郑成功及其子郑經在台湾所领导的反清势力，厉行海禁，下令“片板不准下海”，这又在政治上直接阻碍了东南沿海各港口对外貿易的进行。但是，到康熙年間，由于社会生产力逐渐趋向恢复，一度中断的各地商业联系又先后重新連接起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摧毁了台湾的抗清政权以后，又下令部分开放海禁。雍正七年(1729年)更“大开洋禁”。这就为我国对外通商关系的恢复提供了經濟的和政治的条件。上海地区的对外貿易也在这一过

① 《弘治上海志》，卷之一，疆域志，沿革。

② 《嘉庆上海县志》，卷四，志賦役，戶口。



程中逐漸由停滯轉趨活躍。

以康熙年間的情況而論，上海地區自康熙二十三年開放海禁及不久又設立海關後，國內外各地均有商船前來貿易，有來自閩、廣、山東、關東等國內沿海各地的貨船，也有從安南和日本等國外地區前來貿易的海船。同時，上海也有人赴國外經商，有的甚至遠航至日本。上海的市況及對外貿易因而迅速恢復了舊觀。這類情況，從下引記述中，即可略見一斑：

“康熙二十四年設江海關專司海洋商船稅鈔。……凡安南商船貨稅進口出口俱以七折征收，東洋商船貨稅進口以六折征收，出口不論貨物概收銀一百二十兩。……凡內商出洋及洋商入市，核計人口程期，每人日准帶食米一升五合……。”<sup>①</sup>

“上海之有權關始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關使者初至淞，駐札滌關，後因公廨窄陋，移駐邑城。往來海船俱入黃浦編號，海外百貨俱集，……邑商有願行貨海外者，較遠人頗便，大概商於浙、閩及日本者居多。”<sup>②</sup>

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後，清政府停止閩、浙關的對外貿易，而將對外通商限於廣州一地進行。上海地區的對外貿易，經歷了康熙和雍正二朝的發展，至此又再度轉趨停滯。雖然如此，但這裡的對內商務却仍舊頗為活躍，市況達到了相當繁盛的地步，為後來對外貿易的進一步開展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據乾隆《上海縣志》記載：

上海“自海關設立，凡遠貨貿遷皆由吳淞口進泊黃浦；城

① 《嘉慶上海縣志》，卷四，志賦役，關權。

② 葉夢珠：《閩世篇》，卷三，建設。

东門外，舳舻相銜，帆檣比櫛，不減儀征、汉口……。”<sup>①</sup>

上海知县范廷杰也于乾隆四十九年写道：

“下車之日，周覽疆圉，見夫浦流江汇，东注大海，人烟稠密，商賈輻臻，……。”<sup>②</sup>

## 第二节 鴉片战争前夜的对外贸易

乾隆年間，关于只准在广州一地进行对外贸易的禁令虽然长时期没有被明令廢除，但事实上在后来执行过程中却逐渐松弛。因此，上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在鴉片战争前夜的嘉庆初至道光十九年，即从18世紀末至19世紀30年代，又渐渐趋向恢复和发展。

嘉庆、道光年間，我国广大农村虽然基本上仍停留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状态，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城市与城市間以及水陆交通沿綫上，商业交往却日見頻繁和密切。手工业品日益增多地卷入了商品市場，新的商业路綫时有开辟，商品銷售市場不断扩大，全国商品成交量日見增加。商业資本的活跃为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扩展創造了多方面的条件。加以当时英国、美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积极在我国南方沿海开展商业侵略活动，企图在中国开拓市場，从而同中国发生了愈来愈頻繁的商业接触。这样，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到鴉片战争前夜的嘉庆、道光年間，就进入了一个更为发达的阶段。

---

① 乾隆四十八年續修《上海县志》，卷之一，风俗。

② 范廷杰：乾隆《上海县志》，序。



上海地区在鴉片战争以前的嘉庆、道光年間虽然还没有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通商关系，但由于只准在广州一地对外通商的禁令逐渐松弛，由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同南洋、朝鮮和日本的貿易却渐渐趋向恢复和扩大。

以嘉庆年間的情况而論，据記載：

“上海为华亭所分县。大海濱其东，吳淞繞其北，黄浦环其西南。閩、广、辽、沈之貨鱗萃羽集；远及西洋（引者按：即現在一般所称的南洋）、暹罗之舟，岁亦間至；地大物博，号称煩剧，誠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①

“上海壮县也。东連大海，北繞吳淞，西南环歇浦。……其海舶帆檣足以达閩、广、沈、辽之远，而百貨集焉，則于商賈为通津……。”②

“余以閏春捧檄来治县（引者按：指上海县）事，見夫民物之秀，土脉之腴，魚盐萑葦之沃饒，市舶商塵之錯杂，誠东南一赤紧也。”③

上海“自海关通貿易，閩、粵、浙、齐、辽海間及海国舶慮刘河淤滯，輒由吳淞口入艤城东隅，舳艫尾銜，帆檣如櫛，似都会焉，率以番銀当交会，利遇倍徙，可轉胸懋迁致富……。”④

上海地区的对外貿易及商业状况在道光年間又繼續有发展。据記載：

那时，“邑之黄浦数省市舶交集焉。”⑤

① 陈文述：《嘉庆上海县志序》，撰于嘉庆十九年秋。

② 卢 焯：《嘉庆上海县志序》，撰于嘉庆十九年。

③ 叶 机：《嘉庆上海县志序》，撰于嘉庆十九年夏；时叶机为上海知县。

④ 《嘉庆上海县志》，卷一，志疆域，风俗。

⑤ 張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迢迢申浦，商賈云集，海艘大小以万計，城内外无隙地，……。”<sup>①</sup>

“黄浦之利，商賈主之；而土著之为商賈者，不过十之二三。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无隙地，……。”<sup>②</sup>

英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早在鴉片战争爆发以前即探知了上海商业地位的重要性，对上海与国内各地的商业关系也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而处心积虑想进窥上海，把上海作为入侵中国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以至广大华北地区的据点，把上海据为对中国进行殖民地貿易的主要港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們便在鴉片战争的后期，即1842年6月中旬，以军事力量进犯上海。也正因为如此，他們又在和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时，强迫清政府同意把上海和广州、厦門、福州、宁波四个口岸一道开辟为商埠。

---

① 黄本銓：《梟林小史》，弁言。

② 張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 第二章 外国資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及 商埠和“租界”的开辟

### 第一节 軍事入侵和商埠的开辟

1840—1842年，英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对中国发动了鴉片战争。鴉片战争是英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为了扩展国外市場、掠取殖民地、加速資本积累，而对中国进行的一次赤裸裸的武装侵略。那次武装侵略就其历史順序来看，是英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在国外进行的多次殖民地掠夺战争的继续。正如馬克思所严正揭露的：“美洲金銀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隶化，被埋于矿坑，正在开始的东印度的征服与劫掠，非洲被轉化为商业性黑人猎夺場所，都表示了資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要素。紧随此等过程而起的，是欧洲諸国以地球为舞台而展开的商战。那种商战，是以尼德兰对西班牙的叛乱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取得了广大的范围，而在对中国的鴉片战争等等中，继续发生作用。”<sup>①</sup>（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1840年，英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对中国发动了可耻的鴉片战争以后，英国侵略軍即于1841年1月至1842年5月攻

---

<sup>①</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48—949頁。

占了中国的領土香港、厦門、定海、鎮海、宁波及乍浦等地，不久又集中兵力进犯长江流域。上海地处长江口，首当其冲。英国侵略軍的兵船从1842年6月初起就在长江口外的海面窜扰，6月13日即开始进窺吳淞。当时的吳淞守軍虽然英勇地抵抗了英国侵略軍的进犯，但是，后来由于英国侵略軍繞道宝山偷襲，而清政府地方官吏自苏松太道巫宜禛以下又相继弃城逃跑，上海乃于6月19日落入敌手。①英国侵略軍占領上海以后，即大肆搶劫、勒索、奸淫、燒杀，无所不为，充分暴露了海盜兽性，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刻骨仇恨。据当时目睹英国侵略軍种种暴行并身受其害的上海居民曹晟記載：“洋人之入也，人民播迁，家业蕩散，死亡病苦，靡不备尝；一大劫运也，則凡有知識者，当視之如切齿，仇恨之如毒蛇蝎……。”②

英国侵略軍于1842年6月中旬攻占上海后，7月初即溯江西上，向长江流域內地窜扰。他們于7月21日攻占了鎮江，不久便兵临南京城下。昏庸腐朽的清王朝至此已完全丧失抵抗能力，不得不于1842年8月29日同英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簽訂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約”。“南京条約”中关于广州、厦門、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及协定关税等規定，决定了上海被强辟为商埠的命运，也开始了上海对外貿易的殖民地化。

1843年11月8日，即“南京条約”簽訂后的一年零两个多月，英方簽約代表璞鼎查（H. Pottinger）便选派以前在印

① 《同治上海县志》，第十一卷，兵防。

② 曹晟：《夷患备尝記》。



度炮兵队任职的巴尔福上尉 (Captain Geoge Balfour) 来上海做第一任領事。巴尔福到达上海后的第七天，即 11 月 14 日，就以領事署名名义貼出了第一張布告，其中略称：上海将于本月 17 日正式开为商埠，所有条約規定各項，均于該日发生效力。过了三天，即 1843 年 11 月 17 日，上海就正式被辟为商埠。

英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继軍事入侵之后，根据“南京条約”，强迫清政府把上海辟为商埠不是偶然的。开辟国外市場、扩展对外貿易、掠夺殖民地，是資本主义生产賴以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之一。正如列宁所揭示的：“資本主义只是广闊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結果。因此，沒有对外貿易的資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設想的，而且的确沒有这样的国家。”<sup>①</sup> 英国在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完成了产业革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由于生产的迅速发展，資本主义生产要求开拓愈来愈广闊的国外市場。到了鴉片战争爆发前夜的 19 世紀 30 年代，英国的資本主义生产又进一步向前扩展，为了更大規模地向国外推銷商品，从而摆脱生产过剩的經濟危机，就更积极和更凶恶地向外扩张，力图在世界各地夺取更大的海外市場。經濟落后的国家，由于工业生产不发达，既可成为資本主义的商品銷售市場，又能作为其廉价原料的供給地，因而大多成了資本主义国家开拓国外市場的主要对象。所以，英国資本主义在 19 世紀起初 30 年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后，就不擇手段地对国外进行愈来愈凶狠的商业侵略，特别是致

---

<sup>①</sup> 列宁：《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見《列宁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4 頁。

力于把經濟落后的国家卷入世界經濟漩渦之中，以便对这些国家进行旨在推銷工业品并掠夺原料的殖民地貿易。中国当时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員广闊、資源丰富、但經濟落后的国家，早在18世紀以前即已引起了英国資本主义殖民势力的覬覦，并开展了中英貿易。19世紀的前30年中，英国对中国的貿易又进一步有所扩大。但在这里需要指出，到1842年簽訂“南京条約”时为止，清政府只限定在广州一口同欧美資本主义国家通商。所以，19世紀40年代以前的中英进出口貿易是在广州一地进行和扩大的。这段时期，英国正处在产业革命之后大大发展了各类資本主义工业的时候，处在急切需要扩展殖民地貿易的时候，因此，它就必然不会满足于仅在广州及华南一隅通商，而力图把它的侵略势力远伸到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富饒的长江流域。上海地处中国海岸的中点，是进出长江流域的門戶，有物产丰富和盛产絲、茶等特产的广大腹地，水陆交通便利，商品經濟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市場容量較大，这就引起了英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垂涎。

英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对上海的垂涎，可以說由来已久。早在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中有一个名叫毕谷(Pigou)的人就曾开始感到上海作为对华通商口岸的好处，认为上海是一个有价值的商品銷售市場，并建議英国政府进取上海；因此，数年后，即有英国人被派到中国来从事調查，探察中国官吏的意見。① 1793年和1806年，英国政府还曾特地派使节

① C. 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P. 1.

到中国来，向清政府一再提出上海开港的要求。<sup>①</sup>至19世纪30年代，英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希图开辟上海为商埠的欲望已达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2年决定派其广东商馆职员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偕同充任翻译的传教士郭实猎夫(Charles Gutzlaff)等人乘阿美士德号船(Lord Amherst)来上海及中国沿海其他各地探察。<sup>②</sup>阿美士德号于1832年6月20日偷偷驶进吴淞口。林赛和郭实猎夫等人到达上海后，即忙着了解商情，测量长江和黄浦江的水道，收集军事情报。他们在停泊上海的头7天内，看到从天津和奉天等地开来的装运大豆和面粉的船只有四百多艘。以后几天，又看到远从台湾、福建、广东、越南、暹罗及琉球等地开来更多的船只；其中，由福建一地开到的船只每天就约有

---

①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的发端》，见《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一年》，第45页。

② 关于林赛和郭实猎夫等人乘“阿美士德号”来上海及中国沿海其他各地探察的情况，请参看下列各书。

George Philip: 《The Log of the Shanghai Pilot Service (1831—1932)》, P. 2—4.

C. 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P. 1—9.

· 張德昌：《胡夏米貨船來華經過及其影響》，見社會調查所1932年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第60—79頁。

《同治上海縣志》，卷十一，兵防。

南木：《鴉片戰爭以前英船阿美士德號在中國沿海的偵查活動》，見列島編《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105—112頁。

T. W. Maclellan: 《The Story of Shanghai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Port to Foreign Trade)》, P. 5—7.

Ellen Thorbecke: 《Shanghai》, P. 8—9.

三、四十艘。林賽和郭实猎夫等人看到了当时上海的这种貿易盛况，大为叹羨；认为：就当时中国的国内貿易来看，上海已超过广州，将来的发展前途更是未可限量。郭实猎夫甚至这样宣称：“上海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人准許来上海貿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已往一直被人忽視，实在太令人奇怪了。”<sup>①</sup> 林賽在写給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也說：“和这个地方（引者按：指上海）自由进行貿易得到的利益将是无法估計的。”<sup>②</sup> 因此，他們都把上海看成是进一步对中国进行殖民地貿易的“最好的通商口岸”，并想就此开始在上海同中国进行貿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們曾費尽心机在上海天后宮和当时的道台会晤一次，并提出了通商的要求。但是，他們那次并未能如愿，結果不得不在1832年7月8日离去。

林賽和郭实猎夫等人上海之行，虽沒有达到通商目的，但却探得了上海軍事設施的虛实，并因而产生了武力侵夺的强盜念头。郭实猎夫曾毫不掩飾地写道：“这次航行的結果，使我产生这种信念：只要英国政府坚持要求，与中国东北部（引者按：当时在中国南方进行侵略活动的外国人都把包括上海在内的江、浙地区称为中国的东北部）的貿易是可以开放的。我的微小的愿望是英国政府将会替英国商人获得这样大的貿

---

① 轉引自南木：《鴉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偵查活动》，見列島編《鴉片战争史論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0頁。

② “Jardines” and the EWO Interests, P. 47.



易的。但是不恐吓那个衰弱和可鄙的政府，而采取商議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結果。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sup>①</sup>

林賽和郭实猎夫等人关于上海商情、商业地位的重要性以及軍事虛实等情况的报告，更加引起了英国資产階級想来上海通商的貪欲，也大大加强了英国資本主义侵略勢力以武力攫取上海为商埠的野心。因而，英国侵略者終于在鴉片战争中的 1842 年軍事入侵上海，并于 1843 年依据“南京条約”正式强辟上海为商埠。

## 第二节 外国侵略者强占“租界”的罪行

上海被正式开辟为商埠后，外国侵略者的第一要务是在这里强占供他們肆无忌惮地进行商业掠夺、为所欲为并策划种种阴谋活动的所謂“租界”。

强占“租界”是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勢力继强辟通商口岸后所必然要采取的步骤。我們知道，野蛮的軍事侵略及因此而攫得的政治特权，是資本主义侵略勢力賴以推行和扩展其掠夺性殖民地貿易的两大支柱。沒有野蛮的軍事侵略，固然談不到殖民地貿易的推行；但是，如果离开政治特权，殖民地貿易也难于扩展。这就是說，殖民地貿易是不能沒有政治特权的庇护的。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勢力为了在中国攫取这种政治特权，进行了种种詭詐和勒索，其中之一就是在許多通商

---

<sup>①</sup> 轉引自南木：《鴉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偵查活动》，見列島編《鴉片战争史論文专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111 頁。

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由它們直接管理的“租界”。“租界”是近代資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扩展殖民势力的特有产物。它实质上是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占有的一块殖民地。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在这块实质上是“国中之国”的殖民地內排除中国政府的一切政治和經濟权力；建立自己的統治。这样，它們就可以随时以“租界”为据点，凭借在“租界”中攫得的种种特权，对中国进行其愈来愈凶狠的殖民地貿易。上海的“租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現的。

英国是第一个侵入上海的資本主义国家，也是在上海攫取“租界”的首要罪犯。早在1842年“南京条約”簽訂之初，英方簽約代表璞鼎查即有在上海勒索“租界”的打算。英国第一任領事巴尔福于1843年11月初到达上海后，立即忙着做两件事：一件是准备貼告示宣布上海开埠；另一件就是开始勒索土地划定居留区。巴尔福的这类勒索行徑，由于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和清政府的拖延，起初并未得逞。但是，他并没有因而死心，在往后的长时間內，又一再向清政府进行交涉和訛詐。到1845年，巴尔福更以“华洋分居可以避免彼此間的糾紛”为借口，进一步向当时的上海道台宮慕久提出开辟居留区的要求。宮慕久是一个昏庸的官僚，一听说“华洋分居可以避免彼此間的糾紛”，能减少行政上的麻煩，便开始和巴尔福进行談判。1845年11月29日談判結束，宮慕久便在巴尔福的誘騙和訛詐下，經過清政府的批准，用道台名义和告示形式公布了一个名为上海地皮章程的協議条款。这个告示中写道：“划定洋涇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居留地的南界和北界虽經划定，而东面也

默认以黄浦江为界，但是西界却未被确定下来。1846年，巴尔福为此又和宫慕久进行谈判，结果于是年9月24日确定居留区的西界为界路（Barrier Road）。至此，英国侵略者处心积虑强行勒索的“租界”乃正式划定下来。当时英国“租界”的范围是：东到黄浦江，南到洋涇浜（即今延安东路），西到界路（即今河南路），北到李家庄（即今北京东路）；全部面积约达830亩。<sup>①</sup>但是，英国侵略者并没有以此为满足。巴尔福在迫使宫慕久公布1845年地皮章程之初，就想把英“租界”的北界从李家庄扩展到苏州河边，即把“租界”和苏州河之间的李家庄也划进“租界”中去。1846年10月，巴尔福去职，另一个更凶恶的侵略分子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继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一到任就阴谋着手完成巴尔福遗留下来的侵略计划。他于1848年寻找借口，强迫新任上海道台麟桂扩展“租界”。麟桂也是一个昏庸懦弱的官僚，经不起胁迫，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于是，在1848年11月27日，英“租界”的西界就由界路扩展到了泥城浜（即今西藏中路），北面也从李家庄扩展到了苏州河。这样一来，英“租界”的全部面积已达2,820亩，比初次划定的面积大了2倍多。<sup>②</sup>

继英国之后在上海勒索“租界”的是法国。自1842年英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并因而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以后，法国侵略势力对此十分眼热，也跟着加

---

①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的发端》，见《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一年》，第53、63页。

② 同上书，第63—64页。

紧策划对中国的侵略，企图乘机车利。1843年12月，即“南京条约”签订后一年多，法国政府便派遣了一个以全权公使赖格纳（Théodore de Lagrené）为首的特使团来华。根据当时法国政府的训令，赖格纳等人组成的使团来华的任务是：鉴于“南京条约结束了中国与不列颠的战争，……给英人以许多新便利，除广东外，英人的轮船和商业，又得到中国中部的四个口岸，即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自由通商了。同时在那些地方，又可设置领事，……为我国（引者按：指法国）各大商家来日贸易便利起见，非如他国所得的一样得到同样平等待遇不可。所以我国和中国政府订立通商和好（？）条约，如英国的南京条约，乃为必不可少之事。”<sup>①</sup> 赖格纳一行于1844年8月13日乘兵舰三艘到达澳门，同年10月24日即用种种卑劣手段诱使并胁迫昏庸的清政府官僚耆英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黄埔条约”第22条中规定：法国人可以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租地建屋居住。这就使法国侵略者找到了在中国勒索“租界”的根据。赖格纳在签订“黄埔条约”后，即率领随行人员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四个新辟商埠进行调查。他在上海作了种种窥探以后，即写信回国报告国王说：“……上海的地位，比较福州、厦门、宁波，更为优胜。我国（引者按：指法国）货品，凡合于广东者，无不合于上海。至于我们所欲购的货物，象生丝、绿茶之类，均可于上海低价购得

---

① 《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Changhai》，P. 5。  
译文转引自董樞：《搖籃中的法租界》，見《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一年》，第76—78頁。



之。……华人虽极不愿，但亦无可如何的！”<sup>①</sup> 法国政府接到了賴格納这份报告后，即积极进图上海，取消了在广东的領事署，改在上海設領事署，并派遣賴格納使团中的秘书敏体尼 (de Montigny) 为法国駐上海的第一任領事。敏体尼于 1848 年 1 月 25 日到达上海就职后的第三天，即租下一座位于洋涇浜和上海县城之間的房子作領事署。同年 7 月末，有一个原在广东經商的法国商人雷米 (Remi) 来上海。他一到达上海即写信給敏体尼說：“我很希望……租些地面，起造商行；所以特来求你……向中国官厅交涉，……我所需之地，是在北达洋涇浜，西至森林工場；至于东南两方，我尚不能切实指定，但依我的希望，总想沿着河浜，伸張得越远越妙……。”<sup>②</sup> 敏体尼本来早就有在上海仿英国人之例开辟法国人居留地之意，一接雷米的請求书，即据中法“黃埔条約”第 22 条向当时的上海道台吳健彰交涉，要求划定法国“租界”。吳健彰沒有立刻答应他的要求。因此，这个穷凶极恶的侵略分子敏体尼竟至蛮横无礼地再度写信警告說：“……我大而且强的法国，是依据条約上的規定，来向中国天子，求借一段地盘，……此事……乃是一个强国在要索一件权利，你該对此强国負責的。……我立等着你的回复。不然，我真要迫不得已去申訴了。且在此最短

---

① «Relation de Chine avec Puissances (Coodier)», P. 100.

譯文轉引自董樞：《搖籃中的法租界》，見《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一年》，第 81 頁。

② «Archives du Consulat (Shanghai)».

譯文轉引自董樞：《搖籃中的法租界》，見《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一年》，第 82—83 頁。

時間內，法國公使將坐巴容利號軍艦北上；我想他也要感覺到如此對我大法國的無禮！”<sup>①</sup>正在敏體尼以強盜的語言進行威脅和勒索的時候，麟桂接替吳健彰出任上海道台。於是，這個強盜成性的侵略分子就轉向麟桂進行勒索。在敏體尼的脅迫下，麟桂終於答應了他的無理要求，經過清政府的批准，在1849年4月6日貼出告示，宣布：“勘定上海北門外；南至城河，北至洋涇浜，西至關帝廟褚家橋，東至廣東潮州會館沿河至洋涇浜東角”為所謂法國“租界”，並注明“倘若地方不敷，日后再議別地，隨至隨議……。”<sup>②</sup>這樣一來，上海又有一塊總面積達56公頃的土地被法國侵略者勒索去了。但法國侵略者並沒有就此滿足。他們在1861年，又以曾經協助清政府鎮壓小刀會起義為由，要求擴充“租界”。經過當時的法國駐上海領事愛棠(B. Eden)同當時的上海道台吳煦交涉，結果又把小東門外的約三公頃土地圈入了法“租界”的範圍。那時，法“租界”的面積已擴展到了59公頃。這是法國侵略者第一次擴展“租界”。<sup>③</sup>往後，法國侵略者還擴展過幾次“租界”，占去了更多的土地。<sup>④</sup>

美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也繼英國侵略者之後以強盜手段來上海勒索了“租界”。美國侵略勢力鑒於英國侵略者於鴉片戰爭以後在中國獲得了很多權益，乃於1844年2月派遣全權公使顧聖(Caleb Cushing)來華進行侵略活動。顧聖到達澳門後不久，即迫使清政府同他簽訂了“望廈條約”。“望廈條約”中規定：美國人可以挈帶家眷至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居住、貿易並租地建屋。1846年，有一個美國人吳利國(Henry G. Wolcott)來上海經商。他到上海不久就被委派為美國駐滬

代理領事，并在英租界內設立領事署。美国侵略分子在上海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十分狡猾和十分狠毒的。吳利国到达上海和被派为駐沪代理領事后不久，便一方面积极贊助英国和法国勒索“租界”的罪恶活动，另一方面又竭力准备攫取土地作为美国“租界”。1848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主教文惠廉(W. J. Boone)率領一批美籍教士以极低廉的价格在苏州河北岸的虹口一带广置土地，建筑房屋，野心勃勃地要把那一带地方划定为美“租界”。文惠廉等人擅自侵占土地的活动，是美国侵略者在上海实际勒索“租界”的开始。此后，美国历任駐沪領事就借此既成事实一再进行无耻的勒索。至1863年6月，美国侵略者在上海勒索“租界”的目的终于达到，上海道台被迫划定苏州河北岸一大片面积約达7,856亩的地区为美

---

① 《Archives du Consulat (Shanghai)》。

譯文轉引自董樞：《搖籃中的法租界》，見《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一年》，第85頁。

② 董樞：《搖籃中的法租界》，見《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一年》，第89頁。

③ 席滌尘：《法租界沿革》，見《上海研究資料》，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145—147頁。

④ 法“租界”的第二次扩展发生于1900年，总面积由59公頃扩展到了144公頃。其四界已伸展为：东至城河浜，南至打鉄浜、晏公庙、丁公桥，西至顾家宅、关帝庙，北至北长浜。从1900至1914年，法国侵略者又陸續越出“租界”范围非法修筑了二十多条馬路，并迫使当时的袁世凱卖国政府承认。这样一来，法“租界”又实现了第三次扩展。这次扩展共侵占了土地878公頃，从而使法租界的面积增加到1,022公頃，即較1849年最初侵占的面积扩大了近20倍。至此，上海地区东到黄浦滩、西到徐家汇、南到民国路（即今人民路）、北到爱多亚路和福煦路（即今延安东路和延安中路）的一大片土地就被作为“租界”落入了法国侵略者之手。

“租界”。美国侵略者在上海勒索“租界”时所表现的蛮横无理态度，与英、法两国侵略势力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1852年，美国驻上海的代理领事克宁汉（E. Cunningham）在进行勒索“租界”的无耻活动时，曾极其蛮横无理地威胁当时的上海道台说“如不答应要求，将采取极端手段”，并限令于24小时内答复。上海道台在24小时内未如期答复他的要求。这个蛮横跋扈的侵略分子竟提出了所谓最后通牒。他在这份最后通牒中使用了强盗语言，进行了无耻的威胁：“本领正式通知贵道台：今后不复与贵道台来往，本领认为中美间在此地之依约行为，已经停止。在贵道台承认所争论之权利以前，敝国船只，不复缴纳任何出入口税。本领当即请敝国驻广州之专员，即派战舰来此。未到以前，敝国侨民当组织军力以自卫……。”<sup>①</sup>美国强盗在这些话中充分暴露了其蛮横无耻的丑恶嘴脸。这些话也正是他们穷凶极恶地侵略中国的供状。

英、美、法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一攫得“租界”，即排斥中国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把它变成为“国中之国”，并以此为巢穴，贩卖鸦片，组织走私，推销商品和掠购原料。总之，对他们来说，有了“租界”，就能更顺利地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殖民地贸易，就能对中国进一步进行全面的侵略。

### 第三节 外国商人“冒险家”的纷至沓来

上海被强辟为商埠后，即有大批外国商人“冒险家”、流氓

---

<sup>①</sup> 蒯世勛：《上海公共租界的发端》，见《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一年》，第70—71页。

及其他投机分子先后涌到。他们虽然来路不同，经营的业务和搞的把戏也有异，但是却有着一个共同的资本主义强盗打算。那就是：不择手段，凶狠地通过掠夺性的殖民地贸易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以发财致富，积累资本。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殖民制度象温室般地使贸易与航运业成长。……在欧洲外部直接由劫掠，奴役，谋财害命等手段劫取到的财宝，都流回母国，在那里转化为资本。”①

英国资产阶级侵略势力早在鸦片战争以前的长时期内一直垂涎于到上海来从事殖民地贸易，1843年，上海被辟为商埠的消息传出后，外国商人“冒险家”个个兴奋若狂。璞鼎查在代表英国同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后，即曾向英国资产阶级表示：这个条约给英国开辟了一个广大的市场，即使开动兰开夏(Lancashire)的全部纺织工厂，也不足以供给中国一省的需要。②英国商人在兴奋若狂之余，大家都争先恐后要涌到上海来从事商业掠夺。他们有的忙着启运棉纺织品，有的带来呢绒，有的则准备了大量鸦片。这批英国商人“冒险家”当时竟利欲熏心到了迹近荒唐的地步。马克思曾于1858年摘引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和广州记者科克(W. Cooke)的一段描写来形容当时的情况：1843、1844、1845年，上海、厦门、福州、宁波等地先后被辟为商埠后，英国舍菲尔德(Sheffield)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52页。

② A. J. Sargent: «Angl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 P. 106.

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0—51页。



一家有名的商行竟無視于中國人用筷子吃飯的習慣，把大批刀叉運到中國來銷售。另一家著名的倫敦商行甚至向中國輸出了大批鋼琴。<sup>①</sup> 據說，他們的如意算盤是：中國應有 2 億婦女，上海等口岸一開放，最低限度每 200 個婦女中會有一個願意學鋼琴。<sup>②</sup>

繼英國商人涌達上海之後，法國的商人“冒險家”也接踵而來。第一個來到上海的法國商人雷米，在洋涇浜開設了一家雷米洋行，為法國商人“冒險家”來上海設行經商开辟了道路；此後，就有許多法國商人源源來上海從事掠奪性的貿易活動。

美國商人來上海從事掠奪性的商業活動為時也很早。上海於 1843 年 11 月開埠後不久，即有一個名叫吳利國的美國商人代表一家美國商行來上海經商。<sup>③</sup> 至 1847 年，來上海從事掠奪生涯的美國商人和投機“冒險家”已有 17 人。<sup>④</sup>

英、美、法等國的侵略分子繼上海開埠後的紛至沓來，使得上海平添了愈來愈多的外國人。據統計：1846 年有 108 人，1854 年達 243 人，至 1860 年更增加到了 569 人（一說為 1,400 人）。<sup>⑤</sup> 在這些愈來愈多的外國人中，絕大部分是到上海來從事

① 參見馬克思：《貿易與條約》，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9 頁。

② 轉引自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 1 卷，三聯書店 1957 年版，第 493 頁。

③ G. Lanning-S.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 282.

④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 1 卷，三聯書店 1957 年版，第 400 頁。

⑤ 上海市文獻委員會 1948 年編印：《上海人口志略》，第 25—26 頁。

掠奪性殖民地貿易的商人和其他投機“冒險家”。例如：1850年，上海共有外國人149人，其中就有119人是屬於不同的商業團體的。<sup>①</sup> 不僅如此，在這期間，許多外國駐上海的所謂“領事”也大都是由商人兼任或商人出身的。據記載：在19世紀50年代之初，顛地洋行（Dent, Beale & Co.）的老板比爾（F. C. Beale）以一個英國商人的身份兼任過駐上海的葡萄牙領事、荷蘭副領事、普魯士代理領事；林賽洋行（Lindsay & Co.）的老板浩格（Hogg）也曾兼任過駐上海的漢堡領事；普魯士駐上海的領事也曾由美商斯密士洋行（Smith, King & Co.）的金氏（D. O. King）兼任；法國駐上海領事愛棠出身於法國雷米鐘表行（D. Remi's Watch Store）；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七大股東之一的克寧漢也曾任過美國駐上海的領事代表。<sup>②</sup> 此外，直到1857年，一批英國商人還曾先後充任過律伯克、伯磊門以及丹麥和暹羅等駐上海的領事代表。所以，在19世紀50—60年代，“商人領事”（Merchant Consuls）的名詞曾在上海風行一時。<sup>③</sup>

外國商人“冒險家”和其他侵略分子到達上海後大都忙着建立各式各樣的洋行，以便從事掠奪性的商業活動。1843年末，即上海開埠後一個半月不到，就有浩里德·衛斯公司

①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400頁。

② 嚴中平：《五口通商時代瘋狂殘害中國人民的英美“領事”和“商人”》，載1952年6月17日大公報《史學周刊》第75期。

③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390頁。

(Holliday, Wise & Co.) 的代表卫斯和吉布 (John Wise, Gibb), 仁記洋行 (Gibb, Livingstone & Co.) 的代表吉布 (John D. Gibb), 顛地洋行 (Dent & Co.) 的代表斯密司和比尔 (J. Mackrill Smith, F. C. Beale), 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 的代表德勒斯 (A. G. Dallas), 到达上海筹建洋行; 不久 (1843 年末至 1844 年初), 怡和洋行、仁記洋行、卫斯洋行、巴地洋行 (Wolcott, Bates & Co.)、顛地洋行就在上海划地造屋正式建立起来。① 到开埠后一年, 即 1844 年, 在上海先后设立的英国和美国洋行已有 11 家。② 过了 10 年, 即到 1854 年, 外国商人在上海设立的洋行更激增了约 10 倍, 共达一百二十多家。③ 这些洋行几乎全都设立在黄浦江沿岸。其中著名的有: 怡和洋行、大英輪船公司 (P. & O. S. N. Co.)、沙逊洋行 (Sassoon & Co.)、仁記洋行、奥古斯丁·赫尔德洋行 (Augustine Heard & Co.)、蕭氏兄弟洋行 (Shaw Bros. & Co.)、顛地洋行、特諾尔洋行 (Turner & Co.)、史密斯·甘納地洋行 (Smith, Kennedy & Co.)、旗昌洋行、会德丰洋行 (Wheelock & Co.)、亚丹森洋行 (Adamson & Co.)、福格洋行 (H. Fogg & Co.) 等。④ 自此以后, 随着外国侵略分子商业掠夺活动的日益加强, 上海出现的洋行更是迅速增多起

① G. Lanning-S.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 282.

②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1 卷, 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第 399 頁。

③ «“Jardines” and the EWO Interests», P. 48.

④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1 卷, 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第 510—511 頁間附图及第 522—523 頁間附图。

来。据記載，1876年前后，上海已設有洋行二百余家。<sup>①</sup>

成群的外國商人“冒險家”繼上海開埠之後湧到上海廣設洋行，從事“冒險生涯”，其目的無非以此為據點，對中國進行殖民地貿易，從而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掠奪中國人民。1854年7月間，一個住在上海“租界”內有勢力的英國商人即曾對當時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一般地主（引者按：當時外國商人在“租界”內“租”地建造洋行）和投機商人……所關心的，卻是如何不失絲毫時機，發財致富；……我希望，最遲在兩三年內，發財而去；所以，以後上海給水淹沒或給火燒掉，與我會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是掙錢，盡我們的能力，掙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凡是法律所許可(?)的方法和手段，個個都好。”<sup>②</sup> 這段話是有其普遍代表性的。從這段赤裸裸的貪婪無恥的強盜語言中，人人都可以明顯看出當時外國商人“冒險家”成群結隊湧到上海來的目的是什麼！

外國商人“冒險家”的紛至沓來和外國洋行的紛紛建立，標志著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進行商業掠奪的進一步發展。如果說開辟商埠、建立“租界”和攫取特權等等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為對中國開展掠奪性的殖民地貿易準備種種經濟的和政治的條件，那末，外國商人“冒險家”的紛至沓來及外國洋行的紛紛建立，就是它們在各種條件不斷具備的情況下從事

---

① 葛元煦：《滬游雜記》，弁言。

② Alcock: 《Capital of The Tycoon》，Vol. 1, P. 37—38。

譯文轉引自謝世勛：《上海英美租界在太平天國時代》，見《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一年》，第299頁。

掠奪性殖民地貿易活動的開始。正是這些紛至沓來的外國商人“冒險家”，也正是這些紛紛建立起來的洋行，把大量萬惡的鴉片經由上海進口，向中國推銷工業品，從中國壓價搜購農副產品和工業原料，使中國的對外貿易帶上了愈來愈濃的殖民地性質，使中國人民在他們敲骨吸髓的巧取豪奪下遭受到愈來愈殘酷的剝奪和殘害。

## 第三章 可耻的鴉片貿易

### 第一节 鴉片輸入的情况

外国資本主义商人“冒險家”继五口通商后涌来上海，大部分一开始就是以鴉片販子的身份出現的。他們以可耻的鴉片貿易打开了对上海进行經濟掠夺的大門，并从而奠定了对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以至整个中国不断进行商业掠夺的基础。

鴉片貿易是一种由外国資本主义侵华势力所从事的殘害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人民的最可耻也最狠毒的殖民地貿易，在人类历史上是駭人听聞的。馬克思早在1858年即揭露过这种貿易的可耻本质。他严正指出：“鴉片这项惊人的貿易，无论我們就形成商业据以环繞着旋轉的所謂軸心的悲慘的冲突而言，或者就其对于东方和西方間一般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sup>①</sup>

外国資本主义商人“冒險家”和其他侵略分子对华經營可耻的鴉片貿易可以說由来已久。早在鴉片战争前的长时期內，中国同欧美資本主义国家即进行了相当頻繁的进出口貿易。

---

<sup>①</sup> 馬克思：《貿易还是鴉片？》，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頁。



当时，中国由于物产丰富而广大地区在经济上又都是基本上自给自足，从而一方面经常不断有大量土特产和手工业品出口，另一方面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工业品却不甚需要。这就经常出现出口大于进口的现象，使中国长期处在出超国家的地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虽想在对华贸易中获利，但由于中国经常出口大于进口，所以往往反而出现对华的贸易逆差。它们为了弥补这种贸易逆差，不得不被迫经常向中国支付大量的现金。这种局面的存在对于它们是不利的。怀着到中国来进行殖民地掠夺贸易的强盗打算的欧美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当然不会听任这种局面一直存在下去。它们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一方面积极准备武装侵略中国，以便攫取贸易特权，另一方面则力图寻找别的办法来及早改变这一状况。到了18世纪中叶，它们终于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把这种商品输入中国，不仅能弥补贸易逆差，反可使中国的金银流入它们的腰包，同时还能使中国人民因而丧失抵抗侵略的意志和能力。这种特殊的商品就是鸦片。于是，它们便采取各种卑鄙手段，集中力量向中国市場推销鸦片。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鸦片战争前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主要是在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国南方各地开展的。当时对中国进行可耻的鸦片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和美国。它们于18世纪前期开始把鸦片输入中国时，数量虽不大，但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输入数量就日益增多。它们为了更凶恶地剥削和残害中国人民，甚至不惜到世界各地去搜罗鸦片到中国市場上来销售。据记载：1727年，由英国鸦片贩子运销到中国来的鸦片约达二百箱。1757年，英国占领了印度的鸦片

产地孟加拉；再过10年，英国运销中国的鸦片就增加到一千箱。1773和1797年东印度公司先后从英属印政府那里取得了鸦片专卖权和制造鸦片的特权，从此，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就与日俱增，其流毒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据统计：1800—1811年的11年间，单从印度孟加拉输入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即达2,650箱，最高如1810—1811年竟有3,592箱；1811—1821年，每年的平均输入数量又增加为2,824箱；1821—1828年的年平均输入量更增加到了4,795箱，最高如1826—1827年竟达6,570箱之多。美国鸦片贩子对中国开展可耻的鸦片贸易在时间上虽晚于英国，但也十分猖獗。正当英国把大量印度出产的鸦片投入中国市场时，美国的鸦片贩子也在土耳其等地大量搜罗鸦片源源运销中国。据统计：在1805—1828年的23年间，美国鸦片贩子单从土耳其一地运到中国来销售的鸦片就达3,757箱。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十多年间，英、美等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有了迅速的增长，发展到了十分猖獗的地步。它们在1828—1829年运销中国的鸦片共有13,868箱。1830年以后，增加更多。1830—1831年为19,956箱。1834—1835年为21,885箱。1838—1839年，即鸦片战争爆发前一两年，竟上升为40,200箱。<sup>①</sup>

鸦片战争以前，英、美等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大都是从广州进口的。上海于1843年被辟为商埠后，即迅速变成了英、美等国把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口岸。早在上海开埠之

---

<sup>①</sup>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8—239页。

初的 1844 年，即有怡和洋行把大量鴉片运来銷售。1848 年，停泊在中国沿海各口岸的外國鴉片躉船共有 35 只，其中就有 12 只停泊在上海的門戶吳淞口。1849 年，吳淞口外國躉船上囤聚的鴉片即达 22,981 箱。<sup>①</sup> 在当时的上海，販賣鴉片和吸食鴉片都已毫不避人耳目；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整箱整箱的鴉片在街上运来运去。到了 1856—1857 年，鴉片且已成了上海市場上公开買賣的商品，即每箱只要納稅銀 30 兩就可以“合法”进口。外國鴉片販子至此不仅打开了在上海公开进口鴉片的大門，而且为鴉片輸入上海并通过上海流入广大內地取得了“合法”地位。从此以后，外國鴉片在上海以至全中国的流毒就一发不可收拾。

外國鴉片販子在上海經營可耻的鴉片貿易是日益猖獗的。1847—1860 年，上海进口鴉片的箱数及全中国估計消費鴉片的箱数如下表<sup>②</sup>：

年 份	上海进口箱数	全中国估計消費箱数
1847	16,500 箱	33,250 箱
1848	16,960	38,000
1849	22,981	43,075
1853	24,200	54,574
1857	31,907	60,385
1858	33,069	61,966
1859	33,786	62,822
1860	28,438	47,681

①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09 頁。

② 同上书，第 403、522、612、626 頁。

上表說明：第一，英、美等国鴉片販子經由上海把鴉片輸入中国的数量一开始就是很大的。1847年（有統計資料的第一年）經由上海輸入鴉片的箱数为16,500箱。这个数量，在1847—1860年間算是最小的，但若以之与1830年以前的数量比較，則可以說大得惊人。外国鴉片販子于1847年經由上海輸入中国鴉片的箱数（16,500箱），比他們在1830年以前任何一年輸入全中国鴉片的箱数要大。1829—1830年，中国全国进口的鴉片为16,257箱，这是1830年以前历年全国进口的最高数字。但是，外国鴉片販子于1847年在上海一地輸入中国鴉片的箱数就要比这个1830年以前历年全国进口最高数额多出243箱。第二，外国鴉片販子經由上海輸入中国的鴉片是逐年增加的。若以1857年的进口箱数和1847年比較，則10年后的1857年，較10年前的1847年增多了93.3%。1858年和1859年进口的箱数較之1857年又有增加。1847—1860年有資料可考的8年間，經由上海进口的鴉片箱数有7年是逐年增多的，只是在1860年略呈下降。第三，上海进口鴉片的箱数在全中国估計消費鴉片箱数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大的。1849、1857、1858、1859、1860年都超过了二分之一。1847年和1848年則接近二分之一。1860年占的比重最大，这一年上海进口鴉片的箱数占到全国全年估計消費鴉片箱数的59.6%。1853年占的比重虽然最小，但这一年也占到44.3%。这表明上海从1843年开埠之日起就成了外国鴉片販子把大量鴉片輸入中国的主要港口。

外国鴉片販子大量运到上海来銷售的鴉片在1856年以

前全部是走私进口的。<sup>①</sup> 怡和洋行继上海开埠之后即大量走私鴉片,这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1850年和1851年,上海破获了两起巨大的走私案件。其中大英輪船公司的輪船“瑪利·伍德女士号”(Lady Mary Wood)走私案,就是牵涉到鴉片走私的案件之一。美国鴉片販子的走私活动也不落后。1853年,美国駐华专使馬歇尔(H. Marshall)就曾在給美国国务院的秘密报告中这样供认:“我們美国人,几乎所有在上海及广州的美国人,都武装他們的商船,……停泊在諸江的口岸,滿載鴉片,抓住一切机会,售与中国商人……去年从印度輸入中国的鴉片,价值逾30,000,000元以上,沒有一包烟不是象上述走私状态进口的。”<sup>②</sup> 从这些事实中,我們不难看出:英、美等国鴉片販子是怎样用可耻的走私手段来对华經營可耻的鴉片貿易的!

英、美等資本主义国家通过可耻的鴉片貿易,早在鴉片战争以前即已使中国由出超国变成了入超国。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不仅不再把現金銀輸入中国,弥补貿易逆差,反而使中国的白銀大量外流。鴉片战争以后,英、美等国鴉片販子經由上海等口岸对中国进行更大規模的鴉片貿易,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白銀的外流,获得了神話般的利潤。

---

① “一八五六年十月,也就是‘亞罗号’事件发生的那一个月,据上海的記載‘中国官宪和烟販之間关于洋药(引者按:即鴉片)这个久悬未决的交涉,終于協議按每箱20元的稅率准許进入該口岸,这数目依当前銀元价格計算,等于紋銀二十两’。”見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9頁。

② 美国《众院档案》,第123号,第206—207頁。譯文轉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95頁。

据馬克思于1858年9月25日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的《鴉片貿易》一文中揭露：“英国政府在每箱鴉片上所花的費用約及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拍卖市場上却按每箱1,210至1,600卢比的价格出售。”<sup>①</sup>“1856年輸入中国的鴉片約值3,500万元，同年英印政府从鴉片壟断貿易中就得到了2,500万元的收入，恰好占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sup>②</sup>前面讲过，当时經由上海进口的鴉片約达全国消費总量的二分之一左右。所以，英国侵略者当时从鴉片貿易中所获巨額利潤大部分是經由上海市場掠去的：

## 第二节 鴉片輸入的恶果

外国鴉片販子把大量鴉片經由上海等口岸日益增多地运到中国来銷售，一开始就严重戕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从而严重摧殘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前从未自外国資本主义侵略者手里輸入过鴉片。那时，上海附近地区及长江流域也很少有人吸食这种毒品。大量鴉片继上海的开埠而日益增多地涌入后，就愈来愈广地流毒于上海附近地区及长江流域一带。从此以后，在这些地方即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染上了这种吸毒的恶习。吸食鴉片，使得許多人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精神受到毒害，并因而丧失了工作能力。关于这一点，正如馬克思所揭露的：甚至連当时的英国人蒙哥米利·馬丁（Montgomery Martin）也不能不在事实面前承认：

---

① 馬克思：《鴉片貿易》，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頁。

② 同上书，第86頁。



“不用說，‘奴隶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還是仁慈的。……販賣鴉片者在使不幸的人們的精神本質腐化、墮落和毀滅以後，還毒殺他們的身體，而每時每刻都向貪欲無厭的吃人神貢獻新的犧牲者。英國的殺人犯與中國的服毒自殺者互相競爭，向吃人神的神座上貢獻祭品。”<sup>①</sup>

外國鴉片販子，在上海開埠的初期，還依靠可恥的鴉片貿易在中國人民頭上掠去了大量的錢財。據統計：1847、1848、1849、1853、1857年，經由上海進口鴉片的貨值如下表<sup>②</sup>：

年 份	价 值
1847	8,349,440 元
1848	11,801,295 元
1849	13,404,230 元
1853	14,400,000 元
1857	13,082,000 元

外國鴉片販子通過可恥的鴉片貿易從中國人民頭上掠去錢財之多是驚人的。1849年，中國經由上海輸往國外的全部出口貨的總值是8,403,149元。<sup>③</sup>這個數目只及同年進口鴉片價值的62.6%。這就是說，在1849年這一年，經由上海運銷國外的絲、茶及其他土特產不僅換回來的全是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而且其價值只能抵輸入鴉片價值的62.6%，其餘37.4%還要與白銀去支付。1849年的情況如此，在這前後若

① 參見馬克思：《貿易還是鴉片？》，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頁。

②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403、522頁。

③ 同上書，第402頁。

千年內的情況也大同小異。

大量鴉片的汹涌輸入中國及中國白銀的源源外流，使得中國的財政與貨幣流通日益陷于混亂和困難，從而歸根到底又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負擔，并使中國人民在貨幣關係中遭到了嚴重的損害。首先，鴉片汹涌進口造成了貿易入超，貿易入超導致了白銀源源外流，而白銀源源外流又造成了財政枯竭。清政府在財政日益枯竭的情況下，就不斷加重對人民的榨取；於是，舊有賦稅加重了，新稅的征收不斷增加，其他的苛捐雜稅和勒索也跟着而來。這就不斷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負擔，嚴重降低了他們的日常生活水平。其次，白銀因源源外流而日益減少，還妨礙了市場商品的正常交易。因為，把白銀作為一種流通手段來看，它在流通速度一定的情況下是與流轉的商品量成正比例的。白銀貨幣既因源源外流而日益減少，這就不能不日益嚴重地影響到商品的流通數量，從而使交易不能暢通。當時，林則徐在上清朝皇帝的奏折中就曾談到這一問題：“臣歷任所經，如蘇州之南濠、湖北之漢口，皆闐闐聚集之地，疊向行商鋪戶暗訪密查，僉謂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數，問其一半售于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烟而已矣。”<sup>①</sup>農民和手工業者是最初把商品投入市場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市場交易因白銀貨幣日益減少而不能暢通，他們當然首蒙其害。此外，由於鴉片大量輸入致使中國白銀因源源外流而不斷枯竭，中國社會還出現了愈來愈嚴重的銀貴錢賤的危機，即銀價高於錢

---

<sup>①</sup> 林則徐：《湖廣奏稿》，卷四，錢票無甚關碍宜重禁吸烟以杜弊源片。

价，銅錢折換白銀的比率日益提高。据記載：19世紀初，一两白銀換銅錢1,000文以內，但到1845年即漲至要換2,024文，1849年又上升到要換2,355文。銀貴錢賤危机，使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其害。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售生产物大都分散而且数额小，一般只能換得銅錢，手工业工人及其他雇工出卖劳动力也因工資低而只能得到銅錢，但他們交納的地租和賦稅却是要按銀价折算付給的。这就經常迫使他們不得不以較多的銅錢去換取較少的白銀，从而承受因銀貴錢賤所帶來的損失，負擔也因而日益加重。对于这种事实，当时甚至連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认：“昔日两銀換錢一千，則石米得銀三两，今日两銀換錢二千，則石米仅得銀一两五錢。昔日卖米三斗，輸一亩之課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輸一亩之課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sup>①</sup>

所有上述情况表明：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的鴉片貿易猖獗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中国人民因而遭受的損害該有多么大！

---

① 《曾國藩全集》，奏稿卷一，各陳民間疾苦疏。

## 第四章 外国工业品的大量进口

### 第一节 1843—1845 年間外国工业品的 的汹涌輸入

成群的外国商人“冒险家”及其他侵略分子继上海开埠后的紛至沓来，除从事可耻的鴉片貿易外，还同时凶狠地开展了一般工业品的輸入，从而开始經由上海对中国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广大地区进行掠夺性的殖民地貿易。

外国商品輸入一开始就来势甚猛。1843年11月17日至是年年底，即上海开埠最初的一个多月內，就有7艘外国商船滿載貨物进口，輸入貨值共达433,729两。<sup>①</sup>（本章中列举的进口貨值，均不包括进口鴉片貨值。又，此处貨值单位“两”，系上海銀两，每100海关两等于111.40上海两。以下各章，凡以“两”为貨值单位时，均系指上海两，不另注明。——作者）

1844年，进口的外国商船和外国貨物又有增多。那一年，有44艘英国商船抵达上海，共8,584吨，載来貨物的价值为501,335鎊。<sup>②</sup>这个数额在当时是很大的。鴉片战争前的1830—1833年英国平均每年輸入整个中国的貨值約为七百

<sup>①</sup> 岑德彰：《上海租界略史》，第18—19頁。

<sup>②</sup>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4》，P. 33。

余万两，而1760—1779年平均每年則只有一百至一百四十余万两。<sup>①</sup>这就是說，英国于1844年經由上海一埠輸入中国的貨值(501,335鎊，按1鎊等于2.9两的比例，折合为1,453,871两)，即达它在1830—1833年平均每年輸入整个中国貨值的五分之一强，而比1760—1779年的任何一年为多。船舶进口的数目也說明了同样的問題。1844年以前20年的1824年，英国商船駛达中国的总数是45艘，最多的年份——1827年也只有86艘；<sup>②</sup>如果把1844年上海一埠进口英国船舶的数目(44艘)与之比較，則約合后者的二分之一强，而几与前者的数目相等。

1843—1844年，英国輸入上海市場的貨物，除少量的硝石等以外，絕大部分是机制工业品，其中有粗嗶嘰、羽毛紗、毛毯、天鵝絨、白布、灰布、印花布、鉄皮、鉛块、玻璃器皿等等。在这些机制工业品中，毛織品和棉織品又占极大比重。如果按进口数量多寡排列，則在1844年，灰布占第一位(246,539匹，值186,958鎊)，白布占第二位(152,300匹，值123,743鎊)，粗嗶嘰占第三位(12,595匹，值22,921鎊)。<sup>③</sup>

上海进口的貨物在1845年又有了进一步的增加，前来从事商业掠夺的資本主义国家也多起来了。那一年，抵达上海的外国商船增加为87艘，吨数也上升到了24,396吨，

---

① 严中平等編：《中国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选輯》，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頁。

② 馬士：《中華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2頁。

③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4», P. 32—33。

即船数比 1844 年增长了近一倍，吨数则多出了近两倍。在这 87 艘外国商船中，除 62 艘是英国船外，还有 19 艘美国船和 2 艘西班牙船，剩下的 4 艘则属于瑞典和荷兰等国。<sup>①</sup> 由于进口外国商船的数目急剧增加，1845 年，上海进口货值增长的幅度是很大的。那一年，上海进口货值共达 1,224,079 镑<sup>②</sup>，比 1844 年（501,335 镑）增加了 1.4 倍。在进口货值中：英国货值居首位，达 1,082,207 镑，占 88.4%；美国货值次之，为 93,518 镑，占 7.7%；再次为西班牙货值，共 7,521 镑，占 0.6%；其他瑞典和荷兰等国占 3.3%，货值一共为 40,833 镑。<sup>③</sup> 1845 年上海进口货物急剧增多的情况，还可从进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的变化中看出。那一年，上海进口的外国商品，除上年已有的粗呢、羽毛纱、毛毯、天鹅绒、白布、灰布、印花布、铁皮、铅块、玻璃器皿等等而外，又增加了棉纱、斜纹布、染色布、麻纱、阔幅绒布、手帕、马口铁、酒类等等。在这些进口商品中，棉毛织物仍占极大比重：灰布是第一位（达 992,178 匹，值 638,800 镑），白布为第二位（达 367,436 匹，值 264,820 镑），阔幅绒布是第三位（达 331,112 碼，值 143,738 镑），印花布是第四位（达 29,236 匹，值 20,474 镑），斜纹布为第五位（达 23,722 匹，值 15,343 镑）；再数下去，则要算粗呢、羽毛纱、毛毯等毛织物；其余商品如铁器、铅块、手帕、玻璃器皿、木材和酒类等等所占比重则甚

---

①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P. 71.

② 見附录，表 1。

③ 見附录，表 2。



小。<sup>①</sup> 进口商品在数量上的增长，也是很显著的。以英国商品的輸入量为例：1845年灰布进口达911,911匹，比1844年进口数量(246,539匹)增长了2.7倍；进口印花布則由1844年的18,961匹上升为1845年的26,816匹，即增加了41.4%；进口白布1845年(341,581匹)也較1844年(152,300匹)增长了1.2倍；其他如毛毯、手帕、鉄条和鉄絲、硝石等在进口数量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只有粗嘍嘍、羽毛紗、鉄皮、鉛块等的进口数量一度减少了一些。<sup>②</sup>

1843—1845年是上海开埠后的头三年。外国商品在那三年內日益增多地經由上海涌入中国市場，是事态发展的必然結果。因为，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早在鴉片战争前若干年，即处心积虑要把它們的势力扩展到中国的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来开拓商品市場，并决心把上海作为它們对中国内地进行經濟掠夺的基地。1842年，上海对外通商的大門一被它們用野蛮无耻的軍事入侵打开，接着在1843年又被强辟为商埠，外国商人“冒險家”及其他侵略分子当然要不放过时机跟着蜂拥而来实现他們的侵略。于是，外国商船的进口年复一年地增多了，駭人听聞的鴉片貿易开始了，大量工业品也日益增多地汹涌侵入。所有这一切都鮮明地反映了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利用上海为基地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殖民地貿易的貪欲。上海开埠头三年，外国商品的汹涌侵入，正是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穷凶极恶、不顾一切并妄图一开始就迅速实现

---

① 見附录，表10。

② 見附录，表12。

其貪欲的一种具体表現。

## 第二节 1846—1856 年間进口貿易的停滯 及其原因分析

上海开埠后，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为了进行穷凶极恶的商业掠夺，虽然从 1843 年一开始就把大量商品經由上海运到中国市場上来推銷；但是，为时不久却出現了与它們扩大侵略的愿望相反的轉折；即从 1846 年起，进口商品不仅沒有繼續增加，反而不得不被迫减少。这种情况直到 1856 年爆发第二次鴉片战争后才发生变化。关于这一轉折情况，馬克思早在 1858 年就曾明确指出过：“英国对华的輸出，在 1836 年已达到 1,326,000 英鎊，而在 1842 年却跌到 969,000 英鎊。在此后 6 年中，英国对华輸出的迅速不断的上漲情况，可从下列数字看出：1842 年 969,000 英鎊，1843 年 1,456,000 英鎊，1844 年 2,305,000 英鎊，1845 年 2,295,000 英鎊；可是到 1846 年，对华輸出……降到 1836 年的水平以下，……。”<sup>①</sup>（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从 1846 年以后一个时期上海的进口貿易来看，情况亦复如是。

1843—1845 年，上海进口貨值是逐年急剧上升的，1845 年曾一度达到 1,224,079 鎊。但是，自 1846 年起，上升趋势即轉为下降。1846 年进口貨值下降为 1,066,172 鎊，即較

---

<sup>①</sup> 馬克思：《貿易与条約》，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8—89 頁。

1845年跌落了13.0%。1847年又繼續下降为1,009,229鎊，又比1846年减少了5.4%。1848年下降得更厉害，只保留为806,495鎊，即又比1847年减少了20.1%；如以之同1845年的数值相比，則只合65.8%。此后几年，进口貨值虽然又出现了回升的趋势，但也极不稳定，上升不久又轉为下降，下降的幅度有时还很大。例如，1849年虽然回升为1,209,332鎊，而至1853年繼續增长为1,843,000鎊，但是，至1854年7月—1855年6月，又轉而跌落到了3,507,524两（按1鎊等于2.9两的比率，可以折換为1,209,491鎊）。这就是說，1854年7月—1855年6月的进口貨值較1853年下降了34.4%，其絕對数字只比1849年多一点。①

1845—1856年間，上海进口商品数量增减的变化，也反映了上述同样的趋势。以主要进口貨——灰布的数量而論：1845年进口数量达到了992,178匹，1846年虽仍上升为1,143,934匹，但1847年即轉而下降为963,158匹，1848年更跌落为518,754匹；1849年虽回升为871,498匹，但仍比1845年减少了12.2%。另一主要进口貨——白布的下落情况更加明显：1845年进口数量达到了367,436匹，以后則連年下降，1846年降至322,017匹，1847年又降为221,122匹，1848年更降为206,977匹，1849年虽有回升，但也不过只有346,384匹，仍少于1845年。② 英国輸入上海的主要毛織物——羽毛紗，在1846—1852年間虽然在数量上还是上升的，但1853—1856年却下降得很厉害：1845年进口4,157匹，而

① 見附录，表1。

② 見附录，表10。

1853年則跌落為3,960匹, 1854年再跌落為2,720匹, 1855年更下降到了1,410匹, 只約有1845年的三分之一, 1856年回升很多, 但也只有2,350匹, 約合1845年的56.5%。①

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在1846—1856年間, 會因在上海以至整個中國進行掠奪性的進口貿易一度不能“得心應手”, 而感到失望、忧虑、埋怨和惱怒。1847年, 即進口貨物量值開始轉趨下降的第二年, 英國下院所指定的調查中英貿易關係狀況的一個委員會在其報告中談到他們感到“遺憾”的是, “若干時期來, 我們與那個國家(引者按: 指中國)的貿易一直處於十分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 我們擴大來往關係的結果並沒有實現我們的合理期望, 這種期望自然是基於能夠與一個如此廣大的市場更加自由地接近而產生的……。”② 1852年, 英國駐廣州的代辦米淇爾(Mitchell)也在一份報告書中說: “我們與這個國家(中國)的商約充分生效以來, 到現在(1852年)將近十年了, 每一個可能設想的障礙都已清除了, 一千哩長的新海岸已對我們開放, 四個新商埠已經在各生產地區的門戶並且是沿海最適當的地点建立了起來。但是, 就我們所預期的對於我國製造品的消費數量的增加而論, 其結果又怎樣呢? 老實說來結果就是: 經過十年以後, 貿易部的報告告訴我們, 璞鼎查爵士在1843年簽訂善後條約時所見到的當時的貿易量, 較

①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P. 75.

② George Wingrove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P. 167.

③ 參見馬克思: «貿易還是鴉片?», 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81頁。

之他的条約本身在1850年底所証明給我們的还要大些!”<sup>①</sup>同年，米淇尔又在其另一份报告书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和埋怨心情：“經過和这么一个大国家(引者按：指中国)开放貿易十年之久，……而拥有如此龐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費我們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我們那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或巴西，赶不上我們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十年以前，當我們打开这个国家(引者按：指中国)的沿海省份使其对英通商的时候，关于即将出現的对我們制造品的需求問題，形成若干最愚妄的想头。我們曼彻斯特的朋友們，甚至就在中国現地的那些曼彻斯特朋友的同道們(这些人應該知道得清楚些)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貿易，大家好象全都发了瘋似的。他們勇往直前地开始和想象中的全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做起生意来，沒有人能使他們相信，新开放的市場也会到貨太多卖不出去的。璞鼎查告訴他們，說是他已為他們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闊，‘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給她一省的衣料的’。……在商务統計表上，我們所看到的惊人事实是，1850年末我們出口到中国来的制造品几乎比1844年末减少了75万鎊……。”<sup>②</sup>

---

① 參見馬克思：《对华貿易》，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6頁。

② 1852年3月米淇尔报告书。譯文轉引自严中平：《英国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团与两次鴉片战争史料》，見列島編《鴉片战争史論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0—71頁。

1846—1856年，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在对进口貿易轉趨停滯和下降感到失望、忧虑和埋怨之余，曾试图找出出現这种情况的原因。代表英国資产阶级利益发言的《經濟学家》杂志的創刊人威尔逊认为：出現这种情况的“第一个重大原因，乃是璞鼎查訂約后的头三年中中国市場上投机性的商品过剩，以及英国商人对中国需求性质的忽视。”①《經濟学家》杂志則根据当时倫敦《泰晤士报》駐上海和广州記者科克(G. W. Cooke)提供的材料，把这种情况的出現說成是由于外国的竞争所引起的，說什么英国在中国市場上遭到了美国、德国和俄国的打击和排挤。②当时英国資产阶级派駐在中国的代理人之一米淇尔也试图解释出現这种对华貿易轉趨停滯和下降的原因，說什么原因在于“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代代相傳，以致他們穿的衣服正是他們祖先以前所穿过的，这就是說他們除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論卖給他們的东西多么便宜，他們概不需要。一个靠劳动生活的中国人一件新衣服至少要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期間要能經得住做极粗重的工作时的磨損，不然他們是添不起的。而象那样的衣服所需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們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織品所需棉花重量的三倍，換句話說，它的重量必須相当于我們能运到中国来的最重的斜紋布和普通棉布重量的三倍。”③

---

① 參見馬克思：《貿易与条約》，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8頁。

② 參見同上书，第92頁。

③ 參見馬克思：《对华貿易》，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7—128頁。



英国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和发言人对于1846—1856年間上海以至整个中国进口貿易停滞和下降原因的种种解釋，是愚蠢的、荒誕的和带有誣蔑性的，因而也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其原因是由于“对中国需求性质的忽視”嗎？显然不是的。英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早从17世紀30年代起就来华从事商业活动，到1846—1856年为止，已活动了二百多年。他們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对华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难道一直会因忽視中国需求的性质而不懂得中国市場需要什么嗎？不言而喻，这种解釋是不符事实的。而且，五口通商以后，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已把他們可以出口的商品（从一般机制工业品到鴉片）统统都运到中国市場上来了，根本不存在忽視或不忽視中国需求性质的問題。其次，所謂英国在中国市場上遭到了美国、德国和俄国的打击和排挤的說法，同样也很荒誕，因为1846—1856年間，不仅英国，还有美国等，經由上海对华的进口貿易也都同样是停滞的和下降的。据統計：1848年，美国經由上海輸入中国的貨值曾达190,384鎊，但到1849年，即下降为164,978鎊。<sup>①</sup>而且，上海开埠后，英国資本主义侵华势力同美国資本主义侵华势力之間虽然不是沒有任何矛盾和竞争的，但在开拓中国市場、破坏中国社会經濟和掠夺中国人民这一問題上却基本是共同一致、协同步調和上下其手的，其間还很少发生相互打击或相互排挤的情况。英国同德国和俄国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把1846—1856年間进口貿易停滞和下降的原因归之于英国在中国市場上遭到了美国、德国和

---

① 見附录，表2。

俄国的打击和排挤,这种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再次,英国侵华分子米淇尔把当时进口貿易陷于停滞和下降的原因說成是“中国人……穿的衣服正是他們祖先以前所穿过的,这就是說他們除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論卖給他們的东西多么便宜,他們概不需要”等等,这种說法一眼望去就可看出全系对中国人民侮辱之詞,根本不值一駁。

外国資产階級及其代理人和发言人,由于所处階級地位的反动性和局限性,是找不出也不愿找出 1846—1856 年間上海以至整个中国进口貿易停滞和下降的真正原因的。他們当中即使有人接触到了这类真正原因,但也因其中有些是丑恶得見不得人的而不肯承认或故意加以掩盖。所以,真正原因必須由中国人民自己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深入到当时中国社会經济結構的特点及外国資本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后果中去寻找。

那末,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

我們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第一,鴉片大量进口掠夺了中国的巨額財富,削减了中国人民的购买力。第二,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結合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經济結構对外国資本主义的商业侵略进行了坚强的抵抗。

前面讲过,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年复一年地把大量鴉片走私到中国市場上来銷售,不仅严重地戕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而且使大量中国白銀因而不断外流。大量中国白銀不断外流,归根結蒂,是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被剝夺,从而也就必然会导致中国人民的购买力日益降低。鴉片进口对工业品輸入的影响,外国資本主义侵华

势力并不是不知道的。1847年英国下院所指定的調查中英貿易关系状况的一个委员会曾經在所写的报告中私下里承认：“……我們认为，貿易上困难的发生，不是由于中国对英国制造品的需要不大，也不是由于别国日益厉害的竞争……。鴉片烟款的支付……吸收了銀两，这就对中国人的一般貿易大有妨碍……。”<sup>①</sup> 鴉片进口其所以会使中国市場的购买力削減得这样厉害，分析起来，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鴉片进口的数量是大得惊人的，在1846至1856年期间，經由上海出口的中国貨值常常抵不上鴉片进口貨值，有时甚至相差很远。如1849年上海出口貨值就只及同年上海进口鴉片貨值的62.6%。这就是說，中国市場上因貨物出口而实现的一部分购买力，全部被进口鴉片吸吮去了，留下給外国进口工业品吸吮的，那就很少甚至沒有。其次，和上述原因相联系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商品經濟和貨幣关系都不发达，流入市場和外国进口貨物交換的商品本来就很有限，用以支付的現金銀也很不充裕，已有的一些出口貨值既不足以抵偿进口鴉片貨值，而現金銀外流又不能不有个限度。这就使得中国市場的购买力陷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外国工业品进口后，由于本来就有限的中国市場购买力遭到了进口鴉片的削減，在一定时期內就不能不遇到难以找到买主的局面。这便是1846—1856年一般工业品进口一度停滞和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結合的社会經濟結構

---

<sup>①</sup> 轉引自馬克思：《貿易还是鴉片？》，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頁。

当时给予外国资本主义商业侵略的坚强的抵抗，那也是很明显的。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那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sup>①</sup> 上海开埠前后，在长江中下游及上海附近地区的城市 and 集镇中以及水陆交通沿线，商品生产虽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广大农村经济基本上仍然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首先，当时农家大都既耕且织，他们穿衣需用的布一般不必向市场购买，更不用说购买进口的棉毛织物了。这就是说，当时农家所过的既耕且织和自筹衣食的生活，基本上排除了购买外国进口棉毛织物的必要性。其次，农业经济自给自足，基本上没有、也拿不出较多的东西到市场上去出售，因而同市场不发生或很少发生联系，也没有或很少有货币进行购买。这又排除了他们购买外国进口商品的可能性。在往后的年代内，随着外国商品继续不断流入中国市场，随着中国农业经济日益商品化并被卷入市场，随着外国商品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运输费用的下降而迅速降低成本并减低售价，中国的手工业品虽然最后仍将不可避免地要被外国商品所排挤；但是，这一过程却不是很快的。这就是说，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要破坏中国的自然经济需要花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在这以前，要想在商品推销上避免遭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8页。

遇抵抗,那是不可能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当时中国市場上阻碍外国商品銷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內部的經濟組織,小农业制度等等,而要鏟除这小农业制,就需要很長的时间。”<sup>①</sup>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小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相結合的社会經濟結構在一定时期內坚强地抵抗过外国商品的入侵。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雄辯地說明:1846—1856年間上海以至整个中国进口貿易一度停滯和下降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外国資本主义侵华势力忽視了中国消費者需求的性质,也不在于各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市場上展开了竞争,更不是由于中国人偏爱穿傳統服装;而是由于鴉片大量进口掠夺了中国的巨額財富,削減了中国人民的购买力,同时,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結合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經濟結構对外国資本主义商业侵略进行了坚强的抵抗。

这类造成1846—1856年上海以至整个中国进口貿易停滯和下降的真正原因,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58—1859年即作了深入的探索并进行了精辟的分析。1858年10月5日,馬克思在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一篇社論中写道:“經過仔細考察中国貿易史以后,我們覺得,一般說来,人們一直过分地高估了天朝人民的消費能力与支付能力。在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經濟結構範圍內,外国商品的大量輸入是絕對不可能的。可是,如果取消鴉片貿易,那末以中国对英美出超大約8,000,000英鎊的这笔錢数,还可以逐漸

---

① 1858年10月8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6頁。

吸收更多数量的英美商品。只要我們分析到下面的简单事实，即：中国貿易虽然出超，但由于鴉片入口数达7,000,000英鎊之多，却使得其財政与貨幣流通情况极为混乱——只要我們分析到这个简单事实，就必然會得出上述結論。”<sup>①</sup>同年10月8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又进一步指出：“这个市場崩坏(引者按：指1846年以后中国进口貿易的停滞和下降)的主要原因大概是：鴉片貿易(向中国輸出貿易之不断增长实际上也就是鴉片貿易之增长)，其次就是中国内部的經濟組織，小农业制度等等，……。”<sup>②</sup>到1859年12月3日，馬克思更在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另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过去有个时候，曾經流行过一些十分虛妄的見解，說由于所謂把天朝打开了，美国和英国的商业一定会得以推进；当时我們曾根据对本世紀开始以来中国对外貿易的精密考察而指出，这些奢望是沒有可靠的根据的。我們証明过鴉片貿易的增长是与西方制造品的銷售成反比的。我們曾认为，除了鴉片貿易之外，对华进口貿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結合的中国社会經濟結構。”<sup>③</sup>

論述到这里，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問題：鴉片进口削減了中国市場的购买力以及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結合的社会經濟結構进行的坚强抵抗等因素，在上海开埠初期的

① 馬克思：《貿易与条約》，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3頁。

② 1858年10月8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6頁。

③ 馬克思：《对华貿易》，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5頁。



1843—1845年也存在，为什么当时未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外国商品日益增多的輸入，而直到1846年以后才发生这种现象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解释这个问题以前，有必要回溯一下1843—1845年进口貿易的实际情况。我們知道，上海一开埠，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即不断把大量商品經由上海源源輸入中国市場。它們在輸入商品时，甚至利欲熏心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既不考虑中国市場的容量，也沒有来得及問中国消費者的支付能力，更沒有想到中国社会經濟結構可能給予的抵抗，而只知道不断盲目輸入。但实际結果怎样呢？正如馬克思在1858年所揭露的：“当1847年危机时，倫敦对华貿易商行所遭遇的不幸还証明了：官方报告表上載明的1843年至1846年对华輸出的估計价值，与实际的卖出价值完全不相符合。”<sup>①</sup>这就是說：1843—1845年，外国商品的輸入量是同中国市場的实际銷售量脫节的；即大量外国商品在1843—1845年間虽然一年比一年多地輸到了中国，但其中有頗大一部分却未能在市場上实现其价值，而是呆存在倉庫內。这类情况表明，外国商品在1843—1845年日益增多的輸入，并不是中国市場实际需要量不断扩大的結果，而只是一种盲目輸入造成的虛假增长。外国商品輸入量和中国市場实际銷售量脫节的現象正好說明：早在1843—1845年期間，鴉片进口削減了中国市場的购买力以及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結合的社会經濟結構进行的坚强抵抗等因素，就已在阻撓

---

① 馬克思：《貿易与条約》，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頁。

外国商品的銷售和进口。这些因素既从 1843 年一开始就在对  
外国商品的輸入起阻撓作用,但为什么直到 1846 年才出現进  
口貨物轉趨下降的情况呢?这是因为,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勢  
力虽然一开始也已看到市場上的实际銷售量落后于商品輸入  
量,但是,資本主义的貪欲却蒙蔽了它們的心窍,使得他們不  
相信这种情况会延續多久,而认为不过是轉瞬即逝的暂时現  
象,因而仍然在商品滯銷的情况下繼續不断輸入,以致造成了  
进口商品的不断增长。这样的盲目輸入一直繼續了三年,最  
后到 1846 年才不得被迫暂时减少,因而才形成了 1846—  
1856 年間上海进口貿易的轉折。但这絲毫也不表明是外国資  
本主义侵略勢力的退让,恰恰相反,它們从这时起就开始酝酿  
再次用武力来进一步扫除上述障碍,以便在中国进行更大規  
模和更狠毒的商业掠夺。

### 第三节 第二次鴉片战争后进口貿易的扩大

1856 年 10 月,正当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愈来愈不滿足于对中国进行商业掠夺的状况的时候,英国侵略者借口所謂“亚罗号划艇事件”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鴉片战争。第二次鴉片战争对中国的进口貿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海的进口貿易也因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次鴉片战争的爆发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滿足于第一次鴉片战争后在中国攫取的特权,不滿足于根据已得特权对中国开展的进出口貿易,在資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因而遭遇到經濟危机的情况下,要求用武力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場,以便更大規模地对中

国进行掠夺性的殖民地贸易。我们知道，在19世纪40—5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继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产业革命完成以后在许多工厂中增加了设备，革新了技术，蒸气锤和重型机器已在各工厂中普遍安装和使用。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了，无阶级的人数也日益增多，资本家对工人的榨取愈来愈残酷。这一切造成了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1850年，英国的纱锭达到了2,100万枚，煤的年产量则增长为6,150万吨。差不多与此同时，法国每年生产铁的数量也已达60万吨，煤则年产500万吨。正在这时，即1856年，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遭遇到了一次新的经济危机的袭击。市场呆滞，物价猛跌，工业品找不到销路，成批的企业倒闭，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这些侵略成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替产品寻找销路，为了借此摆脱经济危机，更迫不及待地要向国外开拓新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扩大旧有的商品销售市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明确指出的：“试问资产阶级是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的呢？一方面是不得不毁灭大批生产力，另一方面则是夺取新市场和加紧榨取旧市场。”<sup>①</sup>中国市場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到1856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殖民地贸易已有十多年。在这段时期里，情况对于他们说来并不那么“美妙”，即在中国市場上推销商品时有停滞甚至下降的现象发生。一方面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增长，经济危机严重袭击，因而要求占有更大和更多的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5页。

市場；另一方面是產品在中國市場上銷路滯塞甚至下降。這就使得歐美等國的資產階級急切地要發動第二次侵略中國的戰爭，在中國進一步擴大市場，以便把侵略勢力伸入中國內地，摧毀內地手工業和農村家庭手工業，銷售更多的商品，企圖借此擺脫經濟危機，攫取更多的利潤。

英國資產階級侵華勢力試圖用戰爭來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的陰謀，早在1846年進口貿易轉趨停滯後不久即已開始醞釀。1849年1月，英國侵華分子阿禮國就曾這樣說過：“戰爭（引者按：指第一次鴉片戰爭）過去了，戰爭的時機又已到來。現在我們又再度在這樣的境地上：或者是承受已經擴張了的但是還是有限度的利益作為最後的結果，或者是我們的政策就是面向那些必然引起改變現狀的糾紛，製造那些糾紛，從而試圖獲得更多的利益。……為了我們的製造品……我們還需要同等廣大而有利的市場。”<sup>①</sup>英國資產階級侵華勢力再次對華發動侵略戰爭的念頭，到1856年已發展到迫不及待了。因此，代表英國資產階級利益的英國政府便在1856年10月借口所謂“亞羅號划艇事件”對中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法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久也借口傳教士被殺事件加入了這場旨在進一步掠奪中國人民的肮臟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可以說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繼續和擴大。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爭是英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為了打開對中國通商的大門、以便在中國開展殖民地貿易并以此為

---

<sup>①</sup> 參見嚴中平：《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史料》。見列島編《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67頁。

起点对中国进行全面掠夺和侵略的不义战争，那末，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他们发动来在中国攫取更多特权、扩展市场、扫除障碍、加强侵略的另一次不义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从1856年10月开始，至1860年10月，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腐朽和反动透顶的清王朝，为了集中全力并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早在战争第一阶段的1858年6月就接受了侵略者的要求，订立了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答应：（一）开放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后来实际开放时，牛庄改为营口，登州选定烟台，潮州选定汕头，台湾选定基隆）；（二）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俱可通航，外国军舰得游弋各通商口岸；（三）外国人可以往内地通商游历，中国官吏不得禁止；（四）海关雇用外人管理；（五）减轻商船吨税；（六）另立新税则，即除例外（丝、茶和鸦片）与免税（指在华外人日用品免税）两项外，进出口货物一律照时价，值百抽五，洋货运入内地，按时价抽2.5%的子口税，免缴厘金和常关税；鸦片改名“洋药”，可以合法进口，每担只收税银30两；（七）享受最惠国待遇；（八）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等等。1860年10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又进一步接受侵略者的要求，分别签订了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其中规定：除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外，并增开天津为商埠，等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导致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公开合作，同时也扩大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殖民地贸易。因为：第一，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及实行，使得

通商口岸遍布全国，而外国的商船和商人又因而得以在长江流域一带各口以及其他通商口岸任意通航和经商；海关雇用外人以及减轻商船吨税更使中国完全失去了对海关的控制权；洋货运销内地只征收2.5%的子口税，免缴厘金和常关税，意味着内地市场的开放。所有这一切表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又夺去了更多的特权，中国的市场被它们用武力进一步打开了。这样，外国商品不仅在中国取得了比以前广阔得多的销售市场，而且有了更多的特权庇护。这就为外国商品的汹涌侵入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条件。第二，清王朝在这期间勾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这标志着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公开合流。自此以后，以清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主义，对于外国的商业侵略不仅毫不阻拦，而且多方进行勾结和支持。这样，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市场进行商业掠夺时，又因取得了中国封建主义进一步的支持和勾结而具备了更有利的条件。再加上：从1846年起，外国商品输入的趋势总的说来虽呈现下降，但却没有停止；事实上，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外国商品仍然是不断输入的，有的年份输入数量甚至还相当多。外国商品的不断输入以及中国农副产品一年多于一年的出口，使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受到长期的和不断的侵蚀，中国的小农经济因而日益被卷入市场，农产品日益增多地商品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日趋崩坏，并因而逐渐失去了抵抗外国商品入侵的能力。同时，在这期间，欧美等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又继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技术设备在服从于资本家攫取高额利润的条件下不断用于



发展生产,工人阶级受到的剥削也愈来愈残酷;这样,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了,外国商品的成本因而显著降低。不仅如此,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航运事业的发展,并大大降低了运输费用。成本的降低和运输费用的减少,使得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售价日益低廉,使得中国农家的手工业产品日益无法与之竞争。这表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至此也已无法再持久抵抗下去了,因而不得不在日趋崩坏的过程中被外国商品侵夺自己的阵地。鸦片大量进口使得外国工业品不能在中国找到广阔销路因而影响进口贸易扩大的情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虽然继续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一因素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解体的程度相比,与内地市场开放的程度相比,与国内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合流相比,那末大量鸦片输入对其他工业品进口所产生的影响也就不那么显著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因在以往十多年中不断受到侵蚀而逐渐失去了抵抗外国商品输入的能力,由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进一步帮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进行商业侵略,特别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打开了中国广大的内地市场,中国的对外贸易又呈现了另一次转折。那就是:1846—1856年间曾经一度停滞不前的进口贸易,终于一变而为迅速的和大幅度的增长。中国遭受到的商业侵略因而加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殖民地性质因而加深了。中国人民遭受到的剥削和残害也就因而更加深



重了。

第二次鴉片战争爆发后,外国对中国进口貿易的扩大,在上海反映得尤其明显。首先,以外国商船进口的情况而論,1855年7月至1856年6月上海共进口外国商船489艘,总吨数是155,587吨;到1859年,即“天津条約”签订后一年,前者便增加到了926艘(增加了89.3%),后者也上升为287,100吨(上升了84.5%);及至“北京条約”签订后一年的1861年,外国进口的商船更激增为1,806艘,吨数也增加到了419,659吨,較之1859年,前者增加了95.0%,后者也增加了46.1%;1862、1863年更是接連上升,1863年进口船数达到了3,400艘,吨数也增加为964,309吨,如和第二次鴉片战争爆发前夜的1855年7月至1856年6月的情况比較,則船数增加了近6倍,吨数也上升了5倍多。<sup>①</sup>其次,从进口貨值变化的情况来看:1855年7月至1856年6月,即第二次鴉片战争爆发前一年,上海进口各国貨物的总值是6,492,299两;但至“天津条約”签订后一年的1859年,便激增到了20,635,130两,即增加了2.1倍;此后更是年年大幅度地上升,1860年(26,225,588两)又在1859年的基础上增长了27%,1861年(33,702,614两)又比1860年多28.5%,1862年(40,701,584两)进一步增为1861年的120.76%,至1863年,即“北京条約”签订后三年,进口貨物总值更上升到了61,704,099两,这个数目竟是1855年7月至1856年6月的9.5倍,比之1859年也增加了

---

①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P.61。

1.9 倍。① 此外，进口商品数量的变化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一年的 1855 年，英国经由上海输入到中国的粗呢呢为 10,040 匹，羽毛纱为 1,410 匹；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三年的 1863 年，粗呢呢的进口量上升为 103,415 匹，羽毛纱的进口量也增加到了 81,833 匹；即前者上升了 9.3 倍，后者增加了 57 倍。②

---

① 見附录，表 1。

② 見附录，表 12。

## 第五章 中国农副产品的源源出口

### 第一节 出口贸易不断增长的情况和趋势

上海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蜂涌而来进行掠夺性的殖民地贸易，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前面已论述过的外国鸦片和工业品的大量输入，另一个则为中国农副产品被源源搜购出口。

中国——当时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被搜购而去的货物几乎全部是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其中最主要的又是丝和茶两项。估计：在1850年，上海出口货物总值中，有52%是丝，46%是茶；至1860年，茶所占的比重虽一度降为占28%，但丝的比重却上升为占66%。<sup>①</sup>

上海开埠后，丝、茶的出口一开始就很旺。以丝的情况而论：1845年即出口6,433包，只比广州同年出口的数量(6,787包)少354包。自此以后，上海输出生丝的数量便迅速上升，1846年增加为15,192包，即较1845年增长了1.3倍，1847年又在1846年的基础上上升了39.4%，即增加到了21,176包，1848—1851年间出口数量虽一度略呈下降趋势，但至1852年即激增为41,293包，1853年又继续上升至58,319

---

<sup>①</sup>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P. 119.

包，1858年更增加为85,970包，即又較1852年增长了1倍多；如果把1858年的出口量和1845年的出口量作一比較，則前者是后者的13.2倍，由此可見生絲出口数量增长之速。<sup>①</sup>茶叶从上海出口的数量一开始虽沒有絲那样旺，如1844年出口1,149,000磅，还不到同年广州出口数量(69,327,500磅)的六十分之一；但是，为时不久就迅速上升。1846年一跃而为12,460,000磅，1849年又上升至18,303,000磅，1851年再增为36,722,500磅，到1855年甚至一度达到了80,221,000磅。1855年茶叶出口的数量竟是1844年出口数量的69倍余。<sup>②</sup>这說明：上海开埠初期，茶叶出口的数量也是增长很快的。上海开埠后，由于前来从事絲、茶出口貿易的是靠进行商业掠夺为生的外国資本主义商人“冒险家”，所以，絲、茶一年多于一年地大量出口，这也意味着：中国有大量宝贵的农副产品被他們經由上海低价搜购而去。

上海开埠后出口貿易的扩大，从貨值方面来考察，那就更为全面和明显。1844年上海出口貨值共达487,528鎊（合1,413,831两），1845年便增加为1,344,650鎊（合3,899,485两），即上升了1.7倍。1846和1847年的出口貨值又有增加，1848年虽一度略轉下降，但1849年又回升为1,754,656鎊（合5,088,502两），至1853年更增长到了5,381,000鎊（合15,604,900两）。上海的出口貨值在1854年7月至1855年6月一年間又有增加，达到了24,549,062两；此后两年，虽略

---

①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8頁。

② 同上。

呈下降趋势，但至 1857 年便轉而上升到了 33,344,435 两，1859 年更增长为 36,670,606 两，至 1862 年甚至激增到了 47,569,966 两。上海 1862 年的出口貨值竟比开埠之初的 1844 年扩大了 30 余倍。<sup>①</sup>这也說明：由于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一年多于一年地来中国搜购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上海开埠初期的出口貿易是日益扩大而且增长得很快的。

上海开埠初期，由于大量中国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日益增多地被搜购出口，外国商船从上海出口的数目也是不断增加的。据統計：1845 年駛离上海的外国貨船的总数是 89 艘，共載重 24,585 吨；1849 年，出口船数即增加到了 132 艘，載重量也上升为 52,574 吨；19 世紀 50 年代开始后，駛离上海的船数及其載重量又有增加，1855 年 7 月至 1856 年 6 月的一年間，出口船数达到了 472 艘，載重量为 153,990 吨，即船数是 1849 年的 3.5 倍，載重量則增加了 1.9 倍；1856—1858 年出口船数及其載重量虽都低于 1855 年 7 月至 1856 年 6 月的水平，但至 1859 年，出口船数就急剧回升到了 939 艘，載重量也大幅度地增长为 289,709 吨；1860 年以后，出口船数及其載重量增长得更多和更速，1863 年，出口船数激增到了 3,547 艘，載重量則上升为 996,890 吨。<sup>②</sup>如果把 1863 年的数字和开埠初的 1845 年比較，則在不到 20 年的時間內，出口船数扩大了 38 倍多，吨数也增长了近 40 倍。这类統計数字又反映了上海开埠初期出口貿易不断迅速扩大的趋势。

---

① 見附录，表 1。

② 見附录，表 24。

这种出口貿易对中国說来是十分不利的。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前来从事出口貿易的外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了的。因为，中国当时是一个經濟落后的农业国家，而作为貿易对方的却是发达的資本主义工业国家，各自的經濟基础本来就不相同，加以外国資本主义在中国攫取了种种貿易特权，是到中国来从事掠夺性的殖民地貿易的，它們一方面要在中国市場上推銷工业品，另一方面还同时要把中国变成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供給地。它們这一做法的結果，不仅促使中国的商品經濟因被卷入世界市場而变成了世界資本主义經濟的附庸，而且使中国的农业生产也不得不被迫为它們的利益服务。正如毛主席所揭示的，它們是要“把中国变成它們的工业品的市場，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sup>①</sup>关于这一点，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过：“在現時（引者按：指1858年）的条件之下，除了鴉片和某些东印度的棉花以外，对华貿易主要的仍应是中国商品——茶和絲——之輸出，这种輸出，多半以外国的需要为轉移……。”<sup>②</sup>中国农业生产的某些部分，由于同資本主义国家建立和扩大了出口貿易，便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独立性，不得不服从于外国資本主义的需要并以它們的需要为轉移，从而陷于从属和附庸地位。这对中国說来，当然是极为不利的。这种不利的程度，而且随着出口貿易的不断扩大而加深。不仅如此，由于絲、茶等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生产者是中国农民，购买者是外国資本主义侵

① 《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23頁。

②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之成功》，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頁。

略势力，而居間这种买卖的又有成群的买办、商人、高利貸者和地主，所以这种出口貿易，只能是有利于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以及向它們分取殘羹余滴的中国买办、商人、高利貸者和地主等剝削階級，而有害于中国农民。因为，第一，外国資本主义慣常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进行不等价交換，中国农民对自己的产品，往往只能按照比实际价格低得多的价格卖给他們，有时，甚至还不能不忍受他們的杀价收购，因而往往使实得价格被压在成本之下；第二，由于买办、商人、高利貸者和封建地主經常居間于这种出口貿易，因此，农民在出售产品时，除遭受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不等价剝削和杀价收购外，还要受到这批居間人的中間剝削；第三，农民在出售产品的过程中，不仅在經濟上直接受到中外各式各样的剝削者的盘剝，而且因愈来愈深地被卷入商品市場而在經濟上失去独立性，这就不得不被迫依賴于商人、高利貸者和封建地主，从而陷入他們所設的商品經濟和高利貸的剝削陷阱。所以，旧中国的出口貿易实质上是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买办、商人、高利貸者、封建地主相互勾結起来盘剝中国农民的一种恶毒买卖。这种出口貿易愈扩大，中国农民受到的盘剝就愈重，中国社会經濟的半殖民化也就愈深。上海开埠初期出口貿易的不断迅速扩大，可以肯定說，曾經給中国的社会經濟带来过严重的損害，曾經使广大中国农民遭受过巨大的損失。

## 第二节 出口貿易不断增长的原因分析

上海开埠后出口貿易的不断增长，是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不遺余力地搜购中国农副产品的必然結果。我們知道，



一切資本主义国家对經濟落后国家进行殖民地貿易必定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当地推銷其工业产品，攫取殖民地貿易利潤；另一个是在当地低价搜购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料，运回本国，供应需要。向經濟落后国家低价搜购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料运回本国供应需要，对于进行殖民地貿易的資本主义国家說来，同在經濟落后国家推銷工业产品从而攫取商业利潤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資本主义国家为了要保証其工业生产的增长、避免遭受經濟危机的襲击、攫取巨額的商业利潤，一方面固然要把愈来愈多的工业品运到国外市場上銷售出去，从而求取扩大再生产的不断进行；但是，另一方面，原料的充分供应也是保証工业生产不断扩大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离开了这个条件，工业生产要順利进行和取得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一般經濟落后的国家大都有着廉价的工业原料可供搜购。因此，資本主义国家在向經濟落后国家推銷其工业产品的同时，又必然要在当地低价搜购工业原料而去。而且，一般經濟落后的国家大都是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农业国，生产种种独有的农副业特产。外国資本主义国家的資产階級在剝削本国工人及攫取殖民地貿易利潤之余，又占有这些落后国家的农副业特产来过享乐奢侈的生活。这又必然要使它們日益加重对落后国家农副产品的搜购。中国当时是一个經濟落后的农业国家，不仅有着大量的工业原料，而且出产多种独有的农副产品，而这些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又是外国資本主义国家所大量地和急切地需要的。因此，外国資本主义在通过鴉片战争打开了对中国的通商大門后，即一方面大量向中国推銷鴉片和一般工业产品，另一方面則不断在中国搜购大量

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以生絲的情况而論，据記載，“泰西諸國互市上海，湖絲出口益伙，頤岁可十万包”<sup>①</sup>；外国商人經由上海在中国购得大量生絲后，几乎全部被运往法国里昂和英国的一些城市中去織成綢緞在当地市場上銷售<sup>②</sup>。茶也是被购运往英、法等国，經過加工后，供給当地人享用。上海开埠后的出口貿易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断增长的。

上海开埠后出口貿易的不断增长还同鴉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經濟的日益解体和商品經濟的日益发展有关。鴉片战争前，我国的絲和茶本来就大部分是为市場而生产，商品化程度很高，不仅供应国内市場的需要，而且大量运銷欧美等資本主义国家。鴉片战争后，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以上海等通商口岸为基地更进一步大量地搜购中国的絲和茶，这就进一步增多了市場对这类出口商品的需要。同时，由于大量外国棉紡織品的汹涌进口，农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础逐渐遭到愈来愈厉害的冲击，以小农业和家庭棉紡織手工业相結合为基础的农家經濟趋向解体，并因而日益卷入商品市場之中。这就是說：鴉片战争后，一方面是市場上对絲和茶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却有日益增多的农家因家庭棉紡織手工业日趋崩坏而需要另外經營其他副业。当时，在許多地方，特别是在絲、茶产地，这两方面的情况正好碰在一起。于是，許多农家都紛紛放弃家庭棉紡織手工业，而改营絲或茶的生产。有不少农家甚至挤出种植粮食的田地去栽培桑叶或茶树，以

---

① 湯壽潛：《刘貫經家傳》，見周庆云著《南溟志》，卷四十六。

② 陈巖：《續富国策》，卷一，种桑育蚕說。

致連日常食用的糧食都要賴別處供給。據記載：“吳縣西洞庭山孤峙太湖中央，袤廣百里，四圍環水，非舟莫渡，丁口繁多，田不滿六千畝，恒恃蠶絲果實以易粟。”<sup>①</sup> 杭、嘉、湖地區的情況更是如此，至19世紀60年代初的同治初年，許多農家已是“半以蠶桑為業”，糧食和棉花的生產已因而相對地顯著減少了。<sup>②</sup> 這樣，絲和茶的產量就不斷增加。絲和茶是我國當時兩項主要的出口商品。這兩項商品的產量不斷增加，就為我國出口貿易的迅速擴大提供了實際的可能性；再加上當時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需要日益增多地掠奪這兩種中國特產，這就進而導致了我國出口貿易的不斷增長。

以上兩方面的情況就是造成上海開埠後出口貿易不斷增長的根本原因所在。

前面提到：上海開埠初期的1846至1856年間，外國工業品的進口曾經一度因遭到中國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結構的堅強抵抗而一度陷於停滯。因此，這裡可能產生這樣的問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搜購中國絲和茶等農副產品和工業原料出口同樣是商業掠奪，為什麼當時以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為基礎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只是對進口貿易而沒有對這種出口貿易發揮其抵抗作用？這確實是一個值得考察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從當時中國社會的這種經濟結構對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可能產生的作用和影響中去尋求答案。前面已經提到，上海開埠初期，中國以小農業和家庭手

① 光緒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申報》。

② 金榜文：《與彭通政論去差徭減重賦書》，見《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九。

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所以可能在起初较短的时间内坚强抵抗外国工业品的进口,是由于:第一,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实质上是农家既耕且织,过着自筹衣食的生活;农家这种既耕且织、自筹衣食的生活排除了购买外国主要进口商品(即棉纺织品)的必要性;第二,农家经济自给自足,同市场不发生或很少发生联系,他们因而没有东西或很少有东西可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也没有或很少有货币进行购买,这又排除了他们购买外国进口商品的可能性;等等。但是,当时中国的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对于出口贸易却不会也不能发挥与此相同的作用。因为,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容是农家既生产和消费粮食,又生产和消费棉布,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搜购出口的则主要是丝和茶。丝和茶这两种产品本来就大部分是为市场而生产,商品化程度很高,因而一般不是自然经济的构成部分。农家生产了丝和茶大部分都拿到市场上去出卖。这对他们说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所以,当时中国社会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同丝和茶的生产并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因而也就不能对以丝和茶出口为主的出口贸易发挥什么抵抗或阻挠作用。从这类情况来看,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这样说:上海开埠后出口贸易不断增长的另一原因是没有象进口贸易那样遇到中国社会经济的抵抗。

## 第六章 · 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 首要地位的确立

### 第一节 我国对外贸易重心由广州向上海的转移

1843年上海开埠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大部分集中在广州进行。上海开埠后，由于外国商人“冒险家”的纷至沓来，由于许多外国商行先后由广州移到上海来开设，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即逐渐由广州向上海转移。

1843年以后广州和上海对外贸易的消长情况，可以从下表中明显地看出：

1844—1856年英国经由广州和上海输入  
中国及从中国输出货物总值表<sup>①</sup>

年份	广 州 (进出口总值)	上 海 (进出口总值)	年份	广 州 (进出口总值)	上 海 (进出口总值)
1844	33,400,000元	4,800,000元	1851	23,200,000元	16,900,000元
1845	38,400,000元	11,100,000元	1852	16,400,000元	16,000,000元
1846	25,200,000元	10,200,000元	1853	10,500,000元	17,200,000元
1847	25,300,000元	11,000,000元	1854	9,300,000元	12,800,100元
1848	15,100,000元	7,500,000元	1855	6,500,000元	23,300,000元
1849	19,300,000元	10,900,000元	1856	17,300,000元	32,000,000元
1850	16,700,000元	11,900,000元			

<sup>①</sup> 此表系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8页中所列表格内的数字编算而来。

上表所列数字說明了如下几个問題。第一，上海开埠后，英国經由广州輸入中国和从中国輸出貨物的总值几乎是逐年下降的，其間有的年份即使偶有回升，隔年大都又跌在原有的水平以下；但經由上海輸入中国和从中国輸出貨物的总值一般却是上升的。第二，1844—1856年間，英国在广州輸入中国和从中国輸出貨物的总值，不仅趋势是下降的，而且下降幅度往往很大，1850年的进出口总值为1844年的50%，1855年又只及1850年的38.9%，1856年虽有較大回升，但仍只有1844年的51.7%；但是，經由上海輸入中国和从中国輸出的貨物总值不仅一般是上升的，而且上升幅度很大，1850年較1844年增加了1.4倍，1855年又在1850年的基础上增长了95.8%，1856年繼續上升，和1844年比較，則增多了5.6倍。第三，1844—1852年間，英国經由广州輸入中国和从中国輸出的总貨值是大于經由上海輸入中国和从中国輸出的总貨值的，1844年大5.9倍，1845年大2.4倍，此后几年也都大一倍左右，直至1851年还大37.2%，1852年也大一点；但是，到了1853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英国在广州輸入中国和从中国輸出的貨值即一反以往状况，即由上海輸入中国和从中国輸出的貨值便大于广州了；1853年大63.8%，1854年大37.6%，1855年大258.4%，1856年大84.9%。这就是說：从1853年起，英国对华的进出口貿易已大部分由广州移到上海来进行。19世紀40—50年代，英国是对华貿易的主要国家，所以，以上种种情况表明那时我国对外貿易的重心已迅速由广州向上海轉移。

我国对外貿易由广州向上海轉移的趋势，从19世紀40-

50年代出口货值的变化情况来看,还要显著。

1844—1856年中国經由广州和上海輸往英国貨值表①

年 份	广 州	上 海	年 份	广 州	上 海
1844	17,900,000元	2,300,000元	1851	13,200,000元	11,500,000元
1845	27,700,000元	6,000,000元	1852	6,500,000元	11,400,000元
1846	15,300,000元	6,400,000元	1853	6,500,000元	13,300,000元
1847	15,700,000元	6,700,000元	1854	6,000,000元	11,700,000元
1848	8,600,000元	5,000,000元	1855	2,900,000元	19,900,000元
1849	11,400,000元	6,500,000元	1856	8,200,000元	25,800,000元
1850	9,900,000元	8,000,000元			

上表說明：1844年，我国經由广州輸往英国的貨值比經由上海輸往英国的貨值多6.7倍；自此以后直至1851年，虽然仍是广州出口貨值大于上海出口貨值，但其間的差距却在不断縮小，1851年广州只比上海大14.7%；从1852年起，情况就开始轉变，即上海出口貨值一反而比广州出口貨值大75.3%，此后便是上海年年大于广州，1855和1856年，上海出口貨值竟变为分別大于广州出口貨值的5.8倍和2.1倍。这种趋势意味着：出口貿易由广州向上海的轉移，速度还要快些，時間还要早些。

我国对外貿易由广州向上海的轉移，还可从具体商品进出口数量的变化中得到証明。1844年以前，广州大量出口絲、茶时期，上海对欧美資本主义国家毫无絲、茶出口貿易可言。1845年以后，絲开始經由上海出口；从此，絲从广州出口的

① 馬克思：《中英条約》，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8頁。



数量是下降的，而从上海出口的数量却迅速上升。1853年，絲从广州出口的数量(4,577包)較1845年(6,787包)下降了32.6%，而从上海出口的数量却在同时期内(1853年是58,319包，1845年是6,433包)增长了8倍多。上海第一年即1845年出口絲的数量(6,433包)，就和同年广州出口絲的数量(6,787包)相近。至1853年，上海出口絲的数量(58,319包)竟超过了广州出口数量(4,577包)的11倍多。1844年，上海开始有茶輸往欧美資本主义国家；从此直至1851年，茶从广州出口的数量仍多于从上海出口的数量；但1852年以后，茶从广州出口的数量即迅速下降，而从上海出口的数量却急剧上升，致使1852年广州出口的数量(36,127,100磅)只及同年上海出口数量(57,675,000磅)的62.6%。1853—1860年，除1854年外，茶从上海出口的数量年年超过經由广州出口的数量；1855年(上海出口数量是80,221,000磅，广州出口数量是16,700,000磅)竟超过了近4倍。<sup>①</sup>

进口商品数量的变化，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1852—1856

	年份	綫織品 (匹)	羽毛紗 (匹)	粗嗶嘰 (匹)	呢絨 (匹)	染色及 印花布 (匹)	平織布 (匹)	棉紗 (磅)
上海	1852	3,610	7,647	31,955	30,059	256,343	2,281,932	128,000
	1853	2,170	3,960	13,400	11,184	88,340	1,863,575	68,050
	1854	120	2,720	2,500	7,587	41,700	374,100	
	1855	1,020	1,410	10,040	14,467	69,025	1,310,350	50,100
	1856	2,800	2,350	17,224	28,002	159,362	1,651,091	60,500
广州	1852	7,325	10,017	58,509	18,966	110,630	1,043,625	6,743,652
	1853	8,092	4,360	23,803	7,683	66,340	528,422	5,176,137
	1854	4,520	5,106	25,880	7,472	53,950	567,530	3,486,550
	1855	600	860	4,440	2,870	29,080	494,608	2,816,970
	1856	4,628	2,120	19,418	10,551	122,422	1,166,530	5,519,100

① 參見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3頁。

年,英国棉毛織品輸入上海和广州的数量如上表<sup>①</sup>。

上表說明:在英国于1852—1856年分別經由上海和广州輸入中国的七种棉、毛織品中,1852和1853年,經由广州輸入的数量多于經由上海輸入的数量者有綫織品、羽毛紗、粗嘍嘍和棉紗四种,其余呢絨、染色及印花布、平織布三种則是經由上海輸入的数量多于經由广州輸入的数量;1854年,除呢絨外,其余綫織品、羽毛紗、粗嘍嘍、染色及印花布、平織布五种(棉紗无記錄)都是經由上海輸入的数量少于經由广州輸入的数量;但到185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年經由广州輸入的数量多于經由上海輸入的数量者只有棉紗一种了,其余六种都是經由上海輸入的数量多于經由广州輸入的数量。

所有上述各方面的情况和数字都充分說明:1843年上海开埠后,我国的对外貿易即迅速由广州向上海轉移。正如馬克思在1858年10月所指出的:“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引者按:指第一次鴉片战争以前),英国的貿易只限于广州。后来准許开放五口,……使貿易逐漸由广州移至上海,……。”<sup>②</sup>

## 第二节 上海在全国对外貿易中首要地位的确立 及其原因分析

我国对外貿易重心由广州向上海的轉移,标志着上海已取广州而代之,在全国的对外貿易中确立了首要地位。

广州原是我国历代对外貿易的主要港口之一。1759年,

<sup>①</sup> G. W.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P. 167.

<sup>②</sup> 馬克思:«中英条約»,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8頁。

即清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和便于收税，禁止在福建和浙江等地各港口进行对外贸易，而把全国的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地进行。这样一来，广州就成了我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亦即在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首要地位。从1759年起，广州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首要地位保持了将近一百年（如果把乾隆二十四年以前的情况包括进去，年代还要久远得多），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被上海所代替。

19世纪50年代上海代替广州在全国对外贸易中首要地位的确立，可以从其进出口货值占全国进出口总货值的比重中全面地看出。据统计：1853年，英国输入中国的总货值为1,749,597镑，其中有1,045,000镑就是经由上海进口的，即那一年上海进口英国货值已占到全国各港进口英国货总值的59.7%；至1856年，所占比重又进一步扩大为75.8%，即全国进口价值2,216,123镑的英国货中有1,679,581镑是经由上海进口的。① 出口货值的统计数字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1853年，我国输往英国的总货值为8,255,615镑，其中的4,337,000镑就是经由上海出口的，即经由上海输往英国的货值已占到全国各港输往英国总货值的52.5%。② 英国是当时对华贸易的主要国家，其进出口货值一直占到各国对华进出口货值的百分之七十、八十甚至九十以上。所以，英国对华贸易50%以上在上海进行，这意味着上海已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确立了首要地位。

上海开埠后在对外贸易上迅速取广州的地位而代之，并

---

① 見附录，表4。

② 見附录，表5。

很快就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确立了首要地位，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鸦片战争后扩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并把经济侵略的重心由广州移至上海的结果。我们知道，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势力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十分不满足于在华南一隅同中国通商，一直处心积虑要把商业掠夺的范围扩展到长江流域以及广大的华中和华北各地。鸦片战争以后，它们迫使清政府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而在它们看来，这五个通商口岸中，上海较之其他四口又更有利于它们据为前哨据点，达到入侵广大中国内地的目的。因此，上海于1843年辟为商埠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就穷凶极恶地在这里攫取“租界”，控制海关，夺取特权，并且甚一日地把对华的商业掠夺活动由广州向上海转移。以掠夺中国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情况而论：丝和茶的产地都靠近上海，而离广州和其他口岸较远；上海开埠前，浙江和安徽等省出产的丝和茶多远程运至广州出口，上海开埠后，即缩短和改变了运销路线，大都就近转至上海出口。“就平水当地业茶者言，在清嘉庆、道光间，平茶已有输往海外，当时由广州出口，……。迄五口通商以后，平茶出口咸由宁波而趋上海矣。”<sup>①</sup> 丝的出口情况也是一样。“自海禁大开，夷商咸集上海，湖丝出口以南潯七里丝为尤著。”<sup>②</sup> “道光以后，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sup>③</sup> 同时，来华外国商人“冒险家”也一开始就察觉到：由于运输路程缩短，经由上海搜购丝、茶出口，较之经由

① 国民党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浙江之平水茶》，第2页。

② 周庆云：《南潯志》，卷32，第21页。

③ 同上书，卷33，第3页。

广州或其他通商口岸，可获得更高的利润。早在1845年，即有一个名叫乔治·斯密司（George Smith）的英国人这样写道：“欧洲人能在上海以低于广州10%的代价买到丝、茶和其他土产。中国商人由于要减少运费都愿意把各类对外贸易由南方的商业城市（引者按：指广州）转移到这个迅速发展的北方商业中心（引者按：指上海）来。”<sup>①</sup>其次，就进口贸易而论：上海地处中国海岸的中点；外国货物运达上海后，既可南销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又能北销广大华北地区。外国货物进口后，经由上海转口北运，较之经由广州或其他通商口岸便捷和节省。同时，上海扼长江出口处，有广大而富饶的长江流域腹地，水陆交通又甚为便利。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社会经济较发达，而在外国商人“冒险家”看来，江浙两省的丝和茶经此大量出口后，人们更有能力买进一些外国进口商品。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对于这些更为有利的进口条件当然不会放过。因此，上海开埠后，它们便把大量原先运销广州的货物源源转运到上海市场上来销售。所有上述种种因素综合起来发生作用，使得上海在开埠后的短短一、二十年內即取广州的商业地位而代之，发展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跃居全国对外贸易的首要地位。

---

<sup>①</sup> George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o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and Chusan», P. 138—139.

## 第七章 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貿易的性质和特点

### 第一节 对外貿易的性质

上海开埠后的对外貿易，不仅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說开埠前的对外貿易体现着一个主权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与国外发生的經濟关系；那末开埠后的对外貿易則愈来愈明显地表现为一个已失去独立自主权利的落后国家同侵略成性的資本主义强国間的不平等的經濟交往。这种經濟交往使上海开埠后的对外貿易帶上了愈来愈明显的殖民地性。

上海开埠后对外貿易的殖民地性在許多方面都有頗为明显的表現。

第一，上海在1843年开埠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貿易港口。那时，一切来自外国的商人和船舶，都要受到中国政府应有的檢查、管理和監督。他們在从事貿易活动时，必須严格遵守中国政府的法令，并按照中国政府所定的章則繳納貨物进出口稅。他們的其他日常經濟活动，也只能在中国政府法律許可的範圍内进行。这一切表明了当时对外貿易的独立自主性。但是，所有这类情况在鴉片战争失敗后即发生了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上海自1843年11月17日被英国資本主义

侵略势力根据“南京条约”强辟为商埠起，便迅速变成了一个中国自己几乎无权过問的通商口岸。从此，外国船舶可以随时任意闖进闖出，外国商人“冒险家”也可以随意跑来跑去横行不法，横蛮跋扈地拒不遵守中国政府的法令，肆意踐踏中国对外貿易的主权。具体說来，那就是：他們一开始就一步一步地控制中国的海关，对中国进行愈来愈凶狠的殖民地貿易掠夺。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都有由自己掌握的海关，通过对海关的控制，来保障本国不受外国的經濟侵扰，从而保护本国生产事业的发展，并按本国的情况組織国民經濟。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情况却与此不同。那里的海关大都被資本主义宗主国所直接或間接控制。它們失去了对本国海关的自主权。因此，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海关不仅无法起使本国經濟免受外国資本主义的侵扰的作用，反而变成了外国資本主义借以不断进行經濟侵略的工具。其对外貿易也就因而失去了独立并带上了殖民地性质。上海开埠后的中国对外貿易经历过这样的变化，也带有过基本上相同的性质。早在鴉片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即根据“南京条约”第十款的規定，迫使清政府承认：英国商人“应納进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这就使得中国海关失去了自由提高和降低进出口貨稅率的自主权。同时，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又确定了值百抽五的原則，这又使海关稅率被变相地固定了下来。1843年6月26日清政府官僚耆英和英国侵华首恶分子璞鼎查在香港共同声明：“中国内地关稅，定例本輕，今复議明，内地各关，收納洋貨各稅，一切照旧輕納，不得加增”。这更使源源而来的洋貨得以根据輕稅原則运銷内地。所有这



些規定都表明中国丧失了对海关的独立自主权。外国資本主义势力也就据此凶狠地对中国进行商业侵略。从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宣布开埠的第一天起,到那一年的年底止,外国商人“冒險家”組織貨物进出口,所付进口稅是16,564两8錢,出口稅是7,537两1錢9分,吨稅是985两;据說,“負擔的輕松,和他們以前在广州的时候比較起来,真有天壤之別。”<sup>①</sup> 这还只是上海开埠第一年的情况。1853年9月,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即利用这个机会派兵占据上海海关,进一步赤裸裸地夺取中国海关的行政权,并宣布实行所謂“領事代征制”。更令人憤慨的是,1853年,外国进口商品一度滞銷,大批貨物堆积在上海仓库中无法脫手;于是,一些洋行就要无賴手段,拒不繳納關稅,甚至向他們的駐沪領事要求停繳,說什么以此作为“貨物滞銷的补偿”;当时的英国駐沪領事当然答应了这一无耻要求,因而,英商在短短的三个月時間內,就賴掉了關稅168,000余两。<sup>②</sup> 1854年6—7月,清政府又在外国侵略者的要挾及誘騙下同英、美、法三国領事訂立了关于上海海关的协定九款,并同意它們派人組成“關稅管理委員會”。再后,上海以至全中国海关的稅务司均由英国先后指定英国人李泰国(H. N. Lay)和赫德(R. Hart)等担任。从此,中国海关的控制权就完全落入了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之手。中国海关不仅因而失去了保护本国經濟利

---

① 蒯世勛:《上海公共租界的发端》,見《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一年》,第52頁。

② 蒯世勛:《上海英美租界在太平天国时代》,見《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一年》,第276頁。

益的作用，反而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进行商业侵略的工具。此外，甚至还有許多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分子根本就不经过海关，肆意組織大量貨物的走私进口和出口，进一步踐踏中国对外貿易的主权。走私在一般平等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間的对外貿易中虽然也存在，但却是暗中进行的，数量也不大，而且被緝获后还要受到处罰。但是，上海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分子的走私活动却是以“租界”为据点、以特权为庇护、以武力为手段大規模地明目張胆进行的。他們在进行走私活动时，根本就不考虑被緝获和受处罰等問題。所以，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分子在上海开埠后所进行的已不是一般意义的走私活动，而是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殖民地貿易掠夺的一种方式。关于上海开埠初期外国商人肆意走私的情况，王韜曾記述道：上海“北关虽无侵漁之弊，而偷漏甚多。盖中外語言不通，而西人又桀黠狡詐，往往以小艇运貨出口，乘間揚帆而去，不及譏詰；即使及之，而貨之貴賤多寡已不可稽，华官又恇懦模糊了事而已。”<sup>①</sup> 1850 和 1851 年，上海海关緝获了两起巨大的外商走私案件。一件是：英船“瑪利·伍德女士号”（Lady Mary Wood）裝載鴉片进口后，怡和洋行的經理德勒斯（A. G. Dallas）不办报关手續即托它裝运 699 包生絲出口，共偷漏关稅 8,107 元。另一件是：英船“約翰·德格代尔号”（John Dugdale）从上海运走 458,651 磅的茶葉，而报关納稅的数字却只有 257,251 磅，即有 201,400 磅是走私出口的，偷漏了关稅 7,233 元。<sup>②</sup> 这只是两件頗为聞名的走私案。类似

① 王韜：《瀛壖杂志》，卷 2，第 9 頁。

②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2 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9—10 頁。

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上海在它辟为通商口岸以来的前十年中，……在走私和各式各样违反关章的行为方面，却也是远近闻名的。……偷漏税课的情形，在中国和外国商人两方面都非常流行……。在那时，上海充满着‘一批最难驾驭的无赖冒险家’，各国人都有，其中许许多多都是加利福尼亚州成群结队奔向新采金地的热潮中溅出来的浪花；他们被发财的欲望吸引到中国，打算从当时一般混乱的政治情况和漫无法纪的贸易情况中，发一笔横财。”<sup>①</sup>当时，外商在上海走私的情况竟猖獗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把走私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常事，而反把不走私说成是例外和“损失”。1850年第一季度，英商林赛洋行走私的规模不如别家大，相比之下，竟说自己“损失”了两万元。于是，这家洋行的老板浩格便上书当时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阿礼国说：他“要和任何人一样地大事走私了”，因为，在他看来“这并不能算是丢面子的事情”。更加令人愤慨的是，阿礼国竟这样恬不知耻地回答他说：“这有两条路可走，——实行走私，否则，你就根本不必做生意罢！”<sup>②</sup>对于这类猖獗走私的情况，连外国侵略分子自己有时也不得不公开承认。据英国公使卜鲁斯（F. Bruce）说：上海一口，开关不久，走私就猖獗起来，其规模之大，“使得海关税则实质上已失去作用。”<sup>③</sup>

第二，从中国进口和出口商品的结构来考察，同样可以看

---

① 萊特：《中国关税沿革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3页。

② 严中平：《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英美“领事”和“商人”》，见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87—188页。

③ 同上书，第193页。

出上海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前来进行的是殖民地性质的贸易。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宗主国对所属殖民地进行掠夺性的殖民地贸易通常都带有这样一个鲜明的特征：竭力推销工业品，把殖民地变成其商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尽情掠夺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又把殖民地淪为其原料的供给地；从而使殖民地愈来愈深地变成它的经济附庸。上海开埠后的中国对外贸易正具有这类特征。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开埠后经由上海输入中国的商品，除鸦片外，绝大部分是棉毛织物等工业品。据统计：若以1850年上海进口的总货值为100，则除54%是鸦片外，即有40%是棉织品（其中棉织品为34%，棉纱为6%），其他商品的货值只占6%，而这6%的商品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毛织品。<sup>①</sup>又如，英国船只于1851年运至上海价值达4,299,192元的货物中（鸦片进口除外），即有价值3,446,952元的货物是棉织品<sup>②</sup>，占到80.1%；倘把进口毛织物的价值加进去，所占的比重还要大。1850—1851年以前或以后的情况一贯都是如此。在1860年上海进口的总货值中，除掉48%是鸦片外，就有48%是棉织品和棉纱，即在剩下的4%的货物中也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毛织品。<sup>③</sup>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输入鸦片和工业品，而我国出口的却几乎全是丝茶等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前面已经提到：1850年，我国经由上海出口的总货值中，有52%是生丝；46%是茶叶，剩下的2%

①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P. 120.

② 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1卷, 三联书店1957年版, 第521頁。

③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P. 120.

也是其他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又若以1860年上海出口总值为100，则生丝占66%，茶叶占28%，其他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占6%。<sup>①</sup>这类进口和出口商品的结构和比重充分说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一开始就是把上海附近的江南地区和东南沿海作为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及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供给地来经营商品的输入和输出的。这种贸易正是资本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贸易。

第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经由上海对中国进行的是不等价交换的贸易。这也表明：这种贸易具有殖民地性。我们知道，不等价交换是资本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和附属国进行掠夺性的贸易的一个重要属性。他们为了要凶狠地掠夺殖民地人民，就进口商品而论，往往按大大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甚至以劣充好和以假冒真，赚取高额利润；就出口商品而论，又往往按大大低于价值的价格搜购殖民地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甚至还经常利用各种时机压价收购，使殖民地农民遭受巨大的损失。上海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对中国进行进出口贸易就曾一直耍弄不等价交换的骗术，加重了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以茶、丝为例。据记载，“自各口通商后，利之操纵，尽归外洋。中国所产茶、丝为二大宗。当茶出时，众夷来买，……如值银一百两，仅出银五六十两……。”<sup>②</sup>“中国出口之丝，每包百斤，仅值三百余金。上海西人所设缫丝各厂，购中国蚕丝，以机器缫之，每包值七百余金，高下悬

---

①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P. 119.

② 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二，胡雪岩。

殊……。”<sup>①</sup>上海从一开埠起，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略中国的据点，也是所谓“冒险家的乐园”；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分子在对华贸易中所耍弄的种种投机诈骗，在上海可以说应有尽有。所以，这种掠夺性应该说在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

这里，人们可能要问：鸦片战争后，中国并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而是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怎么能说上海开埠后的对外贸易愈来愈明显地带有殖民地贸易的性质呢？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是否具有殖民地性质，从根本上来考察，当然要看它是不是殖民地；但这却不是唯一标准，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必须同时加以考虑。我们知道，殖民地贸易具有这样两方面特征：第一，参与贸易的双方中，一方失去了贸易的独立自主权，另一方却因此得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商业掠夺，从而造成了一种只利于后者而不利于前者的不平等的贸易关系；第二，参加贸易的双方中，一方被沦为另一方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及原料的供给地，从而遭受到严重的经济侵略。一国的对外贸易，只要具有上述两方面的特征，即使它还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其对外贸易也不能不是殖民地性质的贸易。这就是说：殖民地同宗主国的贸易是殖民地贸易，但被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对象开展殖民地贸易的国家却不一定是完全的殖民地。鸦片战争后，中国虽然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但中国各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对外贸易却明显地具有上述两方面的特

---

<sup>①</sup> 陈澧：《续富国策》，卷一，种桑育蚕说。

征。而且，上海自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就一步一步地在这里强占了“租界”，驻扎了军队，攫取了种种特权，控制了中国的海关，操纵了水陆交通运输，建立了“租界”的行政统管，排除中国政府的行政权力，把“租界”变为中国境内的“国中之国”，并凭借这一切对中国进行商业掠夺。所以，这里的对外贸易，就其实质来说，不能认为是独立自主的贸易，而只能看成是殖民地性质的贸易。

人们可能还会问：鸦片战争后，中国各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对外贸易既然是殖民地性质的贸易，那末，可不可以据此就说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殖民地社会？不能这样说。因为，殖民地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侵入落后国家并使它们淪于隶属地位而形成的，即因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入侵而完全丧失了独立的国家才叫做殖民地。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虽遭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入侵，对外贸易也因而带上了愈来愈明显的殖民地性质，但是，却没有因而完全丧失独立，相反的，在形式上甚至在某种程度的实质上还保持了一定的独立状态。所以，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殖民地，而是一个正在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对外贸易的殖民地化，并不足以改变国家的这一性质。

## 第二节 对外贸易的特点

上海开埠初期的对外贸易还呈现了若干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有的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殖民地贸易带来的，有的是导源于中国小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对外国商业侵略进行的坚强抵抗，有的则是中国



农副产品在自然經濟逐步瓦解过程中日益卷入世界市場的結果。

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貿易的第一个特点是：在进口貨值中，鴉片貨值一开始就占有很大比重，其絕對數額甚至經常大大超过一般进口商品的貨值。据統計：1849年，上海进口鴉片的貨值是13,404,230元，而进口一般商品的貨值却只有5,804,793元，即进口鴉片貨值超过进口一般商品貨值的1.3倍。<sup>①</sup>而且这种情况是連年存在的。据統計：1854年7月至1855年6月的一年間，上海进口外国貨值为12,620,978两；其中，鴉片貨值即占到9,113,454两，而一般商品貨值却只占3,507,524两；这就是說，那一年进口鴉片貨值是进口一般商品貨值的2.3倍。又，1855年7月至1856年6月，上海进口鴉片貨值(11,529,308两)也比进口一般商品貨值(6,492,299两)大77.5%。<sup>②</sup>这类情况說明：在上海开埠初期的进口貨物中，鴉片所占的比重是大得惊人的。这一特点，是由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对华貿易的殖民地性和掠夺性所决定的，充分反映了他們的卑鄙、阴險、毒辣和无耻。

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貿易的第二个特点是：一般商品的进口貿易(不包括鴉片进口)在头两年虽然增长迅速，但总的看来依然发展緩慢，很不稳定，有时停滞不前，有时甚至連年下降，而出口貿易却是不断迅速上升和扩大的。以一般商品的

①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02、403頁。

②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P. 61。

进口貿易而論，1843、1844、1845年，进口貨值虽然逐年增长，但自1846年起即連年下降，直到1849年才轉而回升到接近1845年的水平；1853年，进口貨值虽續有上升，但在1854年7月至1855年6月的一年內又轉趨下降，即一度跌落到只約同1849或1845年的进口数字相等。<sup>①</sup>但出口貿易的情况却与此完全不同。以主要輸出品——茶叶出口的情况为例：1844年，即上海开埠第二年，經由上海出口的数量是1,149,000磅；再过一年，即1845年，便上升到了3,801,000磅，增长了二倍多；1846年增长幅度更大，达到了12,460,000磅，即較1844年激增了九倍多，較1845年也多出了两倍余；自此以后，直到1855年，經由上海出口的数量更是不断迅速上升，1855年一度高达80,221,000磅，这个数量是1844年的69倍，較1845和1846年也分別增多了20倍和5倍余；1856至1860年，經由上海出口的数量虽在1855年最高峰的基础上一度轉趨下降，但每年出口的数量仍一貫保持在40,000,000磅至近60,000,000磅之間，最高額年份超过了1852年以前的任何一年，最低額年份也比1851年以前的任何一年为多。<sup>②</sup>另一主要輸出品——生絲，經由上海出口的趋势也大致相似：1845年，即上海开埠后第三年，出口数量是6,433包；第二年，即1846年，便上升为15,192包，增长了1.3倍；自此以后，出口数量的总趋势也是不断增多的，1853

---

① 見附录，表1。

②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3頁。

年达 58,319 包, 1856 年更上升为 79,196 包, 1858 年增长到了以往历年的最高峰, 即共达 85,970 包, 这年的出口数量是 1845 年的 13.3 倍。<sup>①</sup> 以上两方面的情况说明: 一般商品的进口贸易发展缓慢, 很不稳定, 有时停滞不前, 有时甚至连年下降; 而出口贸易发展之速和扩展之大却又呈现了惊人之势。这确实是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中国市場所特有的现象乃是: 自从根据 1842 年的条约而开放中国市場以来, 中国出产的絲茶向英国的輸出額不断在扩大, 而英国制造品对华輸入額, 整个說来, 却停滞不前。”<sup>②</sup>

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的第三个特点是: 出口貨值經常大于一般商品(鴉片除外)的进口貨值, 其間的差距有时甚至是很大的。这一特点同第二个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 正是由于一般商品进口贸易的停滞不前与出口贸易的不断迅速上升一直同时存在, 才經常导致出口貨值經常大于一般商品的进口貨值。同时, 由于出口貨物經常数量很大, 而进口貨物却因一度遇到中国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結合为內容的經濟結構的抵抗而数量不多, 这又造成了出口貨值同进口貨值之間的差距有时是很大的。上海开埠初期的 20 年中, 出口貨值大于一般商品进口貨值的情况是很明显的。这类情况从下列統計数字中即可清楚看出:

---

① 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1 卷, 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第 413 頁。

② 馬克思: 《貿易与条约》, 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第 91 頁。

1843--1863 年上海进口和出口货值表①

年 份	进 口 货 值	出 口 货 值
1843年11月17日至年底	433,729两	147,172两
1844	501,335镑	487,528镑
1845	1,224,079镑	1,344,650镑
1846	1,066,172镑	1,526,960镑
1847	1,009,229镑	1,517,299镑
1848	806,495镑	1,305,615镑
1849	1,209,332镑	1,754,656镑
1850		
1851年下半年	4,318,000元	10,403,000元
1852		
1853	1,843,000镑	5,381,000镑
1854年7月至1855年6月	3,507,524两	24,549,062两
1855年7月至1856年6月	6,492,299两	23,427,216两
1856年下半年	5,189,821两	20,530,337两
1857	15,863,393两	33,344,435两
1858	19,017,049两	30,623,759两
1859	20,635,130两	36,670,606两
1860	26,225,588两	31,363,880两
1861	33,702,614两	28,238,733两
1862	40,701,584两	47,569,966两
1863	61,704,099两	38,485,465两

注：进口货值中不包括鸦片货值。

上表说明：（一）从1843至1863年的这一时期中，除1843、1844、1861和1863年四年是进口货值大于出口货值以及1850和1852年无资料可考外，其余15年都是出口货值大

① 见附录，表1。

于进口貨值的。(二)从 1845 年开始出現出口貨值大于进口貨值的情况后,直至 1855 年上半年,出口貨值大于进口貨值的差距而且是逐年扩大的,只有 1849 年的差距曾一度略微縮小了一点。(三)出口貨值大于进口貨值的差距一般都很大。1845—1849 年,出口貨值大于进口貨值的幅度是在 9.8% (1845 年)至 61.8%(1848 年)之間。1851 年下半年,出口貨值大于进口貨值的幅度又有扩大,达到出口是进口的 2.4 倍。1853 年,出口貨值大于进口貨值的幅度更上升到前者为后者的 2.9 倍。1854 年 7 月至 1855 年 6 月,出口貨值大于进口貨值的幅度甚至一度扩大到将近 7 倍。此后,直至 1860 年,出口貨值大于进口貨值的幅度虽出現了縮小的傾向,但出口貨值仍大于进口貨值很多;計: 1855 年 7 月至 1856 年 6 月大 2.6 倍, 1856 年下半年大 2.9 倍, 1857 年大 1.1 倍, 1858 年大 61.0%, 1859 年大于 77.7%, 幅度最小的 1860 年出口貨值也大于进口貨值的 19.5%。出口貨值經常大于进口貨值的这类情况表明:如果不把鴉片进口貨值計算在內,当时中国經由上海对外国的貿易多数年份是出超的。这不能不說是資本主义国家对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貿易中很少呈現的一种特有現象。

上海开埠初期,由于出口貨值經常大于进口貨值,以英国資產階級为主的某些外国侵略势力在若干年份內甚至不得不迫于形势,違反自己的愿望,忍痛把金銀輸入中国来弥补其間出現的差額。这也是資本主义国家进行殖民地貿易时較为少見的現象。1853 年 11 月 26 日至 1857 年 8 月 15 日,单单英国半島东方航运公司的輪船經由上海輸入中国的金銀額即可

从下表看出①：

輸入日期	輸入金額
1853年 11月 26日	1,544,500元
1854年 1月 21日	843,700
1854年 2月 11日	532,300
1854年 8月 26日	726,700
1856年 5月 10日	1,300,000
1856年 10月 11日	1,500,000
1857年 6月 27日	1,208,500
1857年 7月 25日	2,250,000
1857年 8月 15日	2,078,000

此外，当时其他按月开抵上海的輪船也輸入了相当数量的現金銀。1856年进口达20,400,000元。② 1857年，除从华南輸入了价值1,750,000元的銅錢外，还有价值17,500,000元的銀子直接进口。③ 外国侵略势力对于这种因中国出口貨值大于其进口貨值而不得不以現金銀来弥补其間差額的貿易是感到恼火的。他們决不会容忍这种他們自己认为不利的貿易关系存在。因此，他們在这期間，一面加紧在华攫取种种特权，以便尽快扭轉这种局面，一面則大量輸入鴉片来把流到中国的現金銀弄出去，使中国由一般商品貿易的出超一变而为貿易总額上的入超。因为，上述出口貨值大于进口貨值是一

①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24—525頁。

② T. Roger Banister: «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 1834—81», P. 22。

③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25頁。

般商品而言，并不包括大量进口的鴉片貨值在內。倘把大量輸入的鴉片貨值加进去，情况則大大不同了。以1858年的情况为例：这一年，上海出口貨值是30,623,759两，一般商品的进口貨值是19,017,049两，即出口大于进口61.0%。但是，若把这一年鴉片进口貨值(15,822,320两)加进去；則进口貨总值为34,839,369两，反而大于出口貨值了。1860年，一般外国商品經由上海輸入中国的貨值为26,225,588两，而上海出口貨值却达31,363,880两，即出口貨值比进口貨值大19.5%，但那一年鴉片进口貨值为14,857,440两，与一般商品合計共有进口貨总值41,083,028两，这个进口数字就大于出口貨值了。① 1858、1860年如此，在鴉片輸入数量很大的各年，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就是說，从一般商品的进出口貿易看来，某些外国侵略势力虽不得不輸入一些現金銀来弥补中国出口貨值大于其进口貨值的差額，但由于鴉片的大量进口，不仅輸入的金銀被他們弄回去了，而且反使大量中国現金銀因入超的逐年增大而与日俱增地源源外流。据統計：1858至1863年，外国貨物(包括鴉片)經由上海輸入中国的总值为299,056,952两，而中国出口貨值則只有212,952,409两，即中国在上海一港入超达86,104,543两，亦即在这6年內，仅就上海一地的情况而言，中国就應該有86,104,543两的金銀經由上海外流，其中有一部分即化作利潤流入了英、美等国資產阶级的腰包，而中国人民却因而損失了价值八千多万两的財富。② 由此看

①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P. 61。

② 見附录，表1及表21。



来，外国侵略势力对上海开埠初期进出口贸易所不感满意的是一般货物的进口数量未如他们主观希望的那样立即直线上升，是表面上因而一度形成的个别商人的少量现金银的流入，但如把因大量鸦片进口而使中国在贸易的全局上陷于入超以致反有大量白银源源外流的情况算进去，他们就不会那么假惺惺地表示“遗憾”和“愤慨”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如果撇开可耻的鸦片输入不谈，那时中国出口货值大于外国进口一般商品货值是否真的不利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呢？实际情况也完全不是如此。道理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尽管中国出口货值经常大于外国进口一般商品货值，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却在对华贸易不断进行的过程中，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大门，对中国逐步开始了全面的经济侵略，并为其政治侵华和文化侵华开辟了道路及创造了条件。第二，这种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起了愈来愈深的侵蚀作用，把中国经济一步一步地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从而逐渐变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工业原料的供给地，并因而慢慢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沦为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附庸。第三，外国资本主义的商业侵略虽然起初一度遇到了中国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内容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抵抗，但从其发展趋势来看，却是在不断瓦解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使日益增多的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陷于破产，并侵夺了他们的生计。第四，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通过商业侵略，从上海等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在中国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残酷地掠夺中国人民。以上四方面的情况

和理由雄辯地說明：上海開埠初期，即使撇開鴉片貿易不談，中國出口貨值大於外國進口一般商品貨值，從全局來看或從趨勢來看，也只能有利於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而嚴重地不利於中國人民！

況且，上海開埠初期中國出口貨值大於外國進口一般商品貨值也是暫時現象，往後不久，隨着中國市場的進一步被打開及社會經濟的進一步被侵蝕，這種情況的本身也跟着改變，即中國出口貨值逐漸由大於而變為小於外國進口一般商品貨值了。這就是說，鴉片貿易在外的一般商品的進出口貿易也由出超變成了入超。據統計：從1865至1885年，前後20年間，已變為年年是進口貨值大於出口貨值，而且其幅度是不斷擴大的；1865年，進口貨值（38,387,777兩）大於出口貨值（29,559,622兩）29.8%；過10年，至1875年，進口貨值（45,862,356兩）又大於出口貨值（30,808,324兩）48.8%；再過10年，至1885年，進口貨值竟比出口貨值大1.1倍。<sup>①</sup>這就是說，1865年以後，即使撇開鴉片進口不談，在一般商品的進出口方面，中國也已變為連年入超，而且入超數額是日益增大的。這也就意味着：從此，中國在一般商品的進出口方面也因變為連年入超而有大量現金銀化作殖民地貿易利潤流入了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分子的貪得無厭的腰包。

所以，上海開埠初期對外貿易的任何一個特點都反映了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對中國人民的掠奪及中國人民因而遭受的殘害。

---

<sup>①</sup> 羅志如：《統計表中之上海》，第90頁。

## 第八章 外国資本主义商业侵略的影响和后果及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

### 第一节 自然經濟的破坏和商品經濟的发展

外国資本主义的商业侵略，不仅从中国人民手中日益增多地掠去了巨額的財富，而且一开始就給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社会經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并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其中最为直接的是：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础，造成了大批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經濟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經濟一步一步地带上了愈来愈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在鴉片战争前虽然已有較为发达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貿易，但在整个社会經濟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具有很大比重并占着优势。这种情况，在四乡农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据記載：康熙年間，上海农村“女子庄洁自好，无登山、入庙等事，井臼之余，刺綉旨蓄，靡不精好。至于乡村紡織，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日以万計，以織助耕，女紅有力焉。”<sup>①</sup> 上海四乡农家这种以織助耕的基本上自給自足的

---

<sup>①</sup> 姚光发等：《华亭县志》，卷二十三，杂志。

生活，直至开埠前十余年的道光年間还没有多大改变。上海附近各县农村的情况也是一样。乾隆年間，“江南苏、松、杭、嘉、湖，而貧民俯仰有資者，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紡絮；十二、三岁，即能織布，一日經營，供一人之用度有余。”<sup>①</sup>至道光十三年，“太仓、鎮洋、嘉定、宝山四州县，地处海濱，……向来多种木棉，紡織为业。小民終岁勤动，生計全在于棉。”<sup>②</sup>上引各类記述表明：鴉片战争前，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如苏州、松江、嘉定、宝山和太仓等州县）的农村經濟仍然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即大多数农家过着以織助耕和自筹衣食的生活，同商品市場很少联系甚至沒有联系，家庭棉紡織手工业和小农业普遍結合得相当紧密。

但是，自从上海于1843年开埠后，上述情况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上海于1843年的开埠，虽未能立即导致江南及长江下游地区自然經濟优势地位的消失，它在19世紀40—50年代甚至还曾凭借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結合坚强抵抗过外国資本主义的商品侵入；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这种抵抗并未能一直持久下去，其原有地位也就因而逐渐发生了动摇。到19世紀60—70年代，这一带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在外国資本主义的侵蝕下不断被割离。原来以織助耕和自筹衣食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也就跟着日趋解体。据道光年間的記載：“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較稻田倍蓰，虽橫暴尙可支持。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紡織为业，近聞已

---

① 黄彭年等：《畿輔通志》，卷二三一；河南巡撫尹会一奏疏。

② 朱廷射等：光緒《宝山县志》，卷三。

无紗可紡，……。”<sup>①</sup>此后，苏州也出現了类似的情况。“雍正、乾隆之間，松江以織布富甲他郡，后夺于苏州之布，而松布失其利。近（引者按：指1859年前几年）洋布行，而苏民亦失其利。盖自谷帛賤于銀，而农桑之利夺矣。农桑之利夺，而耕織之人少，耕織之人少，而谷帛之所出亦少矣。”<sup>②</sup>松江、太仓、苏州的情况如此，上海本地农民家庭棉紡織手工业被破坏的情况，那就更为厉害。“本邑（引者按：指上海县）妇女，向称朴素，紡織而外，亦助农作，自通商而后，土布滞銷，乡妇不能得利，往往有因此改业者。”<sup>③</sup>又据記載：“我邑（引者按：指上海县）濒海，多沙地，棉花实所种，以此作布，不利倍于粟，其美利也。比年因各口通商，洋布甚行，而木棉頓滞，盖亦一厄云。”<sup>④</sup>关于外国进口机制棉紡織品破坏中国农民家庭棉紡織手工业的情况，有的外国侵华分子也曾供认不諱：“中国人所織的白而結实的布比我們（引者按：指英国）的貨物貴得多。我在上海发现，由于我們的布代替了他們的布的结果，他們的織布业已迅速下降了。”<sup>⑤</sup>与此同时，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以上海为据点在长江流域不断大量搜购絲、茶等农副产品也加速了这一带地方自然經濟的破坏。这是因为：外国資本主义不断大量搜购絲、茶等物資，扩大了这些商品生产在农家經濟中的比重，从而使棉、粮等本来含有一部分自給性的生产所占的比重相对

① 包世臣：《安吳四种》，卷二十六，答族子孟开书。

② 徐蕡：《未灰斋文集》，卷三，务本論饜辨篇第三。

③ 李維青：《上海乡土志》，女工。

④ 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四。

⑤ 《Report from Select Committee on Commercial Relation with China, 12 July, 1847》，P. 66。

下降。上海开埠前,长江流域出产的絲、茶虽然已經行銷国内各地并拥有相当广闊的国外市場,已經是頗为发达的商品生产,但在当时的市場条件下,絲、茶等的商品生产在农业生产中还只占較小的比重,发达的程度毕竟有限。农家經濟生活的主要部分还是在于从事棉、粮等自給性的生产,基本上仍然是属于自然經濟的范圍。但是,上海开埠后,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絲、茶的不断大量出口,而且数量一直急剧上升,絲、茶的生产就因受到了市場需要增长的刺激而迅速扩大。絲、茶生产的迅速扩大,其結果必然是:一方面扩大了农家經濟中商品生产的比重,另一方面又同时导致了农家經濟中自給性生产所占比重的相对縮小。这一变化意味着:絲、茶产地农家自給自足的經濟进一步受到了破坏,自然經濟的解体也进一步加速和扩大。同治年間以前,江苏长兴已有这样的情况出現:“农桑并重,而湖俗之桑,利厚于农。自夷人通商,长兴岁入百万計。……而数十年来,其利倍蓰,故桑譜蚕述之书,其視言稼穡較詳。”<sup>①</sup>长兴的情况表明:上海开埠后,由于蚕絲出口的不断增加,农家已日益重視蚕絲的商品生产,而对自給性的粮食生产反而并不那么重視了。长兴的情况如此,江南一带蚕桑事业更盛的其他地区,情况当更为突出。

上海开埠后,外国資本主义的商业侵略,一方面加速了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广大农村自然經濟的解体,另一方面又同时在客觀上促进了这些地方商品經濟的发展。首先,农村棉紡織手工业因遭到外国机制棉紡織品的排挤和打击而陷于停頓

---

① 丁宝书:同治《长兴县志》,卷八。

后，原先农家用以自己紡紗織布的棉花就不得不拿到市場上去出賣，從而由自給性產品變成了為市場而生產的商品。據記載：19世紀60—70年代，“松、滬土產以棉花為大宗，……；為贍養計，每日黎明，多人担花挈布入市，投行售賣者踵相接也。交冬棉花尤甚，行棧收買堆積如山。”<sup>①</sup> 這證明當時松、滬地區棉花商品化的規模是很大的。其次，農家為了獲取更多的棉花到市場上去出賣，甚至擠出稻田大量栽種棉花，從而形成了專為市場而生產的商業性棉產區。據記載：19世紀70年代，上海、南匯兩邑以及浦東西“均栽種棉花，禾稻僅十中之二。”<sup>②</sup> 這又進一步證明了棉花商品生產的擴大。再次，由於農村家庭棉紡織手工業遭到了破壞，許多農家對某些日常生活用品（如衣、被等）的需求也或多或少地同市場發生了聯繫，從而由自給自足轉為仰賴市場供給。此外，農家用以向市場購買衣、被等商品的貨幣，固然大部分是由出賣棉花而來，但也一部分是因出售糧食而得到的。這樣，原先完全自給自足或基本自給自足的糧食也被日益增多地卷入了市場，在不同程度上由自給性產品轉化成了商品。最後，還有這樣一種情況：由於棉花進入市場後，銷路日好，農家因而進一步多種棉花、少種糧食，致使日常口糧寧願用出售棉花得來的貨幣去購買，這又進一步促進了供應糧食地區的糧食生產的商品化。同時，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大量搜購絲、茶等農副產品出口也刺激了這類商品生產的發展。生絲輸往國外的數量也日益增多。

---

① 葛元煦：《滬游雜記》，卷二，花布。

② 《申報》，光緒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据記載：輯里地方出產的絲，“起于前明洪武年間，至遜清道光二十二年五口通商而后，銷售上海洋庄轉運出口，其名始顯。其時常年出口者，初自二千數百担增至三千五百担左右。”<sup>①</sup>生絲出口數量的日益增多，使得這些地方的農家相對縮小糧食生產而擴大蠶桑生產。這些地方的經濟也就因而愈來愈廣地卷入了商品市場特別是國際商品市場。其結果，一方面使得當地自給自足的農業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斷縮小，另一方面商品經濟又因而有了迅速的發展。

商品經濟的發展表現在上海本市內，那就顯得更加明顯。上海于 1843 年開埠后，由于同國內外各地的商業交往日益頻繁，不久即一躍而為我國最大的商業都市，造成了商業的飛速發展。19 世紀 60 年代，上海市內商業即已發達到了這樣的境地：“上海城北連甍接棟，昔日桑田，今為廛市，皆從亂后（引者按：指 1855 年小刀會起義失敗后）所成者，烟火數萬家，几為大聚落，其間海貨山錯靡一不備。其自城北至城東，逶迤相屬，几百十餘里許，自馬場街以至小鄉蠟里皆新所命名者也，而以寶善街最為熱鬧，灯火輝煌，自宵達旦，凡有所求咄嗟立辦，誠沪上之銷金鍋也。……黃浦渟泓浩瀚，直匯滄波，賈舶商鯨，羽集鱗萃。向時沿浦而居者多漁家，芦叶菱花，情致蕭瑟。今浦西為西人通商總集，金碧樓台，凌觚煥日，初至者從船中遙望之，仿若在圖畫中。”<sup>②</sup>再過不久，至 70 年代初，由于與國內外各地商業關係的進一步擴展和密切，上海的市況又

---

① 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吳興農村經濟》，第 11 頁。

② 王韜：《瀛壖雜誌》，卷一及卷五。

更趋繁盛。据当时目击者記載：那时，“上海为通商碼頭，輪船所至，南閩、粵，北燕台、天津，及出外洋各国必經之地。”<sup>①</sup>由于商业日盛，当时，上海已发展成为国内外貿易的樞紐和大宗貨物的聚散地。单以国内土特产的运銷而論，那时，东北辽宁、登萊一带的商人紛紛把大豆及其制成品油餅販运到上海来，再轉銷到湖北、福建、广东等省去。因此，除了本市原有的豆行和豆餅行外，各省經營杂粮油餅商业者也有很多到上海来开行設鋪，进行大量购銷。当时豆行規模很大，因之南市豆行集中的地方称为“豆市街”，豆业交易的銀两专称姓豆規銀。除豆行和豆餅行外，在19世紀70年代之初，上海市內已拥有76家絲棧和絲号、20家茶棧、22家出售洋布呢羽的洋貨号、129家山西和南北市汇划錢庄、12家供商旅住宿的客棧。<sup>②</sup>由于商务的迅速发展，各地前来从事国内外貿易的人数也急剧增多，在短短一、二十年內即发展成为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商业城市。英“租界”、法“租界”以及后来由英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在开埠前，原是一片荒漠的河滩；但到1865年，“公共租界”即聚集了92,884人，法“租界”也已有55,925人，合計共达148,809人，如果把旧城內的居民加进去，全市总人口当在三、四十万以上。<sup>③</sup>以上各方面的情况具体說明，上海开埠后，市內商业的发展是十分显著的。但这里也必須着重指出：这种发展是外国資本主义通过这里对中国进行掠

① 葛元煦：《沪游杂記》，卷一，客棧。

② 同上书，卷四，絲棧、絲号、茶棧、山西汇业、南市汇划錢庄、北市汇划錢庄、洋貨、客棧。

③ 上海市文獻委员会1948年編印：《上海人口志略》，第19、24頁。

夺性的殖民地貿易带来的，因而所反映的不过是殖民地城市的畸形的商业繁荣罢了。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同国内各地的商业关系日益频繁和日益密切，上海开埠后即迅速发展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前哨和重要据点，外国资本主义也就通过各种商业渠道，从这里把无数根进行殖民地貿易的吸血管伸入中国内地广大地区，不断吸吮着中国人民的血汗。

自然經濟的瓦解和商品經濟的发展，对于处在封建末期的社会說来，本来是一种历史进步现象，但是，这一变化发生在鴉片战争后的中国却有其特殊内容和特殊結果。中国自然經濟的加速瓦解和商品經濟的加速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而进行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扩展殖民地貿易和加紧商业侵略所强行促成的，而不是中国社会經濟内部加速演变的结果。所以中国自然經濟的加速瓦解和商品經濟的加速发展，主要体现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对中国农村經濟的破坏和对小生产者农民的剝夺，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导致了中国社会經濟对外国资本主义經濟的从属。上海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在那里所作所为的就正是这样。因此，上海开埠后长江下游江南地区自然經濟的加速瓦解和商品經濟的加速发展，其結果只能是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而不利于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經濟的正常发展。

## 第二节 中国买办資本的形成及中国封建地主經濟同外国资本主义的結合

上海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前来从事殖民地貿易掠夺的

另一后果是：导致了中国买办資本的形成及中国封建地主經濟同外国資本主义的結合。

买办資本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是外国資本主义为了便于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进行商业掠夺而在当地培植起来的一种特殊資本。外国資本主义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会中培植买办資本不是偶然的，而是事态发展的必然結果。因为，外国資本主义势力开始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从事商业侵略时，大都人地生疏，既不大了解当地市場需要何种商品，又不大知道当地有哪些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可供搜购（他們在中国进行商业侵略时，由于鴉片战争前即已同中国发生了长期的貿易关系，情况虽然不全是如此，但要全面地和彻底地了解这些也是做不到的）；同时，他們前来从事殖民地貿易的人数毕竟不会很多，因而要在地区广闊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全面进行商业掠夺往往感到力不从心。这就决定：他們要在当地全面开展殖民地貿易，必須找到和培植一些当地人充当他們买卖的居間人或代理人，供他們驅使，协助他們推銷工业品及搜购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为他們的利益服务。这些被他們找到和培植起来的由当地人充当的居間人或代理人便逐渐变为买办階級，其資本也就逐渐形成成为买办資本。

外国資本主义势力早在鴉片战争前来广州同中国进行貿易时，即已借助于中国商人为其买卖的居間人。这些充当其买卖居間人的中国商人就是当时曾經煊赫一时的“十三行”商人。“十三行”商人当时确曾成为外国开展对华貿易的居間人，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起来了巨額的財富；但也必須指出：他們

当时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买办阶级，他们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也没有形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买办资本。因为：第一，近代意义上的买办资本和买办阶级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产物，而“十三行”商人居间于中外贸易时，中国还没有沦为半殖民地，仍旧是封建社会；第二，“十三行”商人虽然充当了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贸易的居间人，但不仅没有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所驱使，反而受封建王朝的委托，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和支配着来华的外国商人；第三，“十三行”商人在同外国商人发生商业接触时是处于独立和平等的地位的，并未变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所以，如果把“十三行”商人划为买办阶级，把他们积累起来的巨额的财富列为买办资本，这是不妥当的。但在这里也应该着重指出：“十三行”商人有些是中国近代买办阶级的先驱，他们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后来也大部分转化成了中国近代的买办资本。因为，鸦片战争前，“十三行”商人及其财富本来有可能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逐步茁长的过程中，流入生产领域，转化为独立的产业资本，他们也就跟着转变为产业资产阶级；另一个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在中国主权逐步丧失的过程中，变成买办阶级和买办资本。但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贸易也因而逐渐带上了殖民地贸易的性质。这一变化，使得“十三行”商人及其财富大部分循着后一个方向发展，即变成了买办资本和买办阶级。五口通商后，许多原来的“十三行”商人一变而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买办，留在广州或涌到上海来供外国资本主义驱使，为他们在华开展殖民地贸易

服务,这就是具体的証明。

上海开埠后,买办阶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买办资本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迫使清政府把上海辟为商埠后,为了以上海为据点对中国开展殖民地贸易,一开始就在这里培植买办阶级,驅使他們为其对中国进行商业掠夺服务,并在其对华的殖民地贸易利潤中分取一点唾余殘羹作为买办服务的报酬。这部分报酬就构成最初买办资本的一部分。据说:英国资本主义势力于1842年夏季军事入侵上海时,即从定海带了一个名叫穆炳元的人来上海充当买办。此人到达上海后,即在外国商人“冒险家”的培植和驅使下,經常居間于上海的进出口贸易,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商业掠夺服务;在他一人忙得无法兼顾时,甚至培养和介紹学徒出任外国商人的买办。<sup>①</sup>上海开埠初期出现的买办,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但其中大多数是原先在广东同外商发生过经济关系的“十三行”商人及其他居間商人。他們一到上海即致力于替外商服务,并因而发财致富。据19世纪50年代的記載:“沪地百貨闡集,中外貿易,惟凭通事一言;事皆粵人为之,頃刻間,千金赤手可致。”<sup>②</sup>有的买办在发财致富后甚至挤入了当时的官僚統治阶级,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干着买办勾当,更忠順地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利益服务。1854年前后出任上海道台的吳健彰,原来就是广州“十三行”商人,后来又回到上海来充当旗昌洋行的买办。他在上海道台任內,不

---

① 姚公鶴:《上海閑話》,卷上,商务印书館1917年版,第28、80、81頁。

② 王韜:《瀛壖杂志》,卷一。



仅經常“与本管之洋行商伙，往来酬酢，不知引嫌”<sup>①</sup>，而且曾借助外国侵略势力镇压小刀会起义。上海开埠后，外国商人“冒险家”除大量引用原先的广州“十三行”商人或其他居間商人充当买办外，还积极在本地培植新的买办为他們进行商业掠夺服务。“道光以后，湖絲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銷售。南潯七里所产之絲尤著名。出产既富，經商上海者乃日众。与洋商交易，通語言者，謂之通事；在洋行服务者，謂之买办。鎮之人业此，因而起家者亦正不少。”<sup>②</sup>又据記載：19世紀60年代，上海有一个錢庄跑街黄槐庭被汇丰銀行物色去做第一任买办，几年之間，即因而弄到了数十万錢財。<sup>③</sup>

买办資本的形成和买办階級的出現，对中国社会經濟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第一，买办資本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多方为外国資本主义在中国进行殖民地貿易掠夺服务，这就使中国劳动人民創造的財富大都經由买办階級之手化作殖民地貿易利潤流入了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的腰包。第二，买办資本和买办階級在其日常活动中，日益加速了中国社会經濟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社会經濟愈来愈深地卷入了世界資本主义的經濟体系，从而日益失去独立性，变成外国資本主义經濟的附庸。第三，买办資本和买办階級从形成之日起，就协同外国資本主义压制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撓中国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使中国社会經濟陷于

① 夏燮：《中西紀事》，卷一一，五口衅端。

② 周庆云：《南潯志》，卷二三。

③ 姚公鶴：《上海閑話》，卷上，商务印书館1917年版，第82—84頁。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状态。上海开埠后，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地贸易的首要据点，也是买办资本和买办阶级的活动中心。因此，买办资本和买办阶级对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在上海也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最为明显。买办资本在上海一出现，就利用上海同国内各地日益密切的商业关系，通过各种商业渠道，同中国旧有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商品流通中为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进行殖民地贸易服务。外国资本主义也就以上海为据点，利用买办资本及与之相结合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愈来愈深入地侵入中国内地，剥削广大中国人民。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sup>①</sup>上海开埠后的情况正符合于毛主席的这一论断和分析。外国资本主义正是以上海为据点，利用买办资本和商业高利贷资本，从这里向中国内地伸展出千百条吸血管，编成一个愈来愈严密的剥削网，不断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汗的。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开展掠夺性的殖民地贸易时，除需要豢养可供驱使的买办资本和买办阶级外，还要竭力取得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支持。同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也要依赖外国资本主义的帮助来保持和加强对农民的剥削。这就引起了中国封建地主阶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23页。

級同外国資本主义在經濟上的勾結。在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剛剛兴起的国家，封建地主經濟的存在，往往阻碍着商品生产的发展，阻碍着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阻碍着商品市場和劳动力市場的形成，而这一切却是資產階級所朝夕热心追求的；所以，那里的資產階級同封建地主階級还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即資產階級往往力图克服封建地主經濟的障碍来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和确立自己的統治地位。但是，当資產階級把侵略势力伸展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去时，情况却不是这样。他們为了統治和榨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仅不排斥当地的封建地主經濟，而且自始至終致力于保持当地的封建剝削制度并使之永久化，从而使当地的封建地主階級变成他們統治和剝削当地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柱。因为，封建地主階級大都在当地农村占有統治地位，他們同旧式商业資本一道把持着农村的初級市場。外国資本主义同他們勾結起来，并利用他們，就不仅有利于在当地农村推銷工业品，而且便于在当地农村搜购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从而于买办資本之外，又自另一个方面取得了封建地主經濟的支持，对当地农民进行殘酷的商业掠夺。这就是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竭力保持当地的封建地主經濟并同当地的封建地主階級勾結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海开埠后，长江下游江南地区首当外国資本主义对中国进行商业侵略之冲。所以，这些地区封建地主經濟同外国資本主义的勾結为时也比全国其他地区較早。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在上海开埠后不久，即采取种种手段首先同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封建地主經濟接上关系，并通过买办的中介，同这

些地方的封建地主階級勾結在一起，利用其在农村的統治地位及對农村初級市場的把持，替他們推銷工業品及搜購農副產品和工業原料。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以清王朝為代表的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為了求取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協助他們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又在政治上同外國資本主義直接勾結起來，從而由經濟上的勾結發展到政治上的合流。這就進一步便利了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進行殖民地貿易掠奪。

中國封建地主階級一開始就在經濟上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勾結起來，後來又發展到在政治上同他們合流，這不是沒有原因的。首先，封建地主階級通過這類活動，可以更多地占有農民創造的剩餘產品，即除直接收取地租以外，還可以同買辦一樣，在外國資本主義對華的殖民地貿易利潤中分取一點唾餘殘羹，從而間接加重對農民的剝削。上海開埠初期，江南地區就曾有許多封建地主通過參與這類活動而積累起了巨額的財富。據記載：19世紀60年代，由於開設在上海的洋行需要在江南地區大量採購生絲，吳興的封建地主就群起協助，“以低價向農民購絲，……售之于上海之洋行。一轉手間，巨富可以立致。……於是小富一躍而為中富，中富一躍而為巨富，一時崛起者甚眾。”<sup>①</sup>其次，中國封建地主階級通過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勾結和合流，還可以取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在政治上的支持，便於鎮壓農民的反抗，從而鞏固自己的地位，使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得以在外力的支撐下維持下去。太平天國革命期間，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在上海大

---

<sup>①</sup> 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吳興農村經濟》，第122頁。

量收容和庇護江南地區的封建地主，并幫同清朝封建政府鎮壓和絞殺中國人民的革命，這些就是眾所周知的具體證明。

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在經濟上的勾結和政治上的合流，也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了惡劣的影響和嚴重的後果。第一，使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在買辦之外，又得到了一個對中國擴展殖民地貿易的有力助手，從而加重了對中國的經濟掠奪。第二，有些封建地主同外國資本主義勾結起來，為其擴展殖民地貿易以後，就具備了封建地主兼買辦的身分；這樣一來，他們一方面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和買辦階級一道把中國農村經濟日益推上半殖民地的軌道，另一方面又保持和加強了對農民的封建剝削，從而使中國農村仍然停留在落后的封建狀態。第三，外國資本主義同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互相勾結和互相支持，給中國農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即一方面除了要承受原有的封建剝削外，還遭到了新的殖民地貿易的掠奪，另一方面在進行反抗和鬥爭時又經常要受到他們相互勾結起來的聯合鎮壓。第四，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竭力保持封建制度，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封建地主經濟的存在一方面妨害了國內商品市場的擴大，另一方面又阻礙了勞動力市場的形成；這就使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難以成長，即使成長起來，也多方受到束縛、壓抑和摧殘。因此，殘酷的封建剝削關係一直被保留下來，使中國社會經濟長期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狀態。

### 第三節 外資企業的出現和中國無產階級的產生

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進行的貿易是資本主

义工业国对经济落后的农业国的贸易，是不平等的殖民地贸易，是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而不利于中国的贸易。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开展这种不平等的殖民地贸易，一开始就攫取了巨额的殖民地贸易利润。这种巨额的殖民地贸易利润，大部分由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弄回其资本主义母国，在那里转化为剥削工人的资本，但也有一小部分留在中国，化作他们在华企业的投资，即把对中国人民的剥削由殖民地贸易的剥削扩展至近代产业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上海开埠后不久的19世纪40—50年代，即有一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分子先后在上海投资设立了最早一批外资企业——船舶修造工厂、打包和加工工厂、银行、轮船公司。他们设立这批企业的原始资本大都是来自对华的殖民地贸易利润。他们设立这批企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便利和更有效地对中国进行商业掠夺。这就是说，这批外资企业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以上海为据点对中国扩展殖民地贸易所引起的。

上海最早出现的外商经营的资本主义企业是船舶修造厂。早在上海开埠不久的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之初，即有外商在黄浦江沿岸设立小型的修船厂，修理在上海进口和出口的外国轮船。据不完全统计：那一时期，外商在中国开设的船舶修造厂共有9家；其中，除柯拜船塢(Couper Dock)和厦門船厂(Amoy Dock Co.)分别开设于广州和厦門外，其余7家都设在上海。外商船舶修造厂较为集中地出现在上海，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以此为据点对中国开展和扩大商品输出与原料掠夺，从而使外国船舶进出口频繁的结果。

因为，許多外国船舶在进口后或出口前都要在上海檢修。外国船舶的頻繁进口和出口，使得某些外国商人“冒險家”开始設法在这方面謀利。于是，外商經營的船舶修造工业就应运而生。

稍后于船舶修造厂出現的外商經營的工业是打包工业和加工工业。这两类工业更是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以上海为据点对中国开展原料掠夺而直接引起的。前面讲过，在19世紀40—50年代，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不仅不断把大量工业品經由上海运到中国各地来銷售，而且經由上海源源搜购中国的絲、茶和其他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料出口。絲、茶等貨物出口的数量是很大的。这些貨物在出口前必須經過妥善的包装。于是，打包工业就应这种需要而出現了。1860年，英国商人在上海開設了隆茂洋行(Mackenzie & Co., Ltd.)，备有水压打包机，专营打包业务。根据現有資料看来，这是一家在上海也在全中国出現最早的外商經營的打包工場。至于加工工厂，这一时期，主要是为絲的加工而設。长江下游出产的絲虽然很早以来就暢銷于国内外市場并享有盛誉，但由于它是由旧式家庭手工业所織造，在质量上还存在一些缺点，如条紋不均、色澤不淨、不大适宜于机器織綢等等。因此，外商自从开始搜购生絲以后，即打算在上海設厂加工，以便提高质量后再轉运出口。外商在上海開設的第一家加工工厂是1861年建立起来的名为紡絲局(Silk Reeling Establishment)的繅絲厂。此后，还有一些类似的加工工厂陸續開設起来。

在19世紀40—50年代，与若干外資船舶修造工业和加工工业企业兴办的同时，上海还先后出現了最早几家由外国



侵华分子用来加强对中国进行商业掠夺的外资银行。上海出现的第一家外资银行，是1848年建立的英商东方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的分行。东方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后的第八年，即1854年，另一家英商银行——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h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也开始在上海设立了分行。1857年11月，另一家长期左右上海以至整个中国金融市场并因而大量吸吮中国人民膏血的外商银行在上海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英商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上海分行。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是外国资本在上海开设最早、历史最久而资本也最强的银行之一。它的业务活动仅次于后来崛起的汇丰银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长期大量吸吮中国人民膏血的汇丰银行上海分行设立于1865年。这家外资银行最初系由英商怡和洋行、仁记洋行、美商旗昌洋行等同德国及波斯商人合资设立。<sup>①</sup>从19世纪60年代起，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就上下其手地操纵着中国的财政和金融，在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上长期对中国人民进行巧取豪夺。这些外国银行兴办的最初目的也是要为外国资本主义加强和扩大对中国的商业掠夺服务。这种情况，只要分析一下上述几家银行初创时的性质，就可一目了然。东方银行上海分行经营的业务是商业性的兑换、汇划和存款，这说明它是商业性质很浓的银行。麦加利银行设立的宗旨是要便利英国商人在印度、澳洲、中国等地经营贸易，其业务也以商业性的

---

<sup>①</sup> 《上海研究资料》，第273页，中华书局1936年发行。



存款、放款及汇兌为主，所以，就其性质看来，是純粹的商业銀行。其他如有利銀行，情况也大致与此相似。至于汇丰銀行，則一开始就以协助外国商人对中国进行商业掠夺为目的，其主要业务为商业汇兌及存放款。①“它(引者按：指汇丰銀行)在1880年，就十分确定地赢得了在中国貿易中发号施令的地位。英国很多商行同它有利益关系。同所有的海外銀行一样，人們譴責它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貿易。但是，对它主要的批評是它掌管了中国海关收入的特权，并且往往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收入。这是造成它压倒一切財政势力的重要原因，使它成了英格兰銀行的强大支柱。”②这几家外国銀行的設立，对当时外国在华商人(特别是在上海的英商)來說，是十分适合需要的。因为，上海开埠后，以英国为主的外国商人就不断經由上海把大量商品运到中国市場上来銷售，同时又以上海为据点搜购大量的中国絲、茶源源运銷欧洲。不仅如此，他們还經常先把本国出产的紡織品运入印度銷售，继而从印度換得大量鴉片轉銷中国，然后再在中国搜购絲、茶而去。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在进行这种获利甚厚的掠夺性的“双边”和“三角”貿易时，經常需要大宗款項的汇划；以調剂銷資金的多寡。上海开埠初期出現的几家外国銀行就是应外国商人的这类需要而開設的。以麦加利銀行上海分行的情况为例：上海开埠初期，在中国进口或出口的絕大部分貨物

---

① 郭孝先：《上海的外国銀行》，見《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二年，第二期，第550頁。

② 季南：《1880—1885年間英国在华的外交》，1939年英文版，第269頁；譯文轉引自牟安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頁。

系由大英輪船公司(P. & O. Steam Navigation Co.)所載運和經營。大英輪船公司在載運和經營大量貨物時，需要有銀行在資金方面不斷進行支持和調劑，因此，麥加利銀行上海分行就在它的密切聯系和合作下開設了起來。東方、有利、麥加利和匯豐等銀行的上海分行先後開辦起來以後，也確實便利了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對中國進行商業掠奪。正是由於它們不斷在金融方面進行了調劑和支持，外國商品才能經由上海愈來愈廣地滲入到中國廣大內地市場，外國侵略分子也才能愈來愈多地以上海為據點搜購中國的絲、茶和其他農副產品而去。這就為外國侵略分子帶來了更大的利潤。同時，外國銀行在為商業掠奪服務的過程中也迅速壯大了自己。由於外國銀行一開始就擁有較雄厚的資本而且有種種經濟和政治特權可資庇護，所以，它們一出現很快就取得了對在上海的舊式中國錢莊的優勢並使之淪於附屬地位。加以，當時對外貿易在一天天地擴大，中國經濟在愈來愈深地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而經由上海進口或出口的貨物在金融上的划撥清算幾乎全都須由當時的外國銀行經手，因此，這几家外國銀行的建立又為此後外國銀行操縱和控制中國的財政和金融打下了基礎。

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為了替對華的殖民地貿易創造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還在上海等地投資設立了一些輪船公司。1861年，美商在上海建立了旗昌輪船公司(Shanghai 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1863年，英商的會德豐輪船公司(Wheelock & Co.)和上海拖駁公司(Shanghai Tug & Lighter Co.)跟着在上海開辦。1866年，德商也在上海創立美最時洋行(Melchers & Co.)，經營海運業務。太古洋行

(Butterfield, Swire & Co.)的輪船公司接着于1867年开办于上海。外商以上海为基地在中国經營的交通航运事业是发展迅速的。在1865至1894年的30年中,其商船吨数增加了三倍以上。其中有70—80%是航行于中国沿海各口岸及内河的。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以上海为基地在中国投資設立交通航运事业說明:他們除經營对华貿易外,还同时經營在华貿易,即由經營对中国的进出口貿易发展到了經營中国的国内貿易;他們的对华投資也从工业和金融業領域扩展到了商业和交通航运業領域,即由对华工业投資发展至对华商业投資了。

我們所以說上海开埠后最早一批外資創办的船舶修造厂、打包厂、加工厂、銀行和輪船公司是在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对华进行商业掠夺的影响下先后产生的,除去上述原因,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这些外資企业大都是由外国商人創办的,而且其原始資本一般都是从对中国进行殖民地貿易所获的利潤轉化而来。这种情况,只要略作分析就不难明白。上海一开埠,英商怡和洋行就開設了起来。这家对中国以进行掠夺性的殖民地貿易著称的英国商行,从開設之初起,即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去了大量錢財。这些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去的大量錢財,大部分被侵略分子运回本国,其中也有一部分用来在中国投資于进一步剝削中国人民的其他企业。1861年創办的那家外資加工厂——紡絲局,就是怡和洋行商人用极小一部分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去的錢建立起来的。汇丰銀行上海分行的初創資本,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怡和洋行对华經營殖民地貿易的利潤。其他在沪外資企业創辦人的身分及其初創資本的来源,也大都同这差不多。

外資經營的船舶修造工業、打包工業、加工工業、銀行和輪船公司是應外國資本主義在華擴展殖民地貿易的需要而發生和發展起來的。但是，當這些外資企業發生和發展起來以後，它們又反過來促進了外國資本主義對華殖民地貿易的進一步擴展。因為，船舶修造工業和輪船公司的興起，為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進一步擴展殖民地貿易提供了更好的運輸條件。打包工業和加工工業的發生和發展更有利於它們搜購中國的農副產品和工業原料出口。銀行的設立又使它們得以在擴展對華殖民地貿易時更好地調度和運用資金。

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投資設立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的惡劣影響和後果，不僅表現在有利於它們進一步擴展對中國的殖民地貿易，更嚴重的是它們借此在中國開始建立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即把對中國人民的剝削由商品流通領域擴展到了生產領域。這就是說，由於外資企業的設立，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僅繼續在商品流通領域內把中國人民當作商品的購買者和出售者來剝削，而且進入到生產領域中把中國人民當作勞動力的出賣者來加以榨取。同時，外資企業的設立還壓制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生和發展，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緩慢，長期停滯不前。正如毛主席所明確指出的：“帝國主義列強還在中國經營了許多輕工業和重工業的企業，以便直接利用中國的原料和廉價的勞動力，並以此對中國的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經濟壓迫，直接地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sup>①</sup>

---

<sup>①</sup>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23頁。

外資企业的出現使中国社会产生了最早一批无产階級。因为,外国資本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商业侵略的过程中,原已加速了中国自然經濟的解体,破坏了中国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使大量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同生产資料分离,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从而給資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場,也为中国无产階級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外資企业的設立又使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成了中国廉价劳动力最早的购买者,这就导致了中国无产階級的产生。正如毛主席所明确論証的:“中国无产階級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資产階級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經營企业而来。”<sup>①</sup>中国自然經濟的加速解体是外国資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地貿易掠夺的結果。最早一批外資企业在中国的設立又同外国資本主义加强对中国的商业掠夺有关。所以,可以說,中国无产階級的产生是外国資本主义对中国扩展殖民地貿易的間接后果之一。

中国境内的外資企业,大都是最先在上海、广州、宁波、厦門等港口設立起来的,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上海。所以,这一历史条件决定:上海是中国无产階級的主要誕生地。

上海开埠初期的二、三十年間,最早一批中国产业工人在上海出現的情况,到現在为止,虽然能够搜集到的資料还极其有限,但从已有的一些材料中也大致可以看出其梗概。据記載:19世紀60—70年代之初,即上海开埠最初的二十余年內,上海“沿江数里皆船厂、貨棧、輪舟碼頭、洋商住宅,粵东、宁波

<sup>①</sup> 《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21頁。

人在此計工度日者甚众。”<sup>①</sup>从这段記載中可以推知，在这以前的50年代內，上海一定已經出現了不少出卖劳动力給外国資本主义企业的无产者。又据記載：1870年，单在“公共租界”內受雇于外資工厂、洋行及外人住宅的中国劳动者即达4,908人。<sup>②</sup>其中大部分是产业工人。此后，随着外資企业的扩大和增多，随着中国小生产者的进一步破产和被雇于外資企业，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又不断增加。旗昌絲厂(Kee Chong Silk Filature)在1878年初創时即雇用了中国工人1,100余人，祥生船厂(Boyd & Co.) 1879年拥有的中国工人已达1,000—1,400人，1882年在英商公平絲厂(Iveson & Co.)做工的中国工人也有数百之多，同年怡和絲厂(Ewo Silk Filature)一开办即雇用了中国工人1,100人。<sup>③</sup>这还是仅指那些为外国資本主义进行商业掠夺服务的船舶修造厂、打包厂和加工厂的情况而言，而且数字也极不完全，倘若把当时受雇于其他外資企业(包括一般輕工业工厂和无記錄可考的工厂)的中国工人統統并在一起加以計算，則当时在上海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一定还要多得多。

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为中国历史的新紀元揭开了序幕。这对中国人民說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也必須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是中国人民蒙受深重灾难的过程。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原来就是成千成万小生产者农民

① 葛元煦：《沪游杂記》，卷一，租界。

② 上海市文献委员会1948年編印：《上海人口志略》，第20頁。

③ 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資本在中国經營的近代工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4—79頁。



和手工业者被迫丧失仅有的一点生产资料从而淪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的結果。他們被迫同生产资料分离以后，为了維持生活，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給在中国最早設立的資本主义企业——外資企业。中国无产阶级受雇于外資企业以后，他們又从一个痛苦的深渊掉进了另一个痛苦的深渊。如果說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原先是在商品流通領域中被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所剝夺；那末，在他們因被剝夺而变成了一无所有而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产业无产阶级以后，又进而在生产領域中遭到了外国資本的直接榨取。这表明外国資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剝削进一步加重了。上海开埠后，外国資本主义企业对中国工人的压榨一开始就是十分殘酷的。外国資本家不仅强迫中国工人每天做 12、14 甚至 16 小时以上的繁重工作，給予菲薄得无以維持生活的报酬，而且即連这点工資也經常遭到拖欠和尅扣。同时，外国資本家还經常鞭打和监禁中国工人，給予非人的待遇。不仅如此，由于外資企业毫无安全和保护設備可言，中国工人經常有人在劳动中发生伤亡事故。但是，外国資本家却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殘酷榨取中国工人，积累了更多的財富。

外資企业在中国的設立，一方面固然加重了对中国人民的剝削和掠夺，但另一方面也同时开始創造出了它們的反面；即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壮大，由于他們登上了革命的历史舞台，外国資本主义在华企业灭亡的命运也就被注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往后在艰苦的和漫长的年月里，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經過反复不断的英勇奋斗，終于同全国人民一道，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



統治，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逐出了中国。

#### 第四节 中国資本主义的兴起

鴉片战争以后，外国資本主义对中国进行以扩展殖民地貿易为中心的經濟侵略，还在客观上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資本主义的兴起。

在鴉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由于商品經濟的发展，早在外国資本主义势力侵入以前，即已孕育了資本主义的萌芽，就是沒有任何外来的影响，中国也将緩慢地发展到資本主义社会。外国資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經濟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劳动力市場和商品市場。这就在客观上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資本主义的兴起。

鴉片战争以后，外国資本主义对中国进行以扩展殖民地貿易为中心的經濟侵略，其所以会在客观上刺激和促进中国資本主义的兴起，这是因为它們的这类經濟侵略活动在客观上为中国資本主义的兴起創造了某些条件和可能。前面已經讲过，鴉片战争后，外国資本主义对中国进行以扩展殖民地貿易为中心的經濟侵略，对于中国社会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即一方面加速了中国自然經濟的破坏，另一方面又同时加快了城乡商品經濟的发展。自然經濟的加速破坏，首先造成了大量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使他們被强制同生产資料分离，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因而只能靠自由出卖劳动力为生。大批无产者出現以后，一部分很快就受雇于新兴的外資企业，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尚处于待雇佣的状态。这

就为中国資本主义的兴起准备劳动力的条件。其次，自然經濟的加速破坏和商品經濟的加速发展又促使了国内市場的逐漸形成和逐漸扩大。国内市場的形成和扩大，使得中国資本主义生产的产品有可能在外国商品傾銷的隙縫中取得一定的銷路。这又为中国資本主义的兴起准备了一定範圍的产品銷售的市場条件。此外，鴉片战争以后，买办階級在为外国資本主义对华扩展殖民地貿易服务的过程中已积累了一定數額的貨幣財富，而地主、官僚、商人、高利貸者手中的貨幣財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要寻找新的出路；正在这时，他們看到外資企业建立起来以后大都获利优厚，因此有一部分人也想把自己手中的錢財投資于經營近代新式的資本主义企业。这就为一部分买办資本、商业資本、高利貸資本以及地主、官僚的財富轉化为近代产业資本創造了可能性，亦即为中国資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資金方面的条件。劳动力、市場和資金等方面的条件既已具备，中国資本主义就在19世紀60—70年代开始兴起。

上海自开埠后就是外国資本主义对中国扩展殖民地貿易的活动中心。其附近的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自然經濟破坏得較早和較为彻底，而商品經濟也发展得較为迅速。因此，資本主义生产賴以发生的諸前提条件，如劳动力、市場和資金等等，在这里很快就逐漸形成了。这就导致了19世紀60—70年代上海地区近代資本主义企业的兴起。

上海地区兴起的中国資本主义企业，首先是清政府經營的近代工业。1862年，李鴻章代表清政府在上海創設了上海洋炮局。1865年，曾國藩和李鴻章又以上海洋炮局为基础，

建立了江南制造局。这些企业虽然初創时进行的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資本来自清政府的国庫，而不完全是本企业内工人直接創造的剩余价值的积累，但由于它們体现了資本对自由劳动的雇佣和剝削，多少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資本是靠直接剝削本企业工人的剩余价值积累起来的，同时后来也有一部分生产物因銷售于市場而带有商品性质，所以，經過一个时期的发展后仍应看成是資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中国民族資本主义也是在外国資本主义不断对中国加重商业侵略的过程中引起的。中国民族資本主义兴起的時間稍晚于清政府經營企业兴起的時間。上海是中国民族資本最早兴起的地区之一。从現有資料看来，上海在19世紀60年代就有民族資本主义企业創立。至70年代，民族資本在上海開設的企业便逐渐增多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从1874至1879年，先后有建昌鋼鐵机器厂、高記木厂、上海机器織布局等几家民族資本企业創辦和筹設。80年代，民族資本在上海開設的企业更年有增多。計：1881年有公和永繅絲厂和合昌机器厂設立，1882年有同文书局、上海玻璃制造厂、裕泰恒火輪面局和均昌机器船厂开办。从上述极不完全的資料看来，1863至1883年的20年間，民族資本在上海開設的而又有名可查的近代工业企业共有11家。至1894年又增办了34家。至此民族資本在上海經營的近代工业已初具規模，共包括有碾米、木材加工、棉紡織、船舶修理、繅絲、玻璃、火柴、制药、造紙等重要行业。与此同时，上海还兴起了最早一批經營五金、西药和洋杂货等的民族資本商业企业。由于民族資本的兴起，这时上海

还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家；后来，他们又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上海最初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也有一些是适应对外贸易扩大的需要和因对外贸易的扩大而设立起来的。船舶修造厂的设立就同修理进出口商船有关。公和永等缫丝厂的生产任务有很大一部分是为生丝的出口加工。五金、西药、洋货商店大都是为经营进口外国货而设立起来的。这就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在上海对中国进行进出口贸易，不仅在劳动力、商品市场和资金等方面在客观上为这里的民族资本兴起创造了条件，而且在产销业务上直接起了某些程度的促进作用。

上海开埠后最早出现的一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虽然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不断加重侵略的过程中引起的，但是，必须指出，它们从兴起之日起就遭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束缚、压迫和打击。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sup>①</sup>这就决定，它们的商业入侵虽然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当中国民族资本一出现，它们就多方进行压迫和打击，力图加以扼杀，排除了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使它始终不曾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外国资本主义的商业侵略，既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当它兴起以后，又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622页。

在主观上对它进行了凶恶的压迫和打击。

### 第五节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及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的以殖民地贸易为中心的經濟侵略所造成的严重的影响和后果，归根到底，是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被剥夺、被压榨和被奴役。这就形成和加深了中国社会內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前是封建社会。那时，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經濟剥削和政治压迫，因而社会主要矛盾是广大农民同封建地主阶级之間的矛盾。此外，由于商人和高利贷者也在商品和货币关系中直接或間接剥削农民，农民同商人和高利贷者之間的矛盾也很尖锐。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內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矛盾。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由于它們对广大中国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掠夺和压迫，这就在中国人民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之間开始形成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其次，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后，經常驅使一批为它們所豢养的买办参与对中国劳动群众的剥削，这又形成了劳动群众同买办阶级之間的矛盾。此外，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广大人民同官僚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以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也出現了。这些都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內出現的新矛盾。至于那在封建时代內长期存在着的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間的矛盾，

在外国資本主义势力入侵以后，不仅沒有消失，反而是尖銳了。因为，外国資本主义势力侵入后，中国地主阶级很快就同它們勾結起来，变成了它們統治中国的支柱，同时并伙同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残酷地加强了对广大中国农民的压榨。此外，那些由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商人和高利貸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或多或少同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和买办阶级勾結起来在商品流通和货币借貸关系中加强了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剝削。这样，广大劳动群众同商人和高利貸者之間的矛盾也同时加深了。所有这一切說明：外国資本主义势力侵入后，中国社会出現了一个新旧矛盾同时交織在一起的局面。这些矛盾中，中国人民同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之間的矛盾以及人民群众同封建主义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中国人民同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之間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銳化，一开始就导致了激烈的民族解放斗争。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大都是在以民族矛盾为中心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外国資本主义对上海并通过上海对全中国进行的侵略，一开始就激起了包括上海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坚强反抗和英勇斗争。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結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sup>①</sup>上海开埠后发生的情况完滿地証实了这一真理。

上海人民对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坚强反抗和英勇斗

---

<sup>①</sup> 《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626頁。

爭精神，早在1842年夏季英國侵略者以軍事入侵打開對上海的通商大門時，即已明白地顯示出來。英國侵略軍的兵船一進犯上海的門戶——吳淞，便受到了守軍的堅決反擊，並因而遭到重創。守將陳化成自始至終統率部屬打擊英國侵略軍的窳犯，直至戰死，表現了中國人民可歌可泣的反侵略精神。<sup>①</sup>

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於1843年11月後進一步在上海強占“租界”的罪惡活動，也遭到過上海人民的強烈反對。1843年底，即上海開埠後不久，亦即大批外國商人“冒險家”湧來上海進行商業掠奪時，有一個名叫羅柏特·富琮（Robert Fortune）的英國人在上海逗留期間，即一再發現中國人深深憎恨外國商人“冒險家”和其他侵略分子，把他們稱做“鬼子”，連小孩子看見他們都大喊“鬼子來了”！<sup>②</sup> 1848年3月，三個英國侵略分子從上海“租界”到青浦去進行侵略活動，遭到了當地人民的痛打。這也顯示了中國人民的反抗和鬥爭精神。

上海開埠後的十餘年，即19世紀50年代，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以上海為據點對中國進行的商業侵略，更一度直接遭到了太平天國革命和小刀會起義的沉重打擊。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爆發於1851年。1853年，太平軍攻克南京後，即把革命勢力伸展到離上海不遠的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地區，並因而同外國資本主義侵華勢力發生了接觸。太平天國革命是一次波瀾壯闊的農民革命運動。它的矛頭不僅直接指向腐朽的以清王朝為代表的中國封建勢力，而且為了

---

① 《同治上海縣志》，卷十一，兵防，歷代兵事。

② Robert Fortune: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 Provinces of China», P. 107—108。



維護民族利益，同時英勇地抗击了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阻止它們對中國進行侵略，從而擔負了反對本國封建主義和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雙重革命任務。因此，革命政權一建立，就確定了一系列有利於革命利益和有利於爭取中國獨立自主的正確政策。實行獨立自主和自由通商的對外貿易政策，就是其經濟政策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革命政府在南京建立起來以後，一面對外國商人宣布：“准爾英酋帶爾人民自由出入，隨意進退，……或照常經營商業，悉聽其便”<sup>①</sup>；但另一方面却更嚴格地執行了獨立自主的關稅政策，堅決執行自己的稅法，嚴禁鴉片貿易，絕不懼外和媚外。任何外國商人，一違犯法令，即予制裁。有一次，英商亞丹森洋行的輪船滿載絲茧路過太平天國革命政府所設的一個稅局，不肯納稅，太平軍就把那隻船扣留起來，並在交涉時向英國外交人員提出抗議說：“太平天朝定制，商貨經過稅局，有一定的稅金，今貴國商人之行為，既違背定制，而貴國長官強為干涉，論國際交誼甚不合，特此告知。”<sup>②</sup>至於對鴉片的禁止，則明白向外國商人宣稱：“彼此通商，理所當然。將來定事，只有洋烟（引者按：即指鴉片）再勿來中國，其餘自由貿易，無所禁止。”<sup>③</sup>1853年3月，太平軍鎮守鎮江的將軍甚至向英國外交人員鄭重提出過禁止鴉片輸入的警告。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以上海為據點對中國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進行的貿易，從開始之日起，就是建立在拒

---

① 英國藍皮書中之太平天國史料——“革命軍首領致濮亨書”；此處轉引自中國史學會編《太平天國》，VI.第909頁。

② 哈喇：《太平天國外紀》，卷中，第61頁。

③ 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卷20。

絕納稅和任意走私、販毒以及其他種種特權的基礎之上的。太平天國革命政府不承認它們的特權，嚴禁鴉片，取締走私，就等於是給了它們以沉重的打擊。事實確曾如此。1853—1854年間，由於太平天國政府嚴格執行了正確的獨立自主的對外貿易政策，不僅使得盤踞在上海的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分子在進行可恥的鴉片貿易時遭到了很大的打擊，即以採購中國絲、茶為主的出口貿易也不能不因失去了特權庇護和無法走私而受到影響。據統計：從1849至1853年，生絲經由上海出口的数量一直是逐年上升的，1853年的出口数量達到了58,319包；但是，到1854年就轉而下降為54,233包，即反而跌落了7%，1855年略有回升（56,211包），然而仍未恢復到1853年的水平。<sup>①</sup>茶葉出口数量的變化情況，反映得還要清楚。從1844至1853年，經由上海出口的数量年年是上升的，1853年達到了69,431,000磅；但是，到1854年，就轉而下降到了50,344,000磅，即反比1853年減少了27.5%。<sup>②</sup>這類情況已夠清楚地證明：太平天國革命政府執行正確的獨立自主的對外貿易政策確曾打擊過外國資本主義以上海為基地對中國進行的商業掠奪。對於這類情況，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作過這樣正確而又具體的說明和分析：“在中國革命（引者按：指太平天國革命）最初的一個時期我就要讀者注意一件事情，即中國革命大概將給大不列顛的社會經濟狀況以一個致命的影響。《觀察家》雜誌現在傳出這樣的消息：‘中國人的起義，正在產茶區

---

①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413頁。

② 同上。

域里扩大起来，結果，倫敦市場上茶叶漲价，而上海市場上洋布跌价。’我們在利物浦布斯皮公司的周刊上讀到这样一段話：‘在上海，茶叶开市的时候，其价格超过去年40—50%。存貨所剩无多，而新貨却到得很慢。’……上海各市場的情况如下：‘紅茶和生絲都已暢行无阻的上市。可是卖主提出这样的条件，以至于营业大受限制，……’。”<sup>①</sup>

1853年9月至1855年2月，即当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正在英勇地进行的时候，上海本地爆发了可歌可泣的小刀会起义。小刀会起义部队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占領了上海县城，象一把尖刀一样插在盘踞着上海“租界”的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的范围旁边。小刀会起义給予盘踞在上海的清政府封建官僚及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打击，那就更为直接和更为有效。起义軍在占領上海县城期間，惩办和拘捕过清政府封建官僚，英勇抗击过外国資本主义武装力量和清政府軍队的联合进攻，同时也使得外国資本主义势力以上海为基地对中国进行的商业掠夺遭到了打击。据統計：1844—1853年，除1848和1852年外，中国經由上海輸往英国的貨值一直是上升的，1853年达到了13,300,000元；但至1854年，由于小刀会起义发生的影响，便跌落为11,700,000元，即反而下降了12.1%。<sup>②</sup>当时，在上海代表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发言的《北华捷报》，面临这种情况，也不得不慨叹道：“自上海县城为三合会（引者

① 馬克思与恩格斯：《生活昂貴》，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8—149頁。

② 馬克思：《中英条約》，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8頁。

按：指小刀会）占领以来，商业陷于停顿。又本年4月4日外国部队把官军军营逐出租界后，商业停顿状态更加严重。”<sup>①</sup>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和英勇的小刀会起义给予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以上海为基地对中国进行的商业掠夺的打击是沉重有力的。但可惜的是，中国人民发动的这两个革命斗争都因遭到了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勾结起来的残酷镇压而不幸陷于失败，中国人民消除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愿望也就因而未能在当时实现。

太平天国革命和小刀会起义虽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主义的联合镇压先后失败了，但是，上海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斗争却并未因此终止。1874和1898年，上海先后爆发了两次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无理扩张“租界”的“四明公所事件”，旅居上海的宁波籍劳动者和商人对外国侵略分子展开过不屈的斗争。1897年3月底至4月初，上海为数众多的小车工人又对窃踞在“租界”中的外国侵略势力发动过一次勇敢坚决的抗捐罢工斗争。

上海人民在开埠初期接二连三开展的反抗侵略者的斗争，虽然不完全是直接起因于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商业侵略，而带有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反对经济侵略和反对商业掠夺却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太平天国革命和小刀会起义就直接和间接沉重地打击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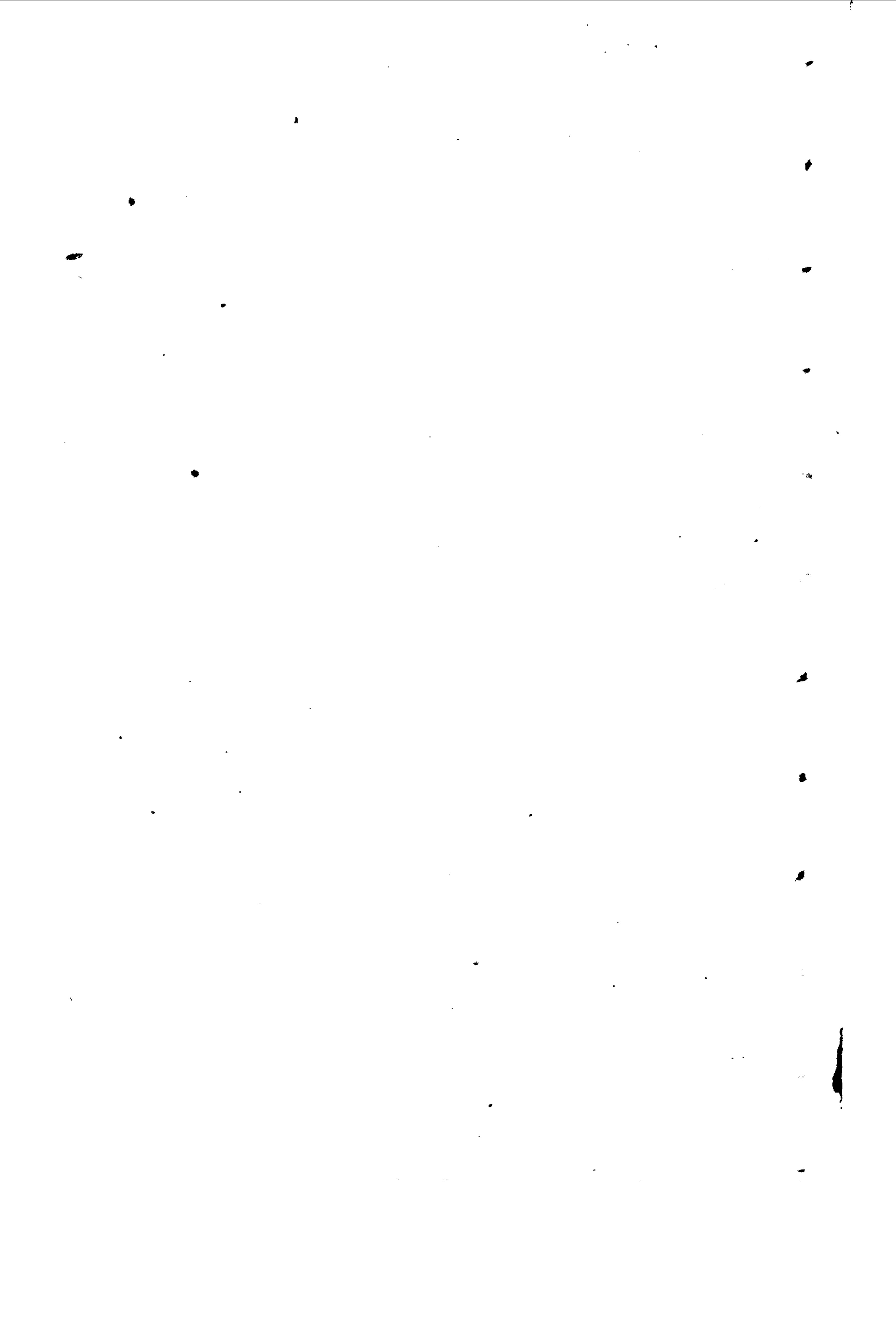
<sup>①</sup> 《北华捷报》，1854年5月6日，197期，第158页。译文转引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0—411页。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商业掠夺活动。“四明公所事件”的参加者，有破产后流入上海的宁波籍劳动人民，有在上海受到外商压迫的宁波籍商人。小車工人抗捐罢工斗争的参加者，几乎全是在外国商业侵略下陷于破产后流入上海的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所有这些人对外国侵略者发动的反抗和斗争，可以说，都是旧恨（外国商业侵略使他們破产）和新仇（外国侵略者进一步的压迫）交織在一起引起的。

上海人民反抗外国商业侵略的斗争，后来随着外国商业掠夺愈来愈深、为害愈来愈烈而日益突出起来。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起，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每次发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几乎大都是从抵制外货入手的。1905年，全国人民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这个运动就是首先在上海爆发的。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群情愤激地投入了这个运动，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些人也从切身利益出发先后参加了。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给了以美帝国主义为主的外国商业侵略以沉重的打击，一度迫使帝国主义暂时减轻了对中国市场的压力。此后，上海人民参加了1919年爆发的波澜壮阔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掀起过“抵制外货、爱用国货”的热潮，并收到了效果。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6月1日，全市有20多万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总同盟罢工，5万多学生在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影响下举行了罢课。甚至连民族资产阶级也从切身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一度跟着举行了罢市，参加了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帝国主义展开了斗争。“五卅”运动是一场坚决的反帝斗争，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了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时，由于工人、学生、其他劳动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运动中采取了抵制外货的斗争行动，因而也迫使帝国主义一度减轻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五卅”运动以后，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每次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时，几乎都曾以抵制外货作为重要手段之一，而且不断取得过胜利。1931—1932年，“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先后爆发，全国人民群情愤激，到处抵制日货，要求对日本经济绝交。1931年10月初，上海80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除派出代表要求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立即出兵抗日外，还带领全市人民展开了抵制日货的斗争。自此以后，经过抗日战争，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人民几乎无时无刻不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贪婪无耻的商业掠夺，并不断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手段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例如，1945至1949年，美国货物在上海市场上泛滥成灾，上海人民就曾在中国共产党及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推动下，展开过抵制和斗争。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全国解放，帝国主义以上海等商埠为基地对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商业掠夺，中国人民也就不屈不挠地进行了一百多年的英勇反抗和斗争。这一斗争，到1949年，由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 附 录

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统计

(1843—186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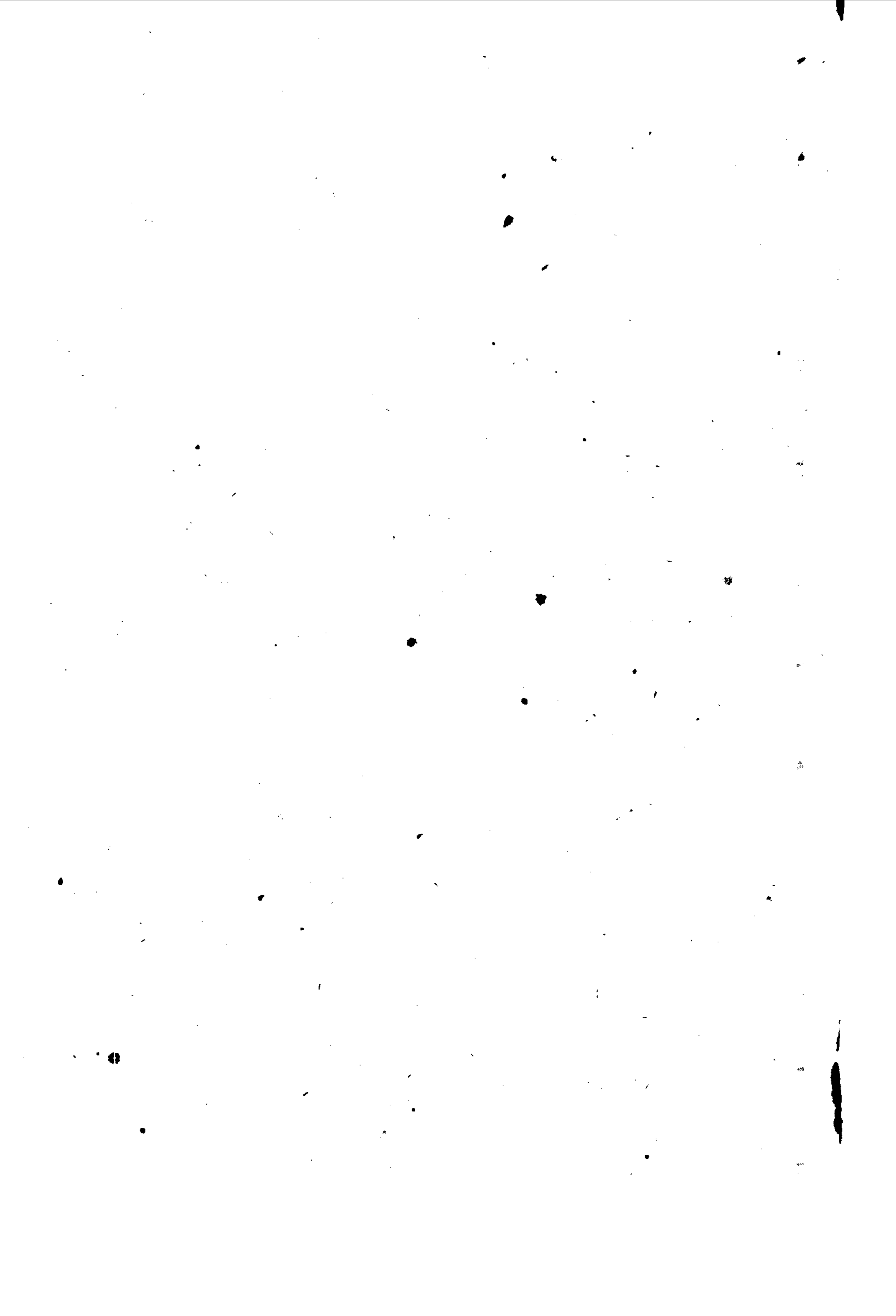


表2. 上海开埠初期进口货值中各国所占比重

(1844—1849年)

国别	1844		1845		1846		1847		1848		1849	
	货值	比重	货值	比重	货值	比重	货值	比重	货值	比重	货值	比重
英国	501,335磅	100%	1,082,207磅	88.4%	810,200磅	76.0%	898,228磅	89.0%	569,918磅	70.7%	974,302磅	80.6%
美国			93,518磅	7.7%	177,115磅	16.6%			190,384磅	23.6%	164,978磅	13.6%
西班牙			7,521磅	0.6%	8,833磅	0.8%	111,001磅	11.0%	46,193磅	5.7%	70,052磅	5.8%
其他			40,833磅	3.3%	70,024磅	6.6%						
合计	501,335磅	100%	1,224,079磅	100%	1,066,172磅	100%	1,009,229磅	100%	806,495磅	100%	1,209,332磅	100%

资料来源: ①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4»。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⑤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注 解: 1847年栏内货值111,001磅系美国、西班牙及其他国家无法分开的合计数字。

表3. 上海开埠初期出口貨值中各国所占比重

(1844—1849年)

国 别	1844		1845		1846		1847		1848		1849	
	貨 值	比 重	貨 值	比 重	貨 值	比 重	貨 值	比 重	貨 值	比 重	貨 值	比 重
英 国	487,528鎊	100%	1,259,091鎊	93.6%	1,352,530鎊	88.6%	1,401,194鎊	92.3%	1,142,987鎊	87.5%	1,438,480鎊	82.0%
美 国			59,949鎊	4.5%	156,425鎊	10.2%			155,194鎊	11.9%	299,931鎊	17.1%
西班牙			7,384鎊	0.5%					116,105鎊	7.7%		
其 他			18,226鎊	1.4%	18,005鎊	1.2%			7,434鎊	0.6%	16,245鎊	0.9%
合 計	487,528鎊	100%	1,344,650鎊	100%	1,526,960鎊	100%	1,517,299鎊	100%	1,305,615鎊	100%	1,754,656鎊	100%

資料来源：①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4»。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⑤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注 解：1847年棧內貨值116,105鎊系美国、西班牙及其他国家无法分开的合計数字。

表 4. 上海开埠初期进口英国货值及其占  
全国进口英国货总值的比重

(1844—1856年)

年 份	上 海	全 国	上海占全国
1844	501,335 鎊		
1845	1,082,207 鎊		
1846	810,200 鎊		
1847	898,228 鎊		
1848	569,918 鎊		
1849	974,302 鎊		
1850		1,574,145 鎊	
1851		2,161,268 鎊	
1852		2,503,599 鎊	
1853	1,045,000 鎊	1,749,597 鎊	59.7%
1854		1,000,716 鎊	
1855	1,122,241 鎊	1,277,944 鎊	87.8%
1856	1,679,581 鎊	2,216,123 鎊	75.8%

资料来源：① T. Roger Banister: «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 1834—81»。

② George Wingrove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③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4»。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⑤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⑥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⑦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表 5. 上海开埠初期輸往英国的貨值及其占

全国輸往英国总貨值的比重

( 1844—1856 年)

年 份	上 海	全 国	上海占全国
1844	487,528 鎊		
1845	1,259,091 鎊		
1846	1,352,530 鎊		
1847	1,401,194 鎊		
1848	1,142,987 鎊		
1849	1,438,480 鎊		
1850		5,849,025 鎊	
1851		7,971,491 鎊	
1852		7,712,771 鎊	
1853	4,337,000 鎊	8,255,615 鎊	52.5%
1854		10,588,126 鎊	
1855	6,405,040 鎊	10,664,315 鎊	60.0%
1856		10,652,195 鎊	

資料来源：① T. Roger Banister: «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 1834—81»。

②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4»。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⑤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⑥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表 6. 上海等五口輸入英國貨值的比較  
( 1844—1849 年 )

港別	1844		1845		1846		1847		1848		1849	
	貨 值	比 重	貨 值	比 重	貨 值	比 重	貨 值	比 重	貨 值	比 重	貨 值	比 重
上海	501,335 鎊	12.5%	1,082,207 鎊	30.0%	810,200 鎊	7.0%	898,228 鎊	28.2%	569,918 鎊	7.6%	974,302 鎊	9.7%
廣州	3,451,312 鎊	85.9%	2,321,692 鎊	64.4%	9,997,583 鎊	86.3%	2,085,581 鎊	65.6%	6,534,597 鎊	87.3%	7,902,244 鎊	79.0%
廈門	62,933 鎊	1.6%	147,494 鎊	4.1%	775,085 鎊	6.7%	179,725 鎊	5.7%	381,949 鎊	5.1%	1,136,428 鎊	11.3%
福州			43,981 鎊	1.2%								
寧波			10,398 鎊	0.3%			11,785 鎊	0.5%				
合計	4,015,580 鎊	100%	3,605,772 鎊	100%	11,582,868 鎊	100%	3,175,319 鎊	100%	7,486,464 鎊	100%	10,012,974 鎊	100%

資料來源：①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4»。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⑤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表7. 上海等五口輸往英國貨值的比較

(1844—1849年)

港別	1844		1845		1846		1847		1848		1849	
	貨值	比重	貨值	比重	貨值	比重	貨值	比重	貨值	比重	貨值	比重
上海	487,528鎊	11.1%	1,259,091鎊	21.6%	1,352,530鎊	8.1%	1,401,194鎊	29.09%	1,142,987鎊	23.5%	1,438,480鎊	10.95%
廣州	3,883,828鎊	88.7%	4,492,370鎊	77.1%	15,378,560鎊	91.7%	3,406,420鎊	70.74%	3,653,033鎊	75.1%	11,485,935鎊	87.45%
廈門	8,819鎊	0.2%	15,478鎊	0.3%	38,938鎊	0.2%	7,138鎊	0.15%	67,467鎊	1.4%	209,066鎊	1.60%
福州			40,293鎊	0.7%								
寧波			17,495鎊	0.3%			622鎊	0.02%				
合計	4,380,175鎊	100%	5,824,727鎊	100%	16,770,028鎊	100%	4,815,374鎊	100%	4,863,487鎊	100%	13,133,481鎊	100%

資料來源：①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4»。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⑤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表 8. 上海、福州和广州等 11 个港口  
进口和出口貨值的比較

( 1863 年)

港別	进 口			出 口	进出口总值
	进口貨值	复出口貨值	进口淨值	出口貨值	
上海	97,287,753两	35,583,654两	61,704,099两	38,485,465两	100,189,564两
福州	2,616,637鎊	71,252鎊	2,545,385鎊	4,521,203鎊	7,066,588鎊
广州	2,281,354鎊	97,028鎊	2,184,326鎊	3,862,039鎊	6,046,365鎊
宁波	3,348,601鎊	45,765鎊	3,302,836鎊	1,454,569鎊	4,757,405鎊
厦門	2,046,033鎊	92,936鎊	1,953,097鎊	994,129鎊	2,947,226鎊
汕头	1,526,404鎊			694,807鎊	2,221,211鎊
天津	2,205,739鎊	113,997鎊	2,091,742鎊	304,405鎊	2,396,147鎊
烟台	759,178鎊	26,292鎊	732,886鎊	498,932鎊	1,231,818鎊
汉口	3,308,772鎊	65,740鎊	3,243,032鎊	4,247,302鎊	7,490,334鎊
九江	1,061,788鎊	42,599鎊	1,019,189鎊	2,436,780鎊	3,455,969鎊
鎮江	1,522,603鎊			230,276鎊	1,752,879鎊

資料来源: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注 解: 进口貨值不包括鴉片。

表 9. 上海出口貨值占全国出口貨总值的比重

( 1846、1851、1861 年)

1846	16%
1851	50%
1861	50%

資料来源: ①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② 西·甫·里默: «中国对外贸易»。

## 二、进口和出口商品数量的统计

表 10. 上海进口主要外国货物的品种、数量和价值

(1845—1863 年)

年份	灰 布		白 布		棉 紗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5	992,178 匹	638,800 磅	367,436 匹	264,820 磅	770 担
1846	1,143,934 匹	595,796 磅	322,017 匹	173,127 磅		
1847	963,158 匹	521,681 磅	221,122 匹	127,366 磅		
1848	518,754 匹	297,231 磅	206,977 匹	128,685 磅	2,056 担	13,606 磅
1849	871,498 匹	425,051 磅	346,384 匹	197,677 磅	1,576 担	12,246 磅
1863					81 担	664 两

资料来源: ①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⑤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注 解: ① 1 匹 = 6 丈。  
 ② 1 丈 = 4 碼。  
 ③ 1 两 = 0.35 磅。  
 ④ 毛毯的計量单位, 原材料中作“pair”, 現譯为“对”。

上海进口主要外国货物的品种、数量和价值(續一)

(1845—1863年)

年份	斜纹布		染色布		麻布		印花布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5	23,722 匹	15,343 磅			940 匹	678 磅	29,236 匹	20,474 磅
1846				19,380 磅			16,179 匹	10,110 磅
1847							24,345 匹	15,708 磅
1848					1,675 匹	1,350 磅	24,114 匹	13,847 磅
1849							13,760 匹	8,355 磅
1863							81,220 匹	203,050 两

上海进口主要外国货物的品种、数量和价值(續二)

( 1845—1863 年)

年份	闊幅絨布		粗嗶嘰		羽毛紗		毛毯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5	331,112 碼	143,738 鎊	8,028 匹	13,994 鎊	4,726 匹	23,343 鎊	972 对	640 鎊
1846	94,599 丈	114,126 鎊	85,549 丈	22,124 鎊	61,224 丈	18,296 鎊	1,298 对	997 鎊
1847	161,947 丈	132,186 鎊	81,793 丈	22,047 鎊	101,369 丈	30,765 鎊	500 对	416 鎊
1848	72,401 丈	64,696 鎊	63,152 丈	17,315 鎊	41,431 丈	16,084 鎊		
1849			5,776 匹	41,987 鎊	5,429 匹	24,410 鎊		
1863	2,724 匹	122,944 兩	103,705 匹	725,935 兩	82,077 匹	1,342,149 兩	20,538 对	61,614 兩

上海进口主要外国货物的品种、数量和价值(續三)

(1845—1863年)

年份	鐵		器		馬口鐵		鉛		手帕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5	13,553担	6,691鎊	291担	1,091鎊	1,979担	1,598鎊	7,560打	2,300鎊		
1846	3,995担	525鎊			3,412担	4,243鎊	22,343打	4,653鎊		
1847	2,659担	2,190鎊	87担	254鎊	85担	115鎊	52,258打	10,885鎊		
1848	7,709担	2,876鎊	2,744担	9,937鎊	6,002担	5,186鎊	9,456打	2,127鎊		
1849	3,918担	2,595鎊	314担	1,248鎊	2,800担	3,654鎊	8,668打	1,914鎊		
1863	123,707担	335,063两			108,049担	654,591两	68,628打	58,333两		

上海进口主要外国货物的品种、数量和价值(續四)

(1845—1863年)

年份	手織布		玻璃器皿		木		酒		类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5	8,930 匹	5,581 鎊		1,590 鎊	32,709 担	19,714 鎊			1,701 鎊
1846	11,820 匹	5,910 鎊		1,291 鎊	17,493 担	23,927 鎊			3,879 鎊
1847				5,022 鎊	15,711 担	21,694 鎊			
1848	36,760 匹	16,591 鎊		1,600 鎊	25,192 担	31,582 鎊			
1849	67,037 匹	31,156 鎊	1,578 箱	2,600 鎊	12,566 担	20,248 鎊			
1863	7,000 匹	27,300 两							



表 11. 上海出口主要中国货物的品种、数量和价值

( 1844—1863 年 )

年份	生		絲		茶		器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4	5,087 包		1,558,453 磅					
1845	10,027 担	886,082 磅	9,388,422 磅		499,242 磅			
1846	16,356 包	945,915 磅	12,798,433 磅		550,296 磅			
1847	18,038 包	1,026,855 磅	15,863,482 磅		449,919 磅		213 担	2,734 磅
1848	12,143 担	763,225 磅	15,729,255 磅		514,842 磅			1,653 磅
1849	14,436 担	1,023,080 磅	20,398,037 磅		628,967 磅			
1863	21,806 担	7,632,341 两	516,566 担		12,992,409 两			

资料来源: ①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⑤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注 解: ① 1 包 =  $106\frac{2}{3}$  磅。

② 1 担 =  $133\frac{1}{3}$  磅。

③ 1 两 = 0.35 磅。

上海出口主要中国货物的品种、数量和价值(續)

(1844—1863年)

年份	南京布		明		砚		樟		脑		陶		器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4														
1845	227担	2,406鎊	3,352担	641鎊	16担	53鎊								999鎊
1846	188担	1,960鎊	204担	55鎊	400箱	1,131鎊								
1847	467担	4,862鎊	408担	85鎊										
1848		11,517鎊	2,200担	494鎊										
1849	60,450匹	6,194鎊												
1863	53,965担	1,618,870两												

表 12. 英国货物输入上海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  
( 1844—1863 年)

年份	粗 罈		毛 紗		毛 毯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4	75,567丈	22,921磅	49,885丈	19,455磅	665块	324磅
1845	7,981匹	13,858磅	4,157匹	19,664磅	747对	500磅
1846	59,407丈	15,511磅	55,912丈	16,712磅	513对	327磅
1847	81,401丈	21,947磅	65,581丈	19,037磅		
1848	54,871丈	15,252磅	27,328丈	10,918磅		
1849	141,908丈	39,174磅	57,216丈	21,381磅		
1852	31,955匹		7,647匹			
1853	13,400匹		3,960匹			
1854	2,500匹		2,720匹			
1855	10,040匹		1,410匹			
1856	17,224匹		2,350匹			
1863	103,415匹		81,833匹		19,828对	

资料来源:

- ①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4»。
-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 ⑤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 ⑥ George Wingrove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 ⑦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英国货物输入上海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續一)

(1844—1863年)

年份	粗斜纹布		手帕		天鵝絨		白布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4			6,470打	1,401鎊	1,547匹	4,187鎊	152,300匹	123,743鎊
1845	2,327匹	2,181鎊		1,991鎊		6,169鎊	341,581匹	247,659鎊
1846	2,880匹	1,800鎊	20,722打	4,316鎊		1,368鎊	235,067匹	126,303鎊
1847	32,575匹	15,825鎊	17,203打	3,583鎊		13,703鎊	221,122匹	126,366鎊
1848	11,549匹	6,984鎊	7,616打	1,713鎊		6,025鎊	196,427匹	122,422鎊
1849	26,677匹	12,384鎊	8,668打	1,914鎊	1,872匹	3,811鎊	338,052匹	193,538鎊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63	18,840匹				24,895匹			

英国货物输入上海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續二)

( 1844—1863 年 )

年份	灰		布		印花布		制服呢		铁条和铁丝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4	246,539匹	186,958磅	18,961匹	14,378磅	51,433丈	62,405磅	6,520担	4,242磅		
1845	911,911匹	585,932磅	26,816匹	18,926磅	297,976碼	127,215磅	13,553担	6,691磅		
1846	968,143匹	504,240磅	15,372匹	9,603磅	77,023丈	97,647磅	3,997担	3,669磅		
1847	940,848匹	510,061磅	23,395匹	15,115磅	149,447丈	121,936磅	2,659担	2,190磅		
1848	427,207匹	245,109磅	24,114匹	13,847磅	52,615丈	47,432磅	7,709担	5,402磅		
1849	817,955匹	424,856磅	13,160匹	7,991磅	124,697丈	117,854磅	3,928担	2,595磅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63			79,555匹						117,922担	

英国貨物輸入上海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續三)

(1844—1863年)

年份	鐵		皮		鉛		塊		玻璃器皿		硝石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4	865担	3,375鎊	1,857担	2,293鎊	1,967鎊	95担	154鎊					
1845	291担	1,091鎊	1,771担	1,338鎊	1,338鎊	267担	445鎊					
1846	239担	398鎊	212担	243鎊	42鎊	300担	437鎊					
1847	87担	254鎊	85担	115鎊	3,545鎊							
1848					1,600鎊							
1849	392担	14,124鎊	250担	276鎊	2,188鎊							
1852					1,120箱							
1853												
1854												
1855												
1856												
1863			102,487担									

英国货物输入上海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續四)

( 1844—1863 年)

年份	肥皂		木材		酒		钟表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4								
1845					889打	1,481鎊		
1846	85担	122鎊	3,101担	5,749鎊		3,349鎊		280鎊
1847								
1848								
1849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63								



表 13. 中国貨物經由上海輸往英國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

( 1844—1863 年 )

年份	絲		茶		瓷器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4	4,814包	417,213鎊	1,233,770磅	67,115鎊		
1845	9,505包	792,489鎊	69,889担	462,746鎊		
1846	12,735担	921,316鎊	10,073,758磅	422,263鎊		
1847	14,205担	1,010,308鎊	13,313,599磅	382,019鎊	25担	781鎊
1848	11,998包	751,077鎊	12,337,725磅	317,930鎊		1,653鎊
1849	13,781担	972,455鎊	15,535,572磅	445,844鎊		
1863	19,804担		462,557担			

資料来源：①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4»。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⑤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⑥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中国貨物經由上海輸往英國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續)

( 1844—1863 年 )

年份	苧		麻		南 京 布		明		矾		石		膏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4	1担	3磅	68担	1,107磅	2,486担	673磅	4,850担	525磅						
1845			56担	625磅	2,701担	470磅								
1846			181担	1,855磅	204担	55磅								
1847			293担	3,051磅	1,200担	270磅								
1848	74担	168磅	904担	8,715磅										
1849		1,039磅	1,200匹	1,060磅										
1863			22,361担											

表14. 美国货物输入上海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

(1845—1863年)

年份	灰色粗布		白色粗布		斜纹布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5	46,455匹	29,034镑	14,125匹	8,828镑	7,455匹	4,659镑
1846	104,401匹	54,375镑	53,000匹	28,708镑		
1847	22,310匹		2,000匹			
1848	77,047匹	44,205镑	7,550匹	4,705镑		
1849						
1863						

资料来源: ①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⑤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美国货物输入上海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續一)

( 1845—1863 年)

年份	印花布		粗斜纹布		手織布		手帕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5	850匹	531鎊	12,940匹	8,503鎊	8,930匹	5,581鎊	50打	26鎊
1846	355匹	221鎊	96,239匹	48,119鎊	11,820匹	5,910鎊	1,621打	337鎊
1847	450匹		57,236匹				34,620打	
1848			120,050匹	67,528鎊	36,760匹	16,591鎊	1,840打	414鎊
1849	600匹		91,220匹		61,126匹			
1863	6匹		2,770匹				638打	

美国货物输入上海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續二)

( 1845—1863 年 )

年份	細斜紋布		制服呢		羽毛紗		粗嗶嘰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5	1,000匹	729鎊	30,802碼	15,400鎊	447匹	1,862鎊	17匹	28鎊
1846					1,875丈	554鎊	20,862丈	5,428鎊
1847	2,300匹		11,653丈		33,115丈		383丈	
1848	320匹	216鎊	13,295丈	12,264鎊	8,971丈	4,050鎊	7,914丈	1,963鎊
1849	3,450匹		1,798匹		400丈		1,700匹	
1863					214丈		10匹	

美国货物输入上海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續三)

( 1845--1863 年)

年份	毛 毯		鉛		木 材		玻 璃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5	225对	140鎊	208担	260鎊	21,181担	13,400鎊	202箱	252鎊
1846	425对	354鎊	3,200担	4,000鎊	9,575担	13,963鎊	300箱	625鎊
1847	500对			4,936鎊	706担			1,165鎊
1848			5,817担		2,970担	5,346鎊		
1849			2,550担		1,299担			
1863	200对		3,564担					

表 15. 中国貨物經由上海輸往美国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

( 1845—1863 年 )

年份	生 絲		茶		棉 花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5	507担	42,250鎊	2,255担	16,442鎊	362担	1,055鎊
1846	310包	16,066鎊	2,510,944磅	117,989鎊		
1847	344包		2,549,883磅		450担	
1848	217包	10,899鎊	3,338,596磅		1,570包	326鎊
1849	644担		4,416,932磅		521担	
1863	214担		15,180担			

資料来源：①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⑤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中国貨物經由上海輸往美国的主要品种、数量和价值(續)

(1845—1863年)

年份	南京布		明矾		石膏		大黃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1845			150担	31鎊	1,102担	115鎊	13担	56鎊
1846								
1847	115担				1,000担	112鎊	601担	
1848	23,100匹	1,316鎊	1,000担	224鎊	500担			
1849	45,650匹							
1863	18,313担							

表 16. 上海进口貨物比重构成

( 1850,1860 年)

貨 物	1850	1860
鴉 片	54%	48%
棉 織 品	34%	44%
棉 紗	6%	4%
其 他	6%	4%
合 計	100%	100%

資料来源: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表 17. 上海出口貨物比重构成

( 1850,1860 年)

貨 物	1850	1860
絲	52%	66%
茶	46%	28%
其 他	2%	6%
合 計	100%	100%

資料来源: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表 18. 上海进口英国货物占全国进口英国货物的比重

(1852—1856年)

年份	綾織品			羽毛紗			粗嘜			呢絨		
	上海	全国	上海占全国	上海	全国	上海占全国	上海	全国	上海占全国	上海	全国	上海占全国
1852	3,610匹	10,935匹	33.0%	7,647匹	17,664匹	43.2%	31,955匹	90,464匹	35.3%	30,059匹	49,025匹	61.3%
1853	2,170匹	10,262匹	21.1%	3,960匹	8,320匹	47.5%	13,400匹	37,203匹	36.0%	11,184匹	18,867匹	59.2%
1854	120匹	4,640匹	2.5%	2,720匹	7,826匹	34.7%	2,500匹	28,380匹	8.8%	7,587匹	15,059匹	50.4%
1855	1,020匹	1,620匹	62.9%	1,410匹	2,270匹	62.1%	10,040匹	14,480匹	69.3%	14,467匹	17,337匹	83.4%
1856	2,800匹	7,428匹	37.6%	2,350匹	4,470匹	52.5%	17,224匹	36,642匹	47.0%	28,002匹	38,553匹	72.6%

資料来源: George Wingrove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上海进口英国货物占全国进口英国货物的比重(續)

( 1852—1856 年 )

年份	染色及印花布			平織布			棉紗		
	上海	全国	上海占全国	上海	全国	上海占全国	上海	全国	上海占全国
1852	256,343匹	366,973匹	69.9%	2,281,932匹	3,325,557匹	68.6%	128,000磅	6,871,652磅	1.8%
1853	88,340匹	154,680匹	57.1%	1,868,575匹	2,396,997匹	77.9%	68,050磅	5,244,187磅	1.2%
1854	41,700匹	95,650匹	43.5%	374,100匹	941,630匹	39.7%		3,486,550磅	
1855	69,025匹	198,105匹	34.8%	1,310,350匹	1,804,958匹	72.5%	50,100磅	2,867,970磅	1.7%
1856	159,362匹	281,784匹	56.5%	1,651,094匹	2,817,624匹	58.5%	60,500磅	5,579,600磅	1.1%

表 19. 上海和广州进口英国货物数量的比较

(1844—1863年)

年份	羽 毛 紗		粗 嘜		呢 絨	
	上 海	广 州	上 海	广 州	上 海	广 州
1844	49,885丈	283,092丈	75,567丈	330,196丈		
1845	4,157匹		7,981匹			
1846	55,912丈	71,013丈	59,407丈	81,978丈		
1847	65,581丈	135,524丈	81,401丈	369,166丈		
1848	27,328丈	53,658丈	54,871丈	256,882丈		
1849	57,216丈	57,011丈	141,908丈	259,010丈		
1852	7,647匹	10,017匹	31,955匹	58,509匹	30,059匹	18,966匹
1853	3,960匹	4,360匹	13,400匹	23,803匹	11,184匹	7,683匹
1854	2,720匹	5,106匹	2,500匹	25,880匹	7,587匹	7,472匹
1855	1,410匹	860匹	10,040匹	4,440匹	14,467匹	2,870匹
1856	2,350匹	2,120匹	17,224匹	19,418匹	28,002匹	10,551匹
1862						
1863	81,833匹	0	103,415匹	0		

资料来源:

- ①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4»。
-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 ⑤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 ⑥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 ⑦ George Wingrove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上海和广州进口英国货物数量的比较(續一)

( 1844—1863年)

年份	綫織品		染色及印花布		平織布		棉紗	
	上海	广州	上海	广州	上海	广州	上海	广州
1844								
1845								
1846								
1847								
1848								
1849								
1852	3,610匹	7,325匹	256,343匹	110,630匹	2,281,932匹	1,043,625匹	128,000磅	6,743,652磅
1853	2,170匹	8,092匹	88,340匹	66,340匹	1,868,575匹	528,422匹	68,050磅	5,176,137磅
1854	120匹	4,520匹	41,700匹	53,950匹	374,100匹	567,530匹		3,486,550磅
1855	1,020匹	600匹	69,025匹	29,080匹	1,310,350匹	494,608匹	50,100磅	2,816,970磅
1856	2,800匹	4,628匹	159,362匹	122,422匹	1,651,094匹	1,166,530匹	60,500磅	5,519,100磅
1862								
1863								

上海和广州进口英国货物数量的比较(續二)

(1844—1863年)

年份	手帕		毛毯		鐵器		玻璃	
	上海	广州	上海	广州	上海	广州	上海	广州
1844	6,470打	44,940打	665块	3,170对	6,520担	60,863担		4,240元
1845		14,126打	747对	3,916对	13,553担	24,083担		3,927元
1846	20,722打	8,672打	513对	5,296丈	3,997担	10,898担		5,965元
1847	17,203打	14,248打		1,084块	2,659担	6,005担		5,580元
1848	7,616打	504打		1,232块	7,709担	8,169担		3,000元
1849	8,668打	16,028打			3,928担	27,504担	1,120箱	5,500元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62								
1863			19,828对		117,922担	12,331担		



### 三、进口鴉片数量和貨值的統計

表 20. 上海进口鴉片箱数及其占全国消費箱数的比重

(1843—1863 年)

年份	上海进口箱数	全国消費箱数	上海进口箱数占 全国消費箱数的%
1843		36,699	
1844		23,667	
1845		33,011	
1846		28,072	
1847	16,500	33,252	49.6%
1848	16,960	38,000	44.6%
1849	22,981	43,075	53.3%
1850		42,925	
1851		44,561	
1852		48,600	
1853	24,200	54,574	44.3%
1854		61,523	
1855		65,354	
1856		58,606	
1857	31,907	60,385	52.8%
1858	33,069	61,966	53.3%
1859	33,786	62,822	53.8%
1860	28,438	47,681	59.6%
1863	36,851		

資料来源：① T. Roger Banister: «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 1834—81»。

②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④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表 21. 上海进口鴉片貨值  
(1854—1863年)

年 份	貨 值
1854年7月至1855年6月	9,113,454两
1855年7月至1856年6月	11,529,308两
1856年下半年	5,571,000两
1857	14,252,514两
1858	15,822,320两
1859	15,397,350两
1860	14,857,440两
1861	12,138,232两
1862	18,604,140两
1863	20,251,406两

資料来源: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表 22. 吳淞等 9 处运进英国鴉片数量的比較  
(1849、1854年)

地 名	1849	1854
吳 淞	21,050箱	28,870箱
Cumsingmoon	15,400箱	
香 港	900箱	} 2,760箱
澳 門	600箱	
南 澳	2,470箱	3,095箱
厦 門	3,200箱	3,860箱
Chewchew	1,390箱	1,382箱
Mui	1,840箱	4,495箱
罗 崗	1,000箱	2,190箱
合 計	47,850箱	46,652箱

資料来源: George Wingrove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注 解: Cumsingmoon、Chewchew、Mui 系中国地名,一时查不出中文原名,現暫按外文譯名列此。

#### 四、进口和出口各国船舶艘数和吨数的统计

表 23. 上海进口各国船舶的艘数和吨数

(1843—1863 年)

年份	英 国		美 国		西班牙		其他国家		各国合计	
	艘数	吨数	艘数	吨数	艘数	吨数	艘数	吨数	艘数	吨数
1843									7	
1844									44	8,584
1845	62	15,917	19	6,531	2	600	4	1,294	87	24,342
1846	54	15,069	17	5,322	2	750	3	618	76	21,759
1847	76	19,361	20	5,454	2	671	4	1,249	102	26,735
1848	76	22,966	17	6,592	4	1,265	7	2,555	104	33,378
1849	89	30,812	25	10,252	3	770	10	2,192	127	44,026
1850										
1851										
1852(1—9月)	103	38,420	66	36,532			13	3,213	182	78,165
1853										
1854年7月至 1855年6月	213	71,971	77	49,943			66	19,336	356	141,250
1855年7月至 1856年6月	287	86,224	81	40,425			121	28,938	489	155,587
1856(7—12月)	163	49,084	38	30,908			87	17,107	288	97,099
1857	302	115,409	61	44,850			270	45,354	633	205,613
1858	290	120,205	97	56,280			367	66,139	754	242,624
1859	376	142,008	177	75,228			373	69,864	926	287,100
1860	494	143,609	248	93,365			265	64,180	1,007	301,154
1861	810	229,894	259	95,858			637	93,907	1,806	419,659
1862	1,532	390,139	806	226,056			560	107,943	2,898	724,138
1863	1,790	530,921	820	272,428			790	160,960	3,400	964,309

- 资料来源：①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的发端》，见《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一年》。
-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 ⑤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 ⑥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 ⑦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注 解：其他国家，1848年以前包括瑞典、荷兰、普鲁士，1848年开始包括俄国，1849年开始包括葡萄牙；1852年以后，西班牙也包括在内；1862和1863年，除上述国家外，再包括法国、挪威、智利、秘鲁等国。

表 24. 上海出口 各国船舶的艘数和吨数  
( 1843—1863 年)

年 份	英 国		美 国		西班牙		其他国家		各国合计	
	艘数	吨数	艘数	吨数	艘数	吨数	艘数	吨数	艘数	吨数
1843										
1844										
1845	66	16,760	17	5,931	2	600	4	1,294	89	24,585
1846	50	14,159	17	5,322	2	750	3	618	72	20,849
1847	75	18,914	20	5,454	2	671	4	1,249	101	26,288
1848	67	18,916	17	6,592	4	1,265	7	2,555	95	29,328
1849	94	38,875	25	10,252	3	770	10	2,677	132	52,574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年7月至 1855年6月	133	54,463	46	43,104			44	14,089	223	111,656
1855年7月至 1856年6月	277	81,814	81	43,446			114	28,730	472	153,990
1856(7—12月)	145	45,748	25	17,703			80	15,721	250	79,172
1857	169	66,149	35	28,101			94	19,993	298	114,243
1858	174	77,496	56	38,270			148	39,029	378	154,795
1859	383	150,016	179	78,184			377	61,509	939	289,709
1860	485	138,068	235	94,061			252	60,429	972	292,558
1861	782	229,775	344	92,305			621	86,115	1,747	408,195
1862	1,531	389,280	805	226,056			560	107,943	2,896	723,279
1863	1,810	554,716	884	287,021			853	155,153	3,547	996,890

资料来源：①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⑤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注 解：其他国家，包括瑞典、荷兰、普鲁士、法国、俄国、葡萄牙、挪威等国；1854年以后，西班牙也包括在内。

表 25. 上海和广州进口外国船舶艘数和吨数的比较

(1844—1863 年)

年份	艘 数		吨 数	
	上 海	广 州	上 海	广 州
1844	44	306	8,584	142,099
1845	87		24,342	
1846	76	304	21,759	130,170
1847	102	312	26,735	125,926
1848	104	261	33,378	110,242
1849	127	331	44,026	142,357
1863	3,400	867	964,309	300,500

资料来源：①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4»。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⑤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⑥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

表 26. 上海和广州出口外国船舶艘数和吨数的比较

(1844—1863 年)

年份	艘 数		吨 数	
	上 海	广 州	上 海	广 州
1844		296		140,128
1845	89		24,585	
1846	72	297	20,849	126,755
1847	101	310	26,288	122,975
1848	95	257	29,328	108,401
1849	132	313	52,574	135,627
1863	3,547	867	996,890	300,118

资料来源：①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44»。

②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Down to The Latest Period»。

③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④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⑤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9»。

⑥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1862—64»。